200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保罗·克鲁格曼**最具个性的作品之一



他对真相的无情揭露，令很多官员如坐针毡
他对现实的无情批判，令很多学者无地自容
在有些人眼里，他是最不受欢迎的人，但他却给了我们读懂世界的智慧！

The Accidental Theorist

and Other Dispatches from the Dismal Science

致命的谎言

揭开经济世界的真相

〔美〕保罗·克鲁格曼（Paul Krugman）◎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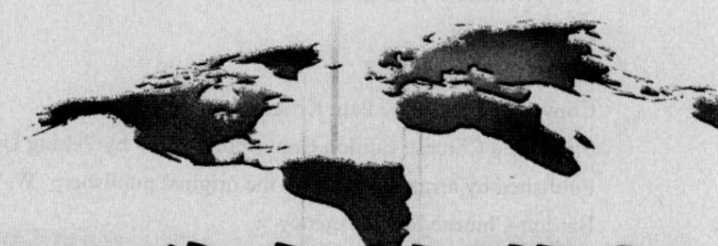
陈宇峰◎译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The Accidental Theorist and Other Dispatches from the Dismal Science



致命的谎言

揭开经济世界的真相

〔美〕保罗·克鲁格曼 著

陈宇峰 译



北京市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图字：01-2009-0672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致命的谎言：揭开经济世界的真相/（美）保罗·克鲁格曼著；陈宇峰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10
ISBN 978-7-301-15874-6

I.致… II.①保… ②陈… III.经济-世界-文集 IV.F113-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9）第171134号

THE ACCIDENTAL THEORIST AND OTHER DISPATCHES FROM THE DISMAL SCIENCE
Paul Krugman
ISBN：0-393-31887-7

书　　名：致命的谎言：揭开经济世界的真相
著作责任者：〔美〕保罗·克鲁格曼　著　陈宇峰　译
责 任 编 辑：张静波
标 准 书 号：ISBN 978-7-301-15874-6/F·2304
出 版 发 行：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205号　100871
网　　址：http://www.pup.cn　电子邮箱：em@pup.pku.edu.cn
电　　话：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编辑部 62752926　出版部 62754962
印　刷　者：北京宏伟双华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者：新华书店
787毫米×1092毫米　16开本　13印张　163千字
2009年10月第1版　2009年11月第2次印刷
定　　价：28.00元

序言

人们总认为经济学家是沉闷的。这一评价并不过分，至少当我们讨论学术问题时，大部分经济学家确实是相当沉闷的。但是，从自然科学家到超级模特，大多数人其实也是这样的。那么，为什么偏偏拿经济学家说事儿呢？

我相信，这个问题的答案和人们的一相情愿有关。首先，关于经济学对人们的意义，凯恩斯曾经说过，“善或恶皆有危险”，这种特性是其他学科——比如文学甚至史学研究——都不具备的。许多人到经济学家那里，常常是为了寻求某种情感或政治上的满足。然而，当他们发现，经济学家的语言中似乎总是充满着方程式、图表以及晦涩难懂的术语，大多会带着失望离开。

之所以会晦涩，其实是有一定原因的。凯恩斯曾经说过，“毕竟，经济学是一门技术性很强，因而也很难懂的学科，虽然几乎没有人会相信它。”然而，经济学理论建立在一些很简单的主题思想上，将它浓缩为一个命题，无非就是：人们通常善于利用机会，而且在考虑自己机会的同时，也会考虑他人的行为有无决定性的影响（考察他人机会时也一样）。将这一思想应用到个别情况，如技术进步对就业的影响，以及国际贸易对工资收入、货币供给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等。此时，我们就需要更仔细而深入的思考。在这一思考过程中，运用少许的数学和专业术语，往往能够保证你不会偏离正题。不可否认的一点是，现代经济学家也包括其他学术领域的人，花费了太多时间去做那些毫无意义的工作，其实，也就是对技术的卖弄。比如，本来用一般术语就能说得非常明白的事情，却用玄妙的数学来表达；或者，那些看上去

明显愚蠢的事情，经过数学的描述反而变得模糊不清。当然，并非当代经济学的所有技术都起到了模糊化的作用。实际上，技术技巧的使用常常让事情变得异常简单、思路清晰明了。

无论如何，我们都应当拥有更多容易阅读的经济学作品，而且比现有作品更加生动有趣且激动人心。天文学也是一门技术性很强又难懂的学科，该领域的卡尔·萨根是一位科普大师，但是在经济学领域能找到同样水平（与萨根创作的相比）的作品吗？你知道美国的消费支出有几千亿美元呢？不知道是不是？关于当今的许多问题，其中有一些还是社会热点问题，经济学都给出了相当深刻的见解。而且，只要花一些工夫，无须术语就能将这些见解阐释得很清楚。然而，就是这样的作品，通常很难获得出版的机会。这种状况导致经济学领域缺乏学术普及者。

且慢！经济学界不是也有一些大师极具影响力，他们的著作经常能够登上畅销书的排行榜吗？不可否认，这的确是事实，但他们并不是“学术普及者”意义上的大师。还以萨根为例子，他用自己独特的方式向大众推广职业天文学家的理论和发现，使大众对天文学产生浓厚的兴趣，从而易于接受这些晦涩的专业知识。然而，我们的通俗经济学作家又是如何做的呢？据我所知，他们并不打算让读者以轻松的方式了解其中的专业知识。恰恰相反，他们用著作来攀附正规的学术圈，并且热衷于宣扬那些严肃经济学家基本上不会赞同的论调。而这些论调，在专业人员看来不仅显得稀奇古怪，甚至根本就是错误或笑话。然而，一般读者没有这种分辨力，因为它们听起来似乎很美妙。就大多数人而言，甚至包括那些自恃见识广博、经常看公共电视以及阅读知性杂志的人，对经济学为何物仍然不是很清楚。

本书试图就以上情况做出一些改变。正如大部分学术圈内的人士那样，本人的学术生涯也是花了大半时间在教书、写论文以及和同行们讨论问题之上。以前，我总是认为：我只要找到事情的真相，然后说服其他的专家就可

以了，因为别人会将真相传播到更广的范围中去。坦白来说，要是有可能的话，我宁愿再回去过那种单纯的日子。从某种意义上来看，现在的我就如同被逐出了伊甸园一样。可是，想回头已经不可能。现在，我对以下这些现象深有体会：站在真相这一边，未必总能获胜；巧舌如簧的江湖人物，往往能让那些有地位的“好人”误以为他们才是智者，而且有些在我看来极为愚蠢的经济理念，常常被外行人误以为是深刻的见解。何况，我也不能指望有这样一个（或一些）人，来为我所信奉的经济学做实证。如果真要做实证，那就得自己动手才行。

幸运的是，虽然工作任务异常艰巨，但并非不可能完成。如果你付出了足够的努力，那么你总会找到一条路：寓言加隐喻式的道路。通过这样一种特别的叙述角度，使得看似深奥难懂的经济学片断变得容易融会贯通。在将技术性的主题以简单明确的语言表达出来的过程中，我感受到了许多欢欣和愉悦，以及琢磨写作技巧所带来的那种纯粹乐趣。

早在几年前，我就已经发现自己开始了某种第二职业，也就是进行本书中这些篇章的写作。我通常以时事为切入点，去反驳那些似是而非的观点，同时倡导那些不易为人们接受但却是正确的观念。当然，我这么做另有“企图”，那就是通过这些短文来证明它们对经济学思想的非凡意义。

第二职业并没有让我变得广受欢迎。其实，很多人对经济学的许多概念都已经根深蒂固。部分原因是由于日常生活的收支经验，使得人们误以为自己比别人更懂得经济学。此外，人们很容易接受某些符合政治偏见的经济教条。因此，一旦某位经济学家告诉他们：有些你们信以为真的事情，其实是大错特错，就像民间的说法，认为溃疡的发生是由于过度的担忧那样①；有些你们不那么喜欢的观点，其实是普遍真理，就像自然选择的进化论一

① 最近的研究结果显示，大部分溃疡的发生都是细菌感染的结果。

样——此时，人们会有什么反应呢？或许他们应该为获得启蒙而心存感激，但实际情形并非如此。此外，某些颇有影响力的经济学写手或演讲者，已经在造假上投入了很多精力，即通过歪曲事实，甚至是虚构事实，以及巧妙的修辞手法，来掩盖他们在逻辑上的漏洞。特别需要指出的是，这些人以及被蒙蔽的人，其实都不太高兴见到谎言被揭穿的那一天。也有些人，甚至只要听到以下主张就会大发雷霆：经济学已成为一门非常严谨的学问，因此它足以令人们对心中的成见产生质疑。一位愤怒的言论版专栏作家就曾经这样写道："如果这也是事实的话，那简直就是不可饶恕的无知指控。"因此，当凯恩斯说经济学是一门难懂的学科，但无人相信它的时候，他所指的正是此类人的心态。

针对这一话题，我最好还是指出争议的问题所在。我发现有时候指名道姓还是很有必要的：可以通过引述重要人物的实际例子来证明他们所倡导的想法有多么糟糕。乍一看，这种做法有失厚道。何必牵扯到个人呢？但事实上，我这么做自有我的严肃目的。因为荒唐经济学的散布者正在玩一种"请君入瓮"的游戏。他们承诺提供精妙的分析，以此来吸引观众，然后再用一些简单而粗劣的故事作为替代品。更糟糕的是，当其他人（比如我本人）试着反驳这些观点时，他们的回答往往是"请你放心，没人会在意的"。接着，将这些观点稍做修饰，然后重新陈述一遍。那么，作为辩论的反方，我们该如何来应对呢？也许，当这些人将手伸进糖罐子里的时候，抓他们个现行，应该会有点作用吧！这样一来，就可以证明我批驳的那些人确实存在，而不是不知痛痒的稻草人而已。我还发现，被动听的、貌似严谨的说法误导，与证明这些说法纯粹是胡说八道，其实都是非常容易的。因此，我可以负责任地说：我那些不得不说的话，才是他们真正需要认真去听的。至于人们是相信我，还是写信羞辱我，并无所谓，但似乎很多人宁可选择后一种做法。

即使从事第二职业并没有让我交到很多朋友，我也宁愿这样想：从开始写作到现在，至少我已经对一部分人产生了影响。

本书收录的文章来自于早先发表的散文和评论，写作时间大概介于1995年秋到1997年夏之间。那是一段多事之秋（其他时间又何尝不是如此呢？），也是左派和右派们提出各种荒唐想法的高产期。本书最早的一篇文章是为了回应当时美国新当选的众议院多数党（即共和党）领袖所鼓吹的自私型经济的荒唐想法而写。较晚的一篇，则是针对当时法国新上任的社会党总理而写。他是一个好心人，但是很不幸，其想法也和共和党的想法一样愚蠢。总体来看，左和右的分法并不准确。就本书论及的问题而言，正统的自由派与保守派都犯了同样的错误。在很多时候，那些没有人听的恰恰就是真话，忠言逆耳利于行。

大约有半数的文章都曾发表于网络杂志《滚石》（*Slate*）之上，因为我是在该杂志的专栏“沉闷科学”上从事这些写作的。其余的大多数文章都刊登在传统的印刷媒体上，比如《华盛顿月刊》、《外交事务》和《纽约时报》等。还有剩下的几篇从未发表过。虽然很多文章都是针对时事而写的，但我并不是职业的记者。如果说我曾经对这些时事新闻的讨论有所贡献，那么也一定是将新闻放到某个较长期的背景中才能看得出来。因此，我希望我的读者们能够发现，所有这些作品，并没有因为新闻本身的过期而变成毫无参考价值。

虽然我的最终结论是严肃的，但仍然不可否认写作是一个充满享受的过程。有一句老得掉牙但绝对属实的话：以平易朴实的英语为普通读者写一篇1300字的文章，远比为专业期刊写一篇5000字，而且满是方程式的专业论文困难得多，也费时得多。我希望，那些喜悦的读者朋友们也能体会到这一点。或许，他们会很快发现：这些短文，不仅能启迪心灵，而且还充满趣味。不妨先试着看一看吧！

目录

第一部分　工作，工作，工作

第二部分　右翼的错误

第三部分　全球化与全球胡话

第四部分　增长的幻觉

第五部分　投机客的赌局

第六部分　超越市场





第一部分

工作，工作，工作



所有理智的人都不会否认：市场是不讲情义的场所，其冷酷无情恰如一位变化无常的主人一般。事实上，将劳动视为商品是资本主义最不人道的地方。经济学教科书在处理劳动力换取金钱问题时，就像是在谈论一筐苹果的买卖那样。然而，我们都知道，从人性的角度来说，这中间其实存在很大的差异。作为商人，他可以贩卖各种物品，但对于工人，他通常只拥有一份工作。这份工作，不仅是他赖以生活的收入来源，在更大的意义上，还是他获得社会认同感的源泉。商品如果卖不出去，可能只是一件麻烦事；而工人的失业，却足以酿成一个悲剧。技术的革新、喜好的改变，以及国际贸易流向的转移等因素，都会促使这种悲剧每天不停地上演。世界的确是很不公平，而我们对于这种将人力看成物品的经济系统，似乎也无从置喙。也许可以借用温斯顿·丘吉尔关于民主所做的一段辩护词：资本主义民主是我所知的最坏制度，但是过去那些屡经试用的制度甚至更坏。到20世纪末，几乎已经没有人会相信还有其他的选择，可以取代市场经济体制。我们只能耐心等待，可以使人们尽量避免去承受这一经济体系中最为残酷的部分。

不管人们是否喜欢，他们都必须承认：绝大部分的工作机会，是那些以自利为导向的私人企业提供的。但是，关于这一认识的深层含义，人们的思想中仍然存在诸多混淆之处。之所以如此，部分原因是人们并不愿意接受以下的观念，即除非让劳动力市场在某种程度上能像其他市场那样运作，否则便不能很好地发挥它的功能。实际上，大家不用太惊讶，这一观念之所以不为人们所接受，原因还在于真正了解市场逻辑的人并不多。他们不了解，市场的供需关系往往（即使不总是）能在不假外力的情形下自动实现均衡。我相信，产生这一问题的另一个原因还在于人们的习惯性思维。如果市场没有提供就业机会，比如在经济衰退期间，那么他们就会认为：一定是体系内部存在着严重的缺陷。你要是告诉他们，体系所造成的种种苦难，仅仅是琐碎

而可以补救的技术层面问题，人们就会说这简直是一种不可思议的想法，荒唐可笑之极。的确，如果没有亲自深入研究过，就不可能相信这一“可笑”的说法。

问题的结果是，关于就业的糊涂思想获得了蓬勃的发展。从政府高层所采取的许多措施，我们也可以看到这一现象。这对于那些相信知识总在进步的人们来说，实在是一个莫大的打击。数十年来，甚至几个世纪以前就存在的思想谬误，如今正以一种神秘莫测的姿态重现。似乎这些见解的提出者已经超越了传统的知识谬误。而事实上，他们恰恰没有理解传统观点的谬误之所在。

这一主题下的各篇短文，是作者为了辨析一个最近复活的古老谬误（有时叫“劳动定额”谬误）而写。这一观点主张，全球的工作机会是有限的。因此，当生产力提高的时候，工作数量将随之减少。这一观点看上去似乎非常合理，它的证据来自于个别产业的经验。以美国铁路货运业为例，与1980年相比，目前的货运量更大，但雇用的工人数却不到当年的1/3。那么，是不是可以由此推断：随着生产力的增长，整个经济体系不再需要那么多的工人了呢？要说清这一真相，其实并非易事。这里面隐藏着一个合成谬误（Fallacies of Composition）。事实上，某个特定产业的生产力增长对于该产业工作数量的影响，与整体经济的情况大不相同。也就是说，整体经济的生产力增长是如何影响全体的就业量，并没有那么简单的逻辑。在第一章中，我将试着用一种较为轻松的叙述方式将要害讲清楚，并且也想让读者产生一些思考：到底什么才算是真正的经济思维？什么才是正确的经济理论呢？

第一篇文章主要探讨尽管美国某些经济部门的生产力有了极大的增长，同时制造业的就业人数停滞不前（主要由于生产力的增长），可是整体上劳动力市场的表现良好，这一点可以通过理论预测到。

第二篇文章主要探讨感觉与现实之间的差距问题。曾经有一段时间，报纸的新闻头条都被失业的形势完全占据了，以至于人们忘记了，在这些大规模失业的背后，其实是美国经济正以一种空前的速度在创造着工作机会。该篇的最早版本有“精神胜利法”等文字，当时罗伯特·瑞奇仍担任劳工部部长。

有一种观点认为，资本主义正遭受生产力过高的痛苦，这简直就是无稽之谈，似乎没有经过大脑就说出来了。这些人自认为，他们是一群既大胆又具有前瞻性的思想家，而且掌握了伟大的凯恩斯经济学中的思想精髓。因此，我特地写了一篇“庸俗的凯恩斯主义者”。我在其中指出，要是凯恩斯地下有知，恐怕也会不得安息的。

有些国家仍然苦于无法创造足够多的就业机会。我以不容乐观的法国——正是一个国家中占上风的糊涂思维方式，造成了工人的大量失业；而且，政治精英们似乎也做好了打算，要从过去的经验中得到错误的教训——来作为这一部分的结束。



第一章　票友理论家*

我们不妨想象一下，存在这样一种经济体：它仅生产两样东西，即热狗和面包。在这一经济体内，消费者会坚持认为，吃一个热狗的时候，一定也要吃一个面包。当然反过来，也是一样。同时，我们也假设，劳动是唯一的生产因素。

OK！我们先暂停一会儿。在继续讨论之前，我必须要问：你对以上述方式开头的短文感觉如何？它听起来是不是很可笑？或者你打算翻过这一页，因为你觉得这里不会有任何重要的东西？

本文的目的在于阐释以下看似怪异的道理：除非你充满童心，否则你无法做好严肃的经济学。经济理论并不是那些大人物的格言录。简明扼要地说，它基本上是一种进行思想实验或讲述寓言的场所，即以一种简单的方式捕捉到经济过程的内在逻辑。当然，观点最后必须接受事实的检验。但是，

* 原文发表于《滚石》杂志，1997年1月23日。

即使要找到哪些事实是相关的，你也必须在假想的环境中与那些观点游戏（play）。在这里，我故意使用了“游戏”一词，因为无论是在经济学领域还是其他学科领域，有创意的思想家通常都充满奇思怪想。鉴于此，下面我将用热狗和面包的例子来讨论技术、工作以及资本主义的未来，并且我计划给出几个与该主题相关的严肃结论——这些结论你也可以得到，前提是你愿意参与到一两个思想实验的游戏中来。

现在不妨继续我们的话题。假定我们的经济体最初雇用了1.2亿个工人，这基本上符合充分就业的情形。生产一个热狗或者一个面包要花费两个人一天的工作量（顺便提一下，事实究竟如何，并不是这里的重点）。如果经济体按照消费者的需求进行生产，比如说每天生产3000万个热狗和3000万个面包，那么每个部门分别雇用6000万个工人。

现在假定技术的进步使得每个工人能在一天内生产出一个热狗，而非最初的两天一个。同时，假定该经济体利用增长的生产力来增加消费，即每天4000万个热狗加同等数量的面包。于是，需要对劳动力进行重新分配，新的方案是只有4000万个工人生产热狗，而有8000万个工人生产面包。

我们假定有一位著名的记者来到了这个地方。他在匆匆看过最近的历史记录之后，宣称有某些可怕的事情已经发生：2000万个热狗的工作岗位已经消失。当他再次深入地进行实地考察后，发现热狗的产出事实上已经增加了33%，然而雇员数量却减少了33%。于是，他开始了一项为期两年的研究计划，到全球各地旅行，拜访企业领导、政府官员和工会领袖。对他来说，情况变得越来越清楚：供给正以非常危险的速度在增加，而消费者的需求却不足以跟上这些变化。的确，面包部门仍然在创造工作机会。但是，不久之后技术革新也将会摧毁它们。简而言之，全球资本主义正朝着危险的方向疾驰。他将自己的结论写成一本500页的书。书中充满了技术和全球市场中正在

发生的那些令人震惊的改变和事实，其间掺杂了一些日文、德文、中文，甚至马来西亚语。对传统经济学家漠视这些危险的行为，更是极尽嘲讽。该书因其广博和雄辩而大获好评，作者也随之成为脱口秀节目的座上宾。

然而与此同时，经济学家们却有些困惑：他们不知道作者在说些什么。没错，技术的改变已经导致就业的结构性变化，但并没有导致工作机会的净损失，而且也没有理由相信未来会有这种损失。比如，假设面包和热狗的产量未来都增加到最初的两倍，那么，为什么经济体不能简单地利用增长的生产力，将消费增加到每天6000万个热狗和6000万个面包呢？因此，每个部门雇用6000万个工人就行了。

我们不妨再换一个角度，一个部门的生产力提高很容易导致本部门工作岗位的减少。然而，如果将这个结论推广到整个经济体，即生产力的提高将导致工作岗位的减少，那就大不一样了。显然，在我们假想的经济体中，热狗部门减少的就业人数，与面包部门增加的就业人数完全相等；反之亦然。当然，无论你拜访多少个国家，如果只与热狗生产者交流，你将永远不可能知道这一点。同样，你也不可能从面包生产者那里找到真正的答案。这其实是一种洞察力，你只需要通过一个假想的经济体并进行相关的思想实验就能获得真知。

这种思想实验是否太过简单，以至于它无法告诉我们关于真实世界的情况呢？答案显然是否定的。首先，如果你将“热狗”替换成“制造业”，而将“面包”替换成“服务业”，那么我的故事就与美国过去30年的经济发展史非常吻合。从1970年到现在，制造业的产值大概翻了一番，但由于生产力的提高，就业量出现微幅下跌。服务业的产值大概也翻了一番，但由于生产力提高不显著，因此就业量增加了90%。总体来说，美国经济新增了近4500万个工作机会。因此，在真实的经济体中，正如寓言所预测的那样，某一部

门的生产力提高，似乎已经导致其他部门工作机会的增加。

在这里，还有一种更加深刻的观点：简单的叙述并不等于过度的简化。即使是我们的小寓言也暴露了长篇调查报告所无法揭示的深刻内涵。与此同时，寓言也将某些评论家的弱点暴露无遗。比如，他们经常会得出这样的结论：因为钢铁工业的生产力提高，减少了钢铁工人的就业数量，所以作为一个整体的经济体系，其生产力的提高将导致该体系的总就业量减少。

且慢，凭什么我可以假定消费需求会同步上升，进而消化掉所有新增的生产量呢？一种很巧妙的回答是：为什么不会？如果产量翻番，而且销售告罄，那么总体收入也将翻番。因此，为什么消费就不能翻番呢？换句话说，难道仅仅因为经济体生产了更多的东西，就一定会导致消费不足？

事实上，还有另外一个深刻的答案。经济体确实可能陷入全面性需求不足的困境，即经济衰退的降临。然而，这种突变基本上属于货币问题。因为人们试图持有的现金总额，超过实际流通中的现金总额，从而导致了经济衰退（该见解是凯恩斯学派的思想精髓）。增加货币的发行量往往能够解决问题。好的，故事到此结束，问题与全面性的生产能力过剩没有丝毫关联。

也许，在这个热狗寓言中，最强烈的反对意见来自著名记者那一部分。的确，没有大人物会写这样一本世界经济的书，而整本书都建立在一个如此明显的谬误之上。而且，即便他这么做，也没有人会真当回事儿。可是实际上，尽管热狗和面包的经济体是假想的，但是著名记者确有其人。本文的写作动机来自《滚石》杂志的记者威廉·格雷德在1997年大出风头的一本书：《资本主义全球化的疯狂逻辑》。那本书的确如我所言，对世界经济进行了长篇描述，并列举了大量的事实（然而，其中的某些关键性事实却根本不存在。不过，这是另外一个问题了）。说来说去，都是为了证明一个观点，即全球供给的增长速度超过了需求增长的速度。可惜的是，该书列举的事实与

所要证明的观点根本是风马牛不相及。书的大意无非是有许多产业的生产力正在提高，再加上新生产者的加入使竞争不断加剧，从而导致传统工作机会的大量丧失。也就是说，虽然热狗的产量增加了，但从事热狗生产的员工却减少了。似乎没有人提醒过格莱德，他应该好好思考一下有关合成谬误的问题，因为整体经济的状况与单一市场的逻辑是完全不一样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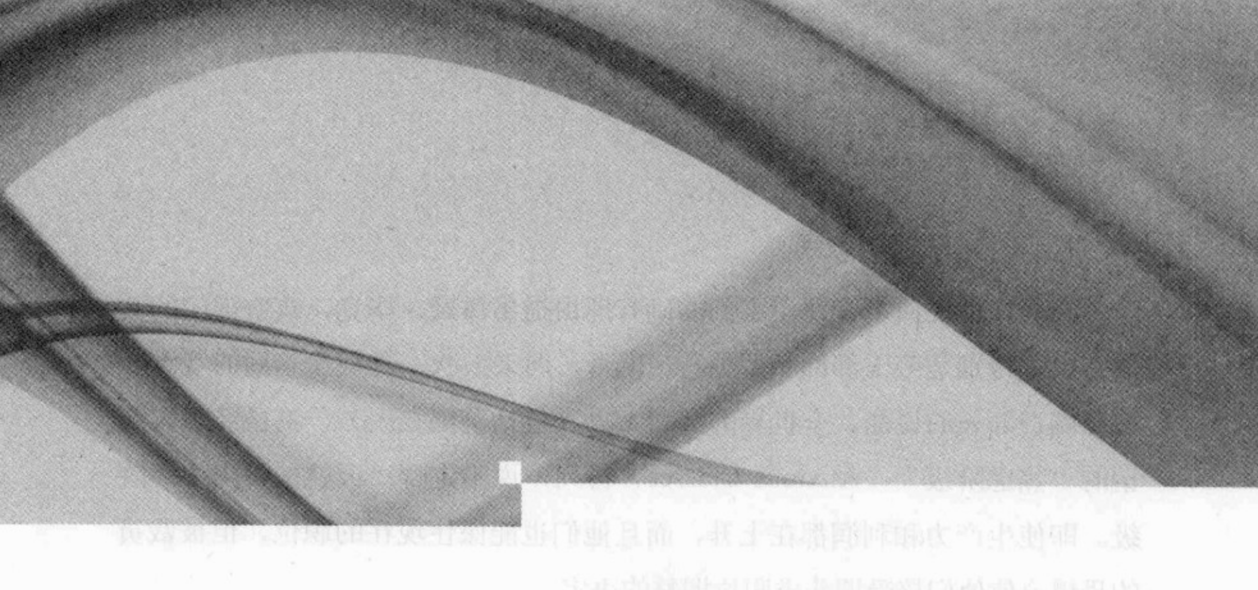
我猜想，格莱德会这样回答：你谈论的只是纯粹的理论而已，而我们是用证据在说话。然而实际情况是，美国经济在过去的25年间新增了4500万个工作岗位。其中，服务业所创造的就业机会，要远远多于制造业所丧失的机会。如果我没说错的话，格莱德会认为，这只是回光返照而已，最终整个经济也会像钢铁工业那样陷入相同的困境。然而，这仅仅是臆测，如果将其理论化，难免带有投机和过度简化的弊病。别忘了，格莱德只是一个票友理论家，而且还是一位草率的理论家。他和那些不小心的读者们从一堆事实中草率地得出结论，却没有意识到在他们的想法中其实隐含了很多破绽百出的假设。

当然，公众甚至是大多数知识精英，都没有意识到格莱德写了一本愚蠢之极的书。毕竟，该书除了愚蠢之外，看起来应有尽有且极富知识性，酷似百科全书，尤其饱含一种忧国忧民的笔调。铁口直断的代价是赔上了威信。这本厚厚的书给我们带来的惨痛教训是：一个聪明而且执著的人，被他自己的聪明绊倒有多么容易！

为什么会发生这种事情呢？部分原因在于格莱德拒绝倾听那些本可以让他免于窘境的建议和批评，他显然太过自负了。他在致谢中并没有提及任何称职的经济学家。当然，这也不足为奇，因为在他眼里，经济学“不是一门真正的科学，顶多只是承载价值判断的预言”。我很怀疑，是格莱德自身的拘谨害了他。他看待那些问题及自身的时候太过严肃，以致无法在理智的游

戏中轻松地玩耍。通过看起来似乎很平常的思想实验来检验某种想法，比如本文开头所假想的生产热狗和面包的简化经济体，难道这种做法有损他的尊严吗？说得再直白一点！可能正是他的这种过度严肃，导致了他在书中的观点竟然如此愚蠢。





第二章 裁员！裁员！*

在经济领域，克林顿政府还算是真诚。实际上，克林顿政府在经济分析和报告上从来都是非常小心谨慎的。但是，由于总统过于频繁地改变他的经济政策，以致他的官员们往往被认为不够诚恳，即便他们是在讲真话。所以，我有些为约瑟夫·斯蒂格利茨教授这位当今最卓越的经济学家打抱不平。他一度曾经担任了克林顿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的主席。1996年春季，斯蒂格利茨提交了一份关于美国劳工状况的报告，其内容大致上肯定了多数经济学家的看法：工人们的处境并不像新闻头条所说的那样糟糕，特别是企业裁员所带来的冲击被极度夸大了。

斯蒂格利茨的这份报告，无论从哪个方面来说，都是对美国劳动力市场的一种非常中肯的描述。可惜的是，几乎所有的解读者都把它看做一份纯粹的政治文件——是在大选年用来粉饰太平的作品而已。

---

* 原文发表于《滚石》杂志，1996年6月26日。

然而，话说回来，评论家们的确有理由提出质疑。毕竟，政府部门的其他官员，特别是劳工部部长罗伯特·瑞奇，向来鼓吹一种截然不同的观点。按照瑞奇部长的说法，全世界的高薪工人（包括美国在内），都已经加入所谓的“焦虑阶级”（Anxious Classes）行列，说不定哪一天就被挤出中产阶级。即使生产力和利润都在上升，而且他们也能保住现在的职位，但被裁员的恐惧迫使他们接受调薪或职位调整的决定。

与瑞奇部长的大部分说法一致，这种观点可谓旗帜鲜明而且包装精美。因此，也非常引人注目。然而，它基本上是错误的。相反，斯蒂格利茨在上述报告中揭示了其中的真相，而不是那些只能满足情感需要的大众幻想。

为了弄清瑞奇出错的原因，可以考虑一桩有关失踪小孩的离奇案件。20世纪80年代初期，敏感的新闻记者从真实的犯罪故事出发，并结合武断的统计数据，让很多人都相信这样一个奇怪的推测：在美国国内，每年都有大量的小孩被神秘的陌生人从他们幸福的家庭拐走。直到今天，“陌生人诱拐”依然是电视媒体上的热门节目。实际上，这种犯罪行为应该是非常罕见的。在拥有2.6亿人口的国家，每年大约只有300起。这并不是说诱拐从未发生过，确实发生了，而且是一件相当可怕的事情。这里的重点也不是说孩子们是完好无损的，实际上，美国有成千上万的儿童过着地狱般的生活。然而，加害于孩子们的人往往不是陌生人。例如，在1个小孩被陌生人拐走的同时，至少有1 000个小孩遭受到家庭成员的性侵犯。但是，“陌生人诱拐”的故事得到了大众的热捧，因此，它们的受关注度远远超过其实际的重要性。

企业裁员的恐怖程度既比不上陌生人的诱拐，而且发生频率也更高，但这两种现象拥有一些共同的特征。例如，两者都是适合在镜头前曝光的悲剧题材，而且能够被媒体充分地利用，但问题或许并不像想象中那样严重。

尽管斯蒂格利茨教授的报告以大量的统计分析来证明其观点，但仍然

出现了很多以自己的想法进行错误解读的版本。在这里，我们不妨举一例。1996年2月，有一期《新闻周刊》的封面故事叫做“企业杀手”，上面列举了过去五年内大公司进行的大规模裁员行动。每家公司所裁减的工作岗位数量以大号字体显示，并配有该公司首席执行官的个人照片。写这篇文章的目的似乎是想证明，国家正在经历一场空前的大灾难。如果你将所有裁员的数量加总，一共是37万人，不及所有工人总数的1/300。即使是最健康的经济体，每年失业或者换工作的人数都要远远超过这个数字。而且，大多数被辞退的工人都能很快找到一份新的工作。虽然有很多人在新的工作岗位上挣得少了，但极少会像文章所宣传的那样，从舒适的中产阶级马上沦为辛勤劳作的穷人阶级。难怪斯蒂格利茨教授会说，对于美国工人阶级来说，因为企业的贪婪冷酷而丢掉好工作并不是他们重点考虑的问题。

问题的重点在于，瑞奇部长的经济学风格是依赖奇闻轶事而非统计数字，依靠口号标语而非严谨分析。他的这些论调是无法与美国这样一个规模庞大且极富多样性的国家相适应的，因此也无法做到公正对待。在美国，确实什么事情都有可能发生：从陌生人绑架小孩、数学家成为恐怖分子，到公司经理兜售汉堡等，诸如此类，比比皆是。问题的关键不在于这些故事是否属实，而在于它们是否成为常态。那么，从更长远的未来来看又会怎样呢？

长期来看，“好工作”的数量和相应的薪酬水平正在持续稳定地增长，拥有技能、天分和运气的工人依然非常吃香。另一方面，仅有数量有限（每年最多也就几十万人）且原先拥有“好工作”的工人，遭遇了严重的失败。美国的中产阶级也许是焦虑的，但是客观来说，一切都还是不错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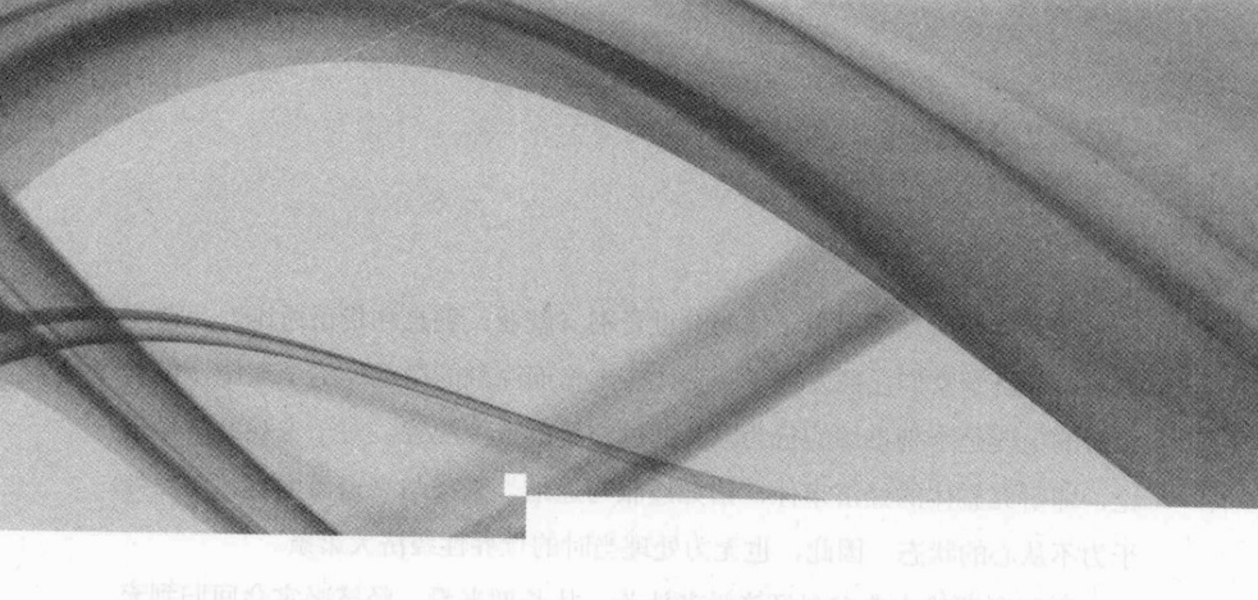
其实，真正处境不妙的是那些从来没有获得过一份好工作的人。而且，这些从事坏工作的人将会发现，他们本已微薄的工资收入，正逐渐且持续地缩水。换言之，新经济（套用瑞奇的说法）的主要受害者并非那些沦落到兜

售汉堡的数千名经理人，而是几千万原本就从事汉堡销售或是看门等工作的人。在过去20年间，他们的实际工资每年都减少1—2个百分点。

这有什么差别吗？有的！什么时候呢？当你正在排列政策的优先顺序时。难道我们应该像某些政府官员那样，将注意力集中在维持大公司里那些待遇优厚的好工作之上吗？或者说，设法阻止那些公司进行大规模的裁员？我们应该运用税收手段，惩罚那些辞退员工的公司，同时奖励没有这样做的公司吗？抑或反过来，竭尽所能地保留并增强“减免劳动者所得税”这样的制度安排，借此来帮助那些贫困的劳动者阶层？如果有人说我们可以两者同时兼顾，那就太过于伪善了：金钱是稀缺资源，政治资本也同样如此。如果将目光停留在占据新闻头条位置的小问题之上，那么我们就会忽视那些更有意义的大问题。

因此，请大家多给斯蒂格利茨教授一些掌声吧！毫无疑问，是那些政治领域的老板们让他那份关于企业裁员报告的价值大大缩水。他们相信，好的消息将有利于克林顿总统的竞选连任。然而，有时候出于政治动机而做出的某些经济分析，也可能正好道出了事情的真相。





第三章　庸俗的凯恩斯主义者*

同其他学科领域一样，经济学也服从信徒递减的定律。每一门学科的开创者，总是享有一些不受规范限制的特权。要是他的原创观点中存在一些粗糙的地方，或者他过于强调和前人见解之间的不连续性，那么润色者和解释者随后就会出现。于是，下面的情况将是在所难免的：有人仅仅按照字面意思而非内在精神来理解开创者的这些理论，从而使他们自身对激进教义的拘泥和执著程度，甚至要超过正统的卫道士们。随着观念的向外散播，这些教义也变得越来越简化，直至成为社会公共意识的一个部分，也即人尽皆知的常识。然而此时，它们与原先的创见相比，已经是大异其趣了。

以上所谈的正是凯恩斯经济学的命运。凯恩斯本人是一位对问题的反应极其灵敏且创意十足的思想家。如果说他在不经意间留下了遗产——某种思想风格——也就是所谓的庸俗凯恩斯主义的话，那么很不幸，这些遗产直到今天依然是笼罩在各种经济辩论中的最大谜团。

---

* 原文发表于《滚石》杂志，1997年2月6日。

1936年，凯恩斯出版了他的旷世奇书《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在此之前，经济学家们已经发展了一套比较丰富而深刻的微观经济学理论，但其探讨的主要是个别市场的行为以及通过市场的资源配置。对于宏观经济学理论，即研究整体的经济事件，诸如通胀与通缩、繁荣与衰退等内容，仍然处于力不从心的状态。因此，也无力处理当时的世界性经济大萧条。

那些所谓的古典宏观经济学者认为，从长期来看，经济必定会回归到充分就业的状态。因此，该学派仅仅关注长期的经济分析。古典学派有两个主要的信念，即货币数量学说和可贷资金理论。前者主张，一般物价的水平取决于流通货币的数量；而后者则指出，通过利率的调节可使总储蓄等于总投资。

其实，凯恩斯本人也承认，如果时间足够长的话，那么古典学派的观点是可以成立的。但是，正如他的名言“长期来说，我们都死了”所指出的一样，事实上短期内的利率水平，并非由充分就业时的储蓄与投资之差来决定，而是取决于流动性偏好。所谓流动性偏好，是指除非向公众提供足够的诱因，将金钱引导至相对不安全且兑换不便的资产中，否则他们宁愿选择持有现金。储蓄与投资必须相等，但在充分就业的条件下，如果储蓄的欲望高过投资，那么将会导致就业与产出的水平下降，而不是利率的下调。特别是，一旦投资需求由于某种原因——比如股市崩盘——出现下降，其结果将是全面的经济衰退。

凯恩斯的这一巨著，是对经济体运行方式的一次精彩的重新阐释，因此很快就被当时最优秀的年轻经济学家所认同。同时，有些人很早就认识到，凯恩斯的理论存在过度简化的毛病。尤其是在就业与产出的水平方面，正常情形下它们应当会对利率有所反应和反馈，而这种影响有时候可能非常显著。然而，《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一书虽然已经问世多年，但至今仍有

相当多的经济学家沉迷于凯恩斯的理论之中，似乎想把我们带到一个奇幻的镜中世界：身处其中，美德受到惩罚，而放纵却得到鼓励。

现在，我们给出一个“节约悖论”的例证。假定由于某种原因，导致储蓄率（即未花掉的收入占总收入的比例）上升，那么根据凯恩斯的早期模型，将进一步导致总储蓄与总投资的减少。为什么呢？因为较高的储蓄欲望，会促使经济走向衰退并降低收入水平，从而降低人们的投资需求。而根据储蓄与投资必须相等的法则，总储蓄量也必然要下降。

再举一个有关工资与就业关系的“聚宝盆”理论（因为一个古老的传说而得名）作为例子。或许，你的看法是当工资提高后，对劳动力的需求会降低。然而，一些早期的凯恩斯主义者却不这么认为，他们的理论是：如果将收入中属于利润的一部分重新分配到工资收入，那么，由于工人比资本家的储蓄率要低（暂且不管这是否属实），因此消费需求会增加，进而提高产出与就业水平。

以上所举的这些例子，出现在大学新生的经济学教科书之中，至今仍是极好的反思题材。不过，近年来并没有太多的经济学家关注这些内容。原因有很多，但最重要的原因是一位大人物——艾伦·格林斯潘。

凯恩斯理论可以用一句话来简单地概括：利率独立于就业及产出水平。而实际上，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简称美联储）一直都在积极地调控利率。例如，当就业率太低时，就下调利率；而当经济过热时，就上调利率。你可以对美联储主席的这一判断加以评论，甚至予以驳斥——或许你认为，应当为国民经济营造一个更为宽松的环境——但是，无论如何，他的权力却是不容置疑的。如果你想预测今后几年内美国的失业状况，那么这里有一个简单、有效的模型：格林斯潘的意愿和做法，加上一定量的随机误差（格林斯潘毕竟还不是上帝）。

将格林斯潘及其继任者放在本文中进行考察，这基本上是对古典宏观经济学的回归。但不同的一点是，那只看不见的手调控经济，使之达到完全就业水平所需的时间，则无法加以具体的预测；而美联储这只看得见的手，则是致力于在两三年内，实现在无通胀条件下的特定失业率目标。美联储的计划以利率的升降作为手段，让储蓄和投资在失业率目标的假设前提下实现相等。正因为如此，所谓“节约悖论”、“聚宝盆”理论这些例子，都变得不相干了。一旦储蓄率上升，由于有美联储的功能作为保证，最终的投资也将会上升。

在我看来，正常情况下的需求变化，都会被美联储的政策所抵消。因此，平均而言，它们对就业不会产生任何影响。这一道理再清楚不过了。然而，在经济学的学术领域之外，很少有人持有这种看法。举例来说，有关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AFTA）的讨论几乎总是围绕着工作岗位的增减。我认为，以下观点是非常明显的：下一个十年间的平均失业率，取决于美联储的意愿，而与美国、墨西哥的双边贸易差额无关。然而，这一观点还远未进入到公众意识的层面。（事实上，我在1993年的一次公开讨论会上提出这一观点之后，当时参会的一位成员，同时也是NAFTA的支持者，突然愤怒地说：“这种说法恰恰是经济学家让人讨厌的地方！”）

那些已经进入公共意识的理念，包括从事政策研究的专家们所熟悉的，只是一种刻意曲解的凯恩斯主义。不加批判地接受“降低消费支出，就是坏事”的观点，正是这个门派徒孙们的印记。美国目前的通货膨胀和预算赤字，都呈现出缓和的态势，而庸俗的凯恩斯主义者正准备展开一场绝地大反击。“节约悖论”和“聚宝盆”理论，是威廉·格莱德近来的两个主要议题（有兴趣的读者，不妨参阅第一章）。不过，格莱德可能并没有意识到他的思想根源，正如凯恩斯所说的那样，“那些自信可以免受任何知识阶层影响

的实干家，其实往往受到某个已故经济学家的思想支配”。当类似的论调[1]出现在《新共和》（New Republic）这样的杂志上时，也许用不着太过惊讶。然而，当我们看到《商业周刊》也在一本正经地宣称“更高的储蓄将降低经济增长”时，就必须注意了，这其实是一种正在扩展的文化现象。

为了证实储蓄有损于增长这一论断（更加合理的观点是储蓄并非有利于增长，而是它对增长的促进作用不明显），你必须让人们相信美联储的无能，也就是说，它无法通过利率的升降，来确保储蓄欲望上涨之后会转化为更高的投资。

即使你能够说明利率只是影响投资的因素之一，理由也是不够充分的。这就像是在说，我踩油门仅仅是影响汽车速度的因素之一。毕竟，我可以调整油门的大小，所以在超速行驶被警察逮到的时候，我就不能以正在下坡为借口来逃避惩罚。同样的道理，格林斯潘可以随心所欲地调整利率（要是美联储愿意，它可以在一天之内让货币供给量成倍增加）。因此，一般来说，就业水平取决于格林斯潘对安全上限的看法。本文的故事内容到此就基本结束了。

另外，还可以多说一点！要让储蓄有害的论断成立，你就必须证明：要么利率对支出不会产生影响（可以试着和全美房屋建筑商协会谈谈），要么潜在的储蓄与投资机会相比是如此之高，以至于即使美联储采取零利率政策，也无法使两者相等。后一种论证颇有点像20世纪30年代的情形——当时的国库券利率还不到0.1%，同时也适用于今天日本的情形。目前，日本的国内利率为1%左右（我认为，日本央行完全可以使本国经济走出困境，它目前的消极做法实际上是一种严重的渎职。不过，对于这一问题，我会用专文来讨论，可参阅本书第十六章日本究竟怎么了一文）。然而，国内的银行

① 指“节俭悖论”和“聚宝盆”等例。——译者注

每个月都会给我寄一张小单子，内容是需缴纳房贷的数额，这使得我可以确信美国目前的利率仍处于某一较高的水平。真的应该感谢银行！因此，无论如何，关于储蓄是否有害的争论仍然悬而未决，即使是那些持有害论观点的人，也不会认为美联储真的没有能力。恰恰相反，几乎就是这一班人马，坚持说美国经济在过去30年间（整整一代）的差劲表现，完全是美联储的过错，并且还说只有在格林斯潘的带领下，我们才能走出困境。

现在，所有的故事似乎可以做一个全面的总结。以下就是庸俗的凯恩斯主义者的观点：储蓄的增加将减缓经济增长的速度，其原因大概是美联储无法通过降息来引导投资的增加；然而，美联储又应该通过降息来刺激经济增长，因为低利率将导致投资的增加。

如此总结，应该没遗漏什么吧！



第四章　完全的高户人：自由、平等和虚妄*

我参加的第一次学术会议是在15年前的巴黎——这也是我成年之后的第一次巴黎之行，当时的法国总统是弗朗索瓦·密特朗。除了美酒和佳肴令人印象深刻之外，我对那次会议上所发生的事情，几乎没有任何印象了。倒是有一回，在晚餐（烤鸭加橄榄）桌上同一位法国新政府顾问闲谈之际，他告诉我他正在执行一项计划，就是通过公共支出来刺激法国经济，同时也提高工资并维持法郎的强势地位。

对美国人来说，上述方案看起来似乎有点自相矛盾。当时，我们问他，用这种方法去应对国际收支平衡危机（数月之后，果然应验），是否真正可行呢？他的回答是："你们这些盎格鲁—撒克逊的经济学家有个通病，就是受自己的理论束缚太深了。你们需要采取一种历史的视角。"幸好，在我们当中，还有一些人懂得一点历史。所以，我们又问，你的这种方法会不会让

* 原文发表于《滚石》杂志，1997年6月5日。

人们回忆起，1936年莱昂・布鲁姆政府计划失败的那段可怕经历呢？“不会的！目前我们在做的绝对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法国人并没有垄断对知识的不懂装懂，以及那种混乱的思维方式，他们也不比其他民族更会将两者结合在一起。然而，法国政治层面讨论经济问题的方式，的确有一些特别之处：其他先进国家的精英阶层，不会像法国人这样，乐于让优雅的语句凌驾于严谨的思考之上，宁可去拥抱那些冠冕堂皇的迷梦，也不愿意吸取历史的经验教训。

在一个盎格鲁—撒克逊的经济学家眼中，法国当前遇到的问题并没有什么好奇怪的。工作对于法国来说，就像是公寓对纽约市的情况：市政府对公寓提供者进行烦琐的管制，而对居住者则是关怀有加；法国雇主必须向工人支付不错的薪酬，同时提供很好的福利，而要解雇他们则是难上加难，这和在纽约要依法赶走房客的难度，几乎是完全一样的。纽约偏向于房客的政策，让不少人获益颇多，但是也让新来者在租房时倍感艰辛。法国的政策则催生了很好的工作，前提是你有幸得到它。这对很多人尤其是年轻人来说，也只是无可奈何的事。另外，法国还有优厚的失业福利可以领取，这使得很多人根本不想去找工作维持生计。

必须承认，有些问题的确是诊断起来容易但解决起来很难。如果说乔治・帕塔基不能终结租房的管制，那么，有何理由要求雅克・希拉克治好欧洲的硬化症呢？法国最令人百思不得其解的神奇之处在于，即使诊断结果已经相当明显，也绝对没有重要人物愿意去接受这些不好的结果。正好相反，关于法国到底需要什么，近年来已经逐渐形成共识——不妨猜猜看——那就是更多的管制。比如，法国社会党领袖（即现任总理）利奥内尔・若斯潘在其促进就业的方案中，就要求雇主支付给工人同等的薪酬，而劳动时间更少。即便是作为保守党领袖的菲利普・塞甘，这位按照法国标准是勇于打

破旧习的人物——正是他敢于对欧洲货币联盟的神圣目标提出质疑——也相信，禁止在加油站安装自助式加油设备，是增加就业的一个好方法。

除了这些人以外，法国的精英阶层对他们本国的问题找到了哪些答案呢？十多年来，他们中的一些人一直在渴望从大欧洲的思想，即欧洲经济一体化（共同的管制和单一化的货币）中得到救赎。他们思量：一旦处于这样一个欧洲大陆的共同市场之中，法国必定能够获得再度的繁荣。

就当前而言，统一的欧洲市场的确是一个很好的想法，而且单一化的货币也是很有道理的。当然，也可以另做打算（有一大帮人就是靠争辩这个议题谋生，几乎成为一种职业，可以将他们称为"欧洲学家"）。但是，过分认同欧洲经济整合的潜在好处，可能会犯下忽视全盘计划中致命缺陷的错误。法国的问题是失业率居高不下（高达13%），没有什么事情比这更重要。无论市场统一或货币单一化是否能够实现，都无助于解决失业问题。为何说得如此肯定呢？请大家思考：假定有几个城市都因为租房管制而面临供给不足的困境，于是它们达成一项协议，即让某一城市的房东在另一城市拥有住宅的限制减少。这个主意不错，但并未切中问题的要害，因为它只能稍稍地增加住房的供给。欧洲整合的这一伟大计划，说穿了也不过如此。

要是欧洲一体化的梦想真的成为现实，恐怕事情会变得更加糟糕。如果打算建立单一货币体系，那么我们能给出的唯一建议就是，你应当采取伯克利大学巴里·艾肯格林教授提出的所谓"耐克战略"①。但是，欧洲国家并没有这样去做，相反达成了七年过渡期的协议。在此期间，它们必须符合一套非常复杂的标准，主要是为了维持货币强势，并削减预算赤字。

平衡预算的做法并没有什么错。事实上，欧洲各国是应该好好整顿一下

① 所谓"耐克战略"，就是指"Just Do It"（想做就做），而不是讨价还价的"拖延策略"。——译者注

它们的财政了。美国在比尔·克林顿领导下所拥有的愉快经验表明，在削减赤字的同时，增加就业量是大有希望的。它们要做的仅仅是降低利率，以使私人支出可以吸纳多余的生产。但是，当你打算维持货币强势的时候，显然你就不能让利率降低。所以说，《马斯特里赫特条约》（即欧洲货币联盟的蓝图计划）所要求的削减预算，除了带来痛苦外，似乎什么都没有。也许任何人都无法估量该条约带来的影响，但我猜测，要是没有《马斯特里赫特条约》，那么法国的失业率将比现在降低2—3个百分点。

至少还有一些法国政治家愿意为（削减）预算赤字说好话，但似乎没有人会质疑“欧洲整合才是解决之道”这一教条。即使是勇者如塞甘也声称：“与失业问题的战斗，同大欧洲设想的实现，两者是密不可分的。”不过，还是不要再责备法国的政客了。毕竟，他们的“虚妄”只不过反映了一种更广泛的经济辩论风气，即整个国家都随时准备将问题归罪于任何事情，但就是怪不到真正的原因。连该国的畅销书作家和最受欢迎的名嘴都说，法国已经成为全球化的牺牲品——然而实际上，通过烦琐且故弄玄虚的官样文章，法国刻意地排斥了低收入国家的产品，导致它的进口率远比美国低得多（也低于英国，而英国的失业率只有法国的一半）。这些人还说，法国已经成为野蛮、不受限制的资本主义的牺牲品——然而，该国却拥有先进国家中最大的政府，以及最小的私有部门。他们还说，法国已经成为货币投机者的牺牲品，其破坏力更被希拉克总统喻为艾滋病。

如果法国的精英们继续拒绝面对现实——对于我们中的多数人来说，都是现实——那么，这个承载了法兰西民族太多幻想的欧洲梦，也许终有一天会破灭。经过上一次的选举之后，我们已清楚地看到，法国人不太愿意遵从于严谨的财政规范。那么，德国人会愿意放弃他们钟爱的马克，而去支持一种受法国人部分控制的货币吗？同样清楚的是，法国不会放弃它对管制的偏

好，而且它还会将这种偏好强加于那些更市场化的邻国，特别是英国。这样一来，它的邻居们（包括英国首相托尼·布莱尔）也就有更多的理由，在是否促成一个更紧密的欧盟这一问题上继续犹豫和徘徊。

假如事后证明，希拉克的这次政治失败，仅仅只是更大灾难的一个开端而已，也就是说，法国盘算已久的欧洲荣耀前景在突然之间崩溃，那么我们可以确信一件事情：法国人一定能找到一只替罪的羔羊。







第二部分

右翼的错误



有一些朋友告诉我，应该花些时间去教训一下右翼分子。诚然，右派的荒唐经济思想，可能并不比左派来得更糟糕，但有一个不容抹杀的基本事实是，他们的想法常常过于偏执，而且总是迎合有钱人的口味，以谋求更多的选票。虽然供给学派经济学是一种纯粹而简单的教条主义，但是作为美国共和党的官方意识形态，却盘踞了长达17年之久。

教训他们的方式就是借题发挥。供给学派总是强调税收是万恶之源，正常人会因为重复解释一件事情而感到厌倦，但是他们不会。根据我个人的经验，只要与供给学派交锋几次之后，边际报酬递减规律就会开始起作用，这时候你必须找到其他进攻的角度才行。

有一个角度还不错，那就是从一开始就追问该派人士，为什么会有人相信这套东西呢？我在本部分以“病毒再次临门”这篇文章作为开始，原文写在鲍勃·杜尔参与总统竞选，并采纳供给学派的主张作为政见之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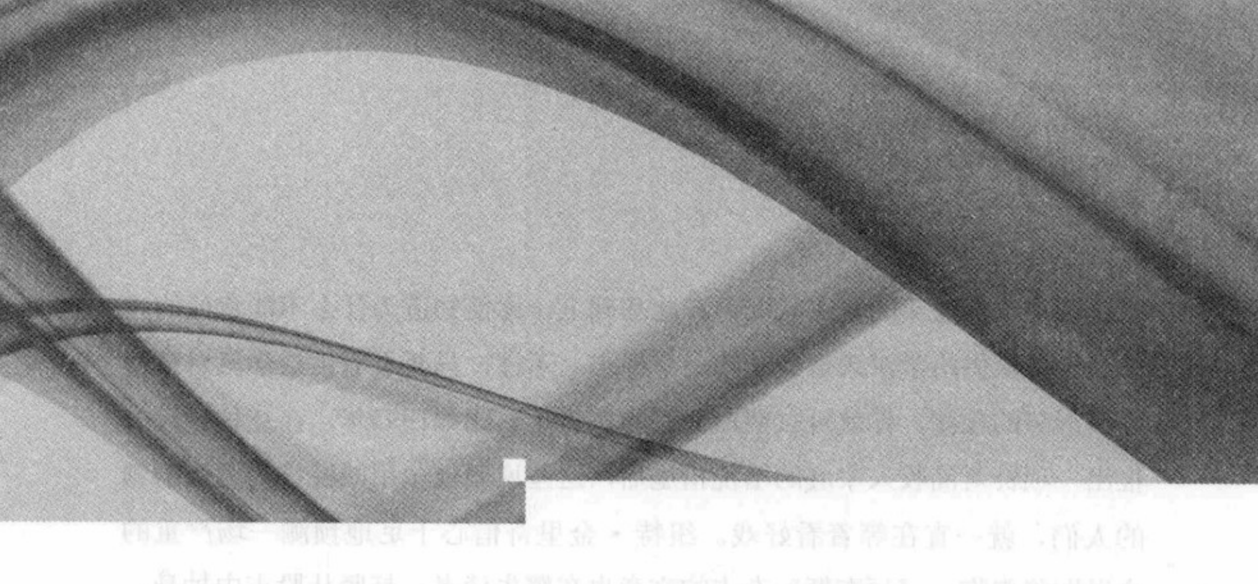
另一个可以发挥的绝佳机会，终于在1997年夏天来临。当时，连保守派也感到疑惑：面对持续的经济繁荣，如何向人们解释他们几年前发出的严重警告？所以，当《华尔街日报》的言论版编辑就这一问题向我约稿时，我马上答应并如约完成。对于他们感到疑惑的问题，我做了哪些思考呢？我敢肯定，该报的供给学派主编罗伯特·巴特莱介入了此事，企图将我的文章删除，甚至还指控我犯了“知识上不诚实”的罪行。但无论如何，这篇“供给学派的淡季”终于还是在本书上第一次发表了。

如果他们不讨论减税的神奇功效的话，其实他们还是非常有趣和坦诚的。例如，通过观察他们如何处理棘手的现实问题，你可以从中获得有益的启发。本部分的第三篇文章以“不平等的交易”为题，希望借此改变众议院多数党领袖（曾经的经济学教授）的观点：他竭力想否认的是，美国近二十年间收入分配日趋不均的这一事实。

“凋谢的无花果叶：为何保守主义革命总会失败”，这是另外一篇分析保守主义神话的文章。他们的信念建立在一种完全错误的印象之上，即不了解政府实际上是如何处置纳税者的钱财的。

最后一篇谈到了某些保守人士对金本位的痴迷，几乎已经达到不可思议的程度。





第五章　病毒再次临门*

当总统候选人鲍勃·杜尔宣布，将采取供给学派的减税方法作为他的经济计划之后，几天之内，就有数百篇文章陆续发表出来，说明为何这一计划是行不通的。同时，又有几乎相同数量的文章发表出来，解释为什么杜尔曾经公开地蔑视那些将减税当做灵丹妙药的人们，此时却会选择接受他们的方案，而且还会选出供给学派最忠实的信徒作为他的竞选搭档。对双方的这些言论，我并没有什么可补充的。但是，对我而言，那些主张减税的人在以往的总统选举中常常能够胜出的原因还有待进一步研究。在这里，我想问的是：为什么供给学派经济学会如此经久不衰呢？

供给层面的说法似乎都是顺理成章的：减税必定对经济产生积极的作用，人们也不必担心为此付出削减开支的代价。然而，实际情况并非如此。只要你愿意，任何无门派之见的经济学家都可以为你详细解释罗纳德·里

---

* 原文发表于《滚石》杂志，1996年8月15日。

根总统主政那些年的真实状况，在此基础上，你便知道为什么不能将他的政绩当做衡量供给学派政策成功的一个标志。不过，只要看看供给学派对最近经济形势的预测，你就可以明白他们的实力了。比如1993年，在克林顿政府推出一项针对高收入家庭的增税措施后，这些说服杜尔用减税作为竞选纲领的人们，就一直在等着看好戏。纽特·金里奇信心十足地预测一场严重的衰退即将来临。《福布斯》杂志的文章也在警告读者，赶紧从股市中抽身，以躲避崩盘的发生。《华尔街日报》更是在社论中断言，增税将显著地扩大赤字，而不是相反。事实如何呢？几年之后，美国经济体创造出了几百万个新的就业机会，股市几乎每天都在创新高，而赤字也在逐步减少。我并不是说，这些成绩都是克林顿政府的功劳，事实上，他的政策只对削减赤字这一部分有所贡献，而对其他方面则作用有限。问题的重点在于，当初供给学派的预言——克林顿的政策将带来一场灾难——彻底宣告破产了。事到如今，如果该学派对他们失败的预言还有什么辩解的话，早该站出来了。

我也并不认为，供给学派的观点得以扩张是因为它们迎合了政府的需要。没错，罗纳德·里根是以供给学派经济学作为竞选的政见，而且后来顺利当选为总统，但我怀疑无论他以什么作为政见都会当选。其实，他也因为被人们嘲讽为“巫术经济学”[①]而失去了不少选票。今天，供给学派这个名字已经成为一项负资产，即使是该学派的鼓吹者也很害怕被人随便戴上这顶帽子。1994年，共和党领袖——比如，金里奇和迪克·阿米——决定忍耐而不是热衷于减税，因为根据他们的判断，选民们不会信任基于供给学派假说的经济计划。而且，有传言说，即便是共和党的核心选举团队——《与美国的契约》（*Contract with America*）的起草人——也对在大选年提出减税承诺

① 指那些诱人而不实用的经济观念。——译者注

不以为然。那么，为何供给学派的观点还是屡屡浮出水面呢？我认为，同其他经济教条（如对金本位的信奉）一样，很可能是因为这一主张拥有以下两种特性：一是能够满足有钱人的偏见，二是能够安慰那些在专业上缺乏安全感的人们。

有钱人的支持并非无关紧要的小事。虽然经济学研究处于政治辩论的中心地位，但这项事业的预算并不可观。事实上，国家科学基金会全年的总预算也不到2000万美元。这意味着，只要有几个古怪的富翁，就足以资助一系列不容轻视的智囊机构、研究所、基金会等，借以倡导他们偏爱的某种经济教条（20世纪末，在重塑保守主义的精神面貌方面，像库尔斯和奥林基金会这样的机构，就是非常值得分析的典型例子）。通常，这些机构并不能吸引到最优秀或者最聪明的经济学家。最近，供给学派的一代宗师裘德·万尼斯基不得不延聘林登·拉罗奇的追随者，就是一个例子。但是，如果你已经知道问题的全部答案，又怎么会在乎自己聘请的研究人员是不是实力超群呢？

对于那些在专业上缺乏安全感的人们的口味来说，也要比它看上去的更加重要。由于经济学已经渗透到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因此，人人都希望有自己的看法。然而，教科书中的经济学技术性太强，令很多人望而却步。因此，只要向他们保证：一切都没有关系，你只要知道一些简单的概念，对他们来说就是莫大的福音。事实上，有一些供给学派的追随者已经创造出一部神奇的经济思想史。其中，凯恩斯是个骗子，而保罗·萨缪尔森和米尔顿·弗里德曼都是傻瓜。他们深邃的思想，则是从亚当·斯密开始，经历了19、20世纪之交的奥地利学派，一脉相承下来的。读了他们的大作后，你会长叹一口气：噢，原来如此！

所以，关于供给学派经济学是否有意义，或者它是否会导致选举溃败，其实都不重要。供给学派总是会有它的安全避难所，包括自由企业研究所和

资本主义研究中心等；也有其发表观点的地方，比如《福布斯》、《华尔街日报》等。与此同时，它的新成员还会不知疲倦地重复同样的内容。当我还年轻的时候，以为这出闹剧最终会结束。不过，现在看来未必如此。有一些深谙政治学的人说得非常深刻：杜尔的计谋虽然已经失败，而他本人也被淘汰出局，但供给学派终究还是会回来的。

生物学家理查德·道金斯有一个著名的观点：思想从头脑到头脑的传播，就如同病毒从宿主到宿主的扩散一般。这个观点既让人为之振奋，又有些玩世不恭。因为它意味着要想获得成功，并不需要有真实或者有用的思想，而只要思想能找到传播的媒介就足够了（一种宗教信仰如果倾向于将它的信徒塑造成殉道者，那么这种信仰也许是极端错误的。但是，如果殉道者能够通过自己的行为感动其他人，那么这种宗教就会继续存在）。供给学派经济学就像一种非洲病毒，在这个居住区消失了，又在那个居住区冒出来，从而传染给新的受害者。我曾经有过这样的期待：对于供给学派经济学，鲍勃·杜尔能够凭借他的世故和机灵，拥有比其他人更强的免疫力。然而，民意测验的结果似乎让他变得更加脆弱，并且再难康复。

第六章　供给学派的淡季

有时候，你不得不向厚颜无耻的人认输。我真的非常佩服供给学派的老将保罗·克雷格·罗伯茨，他已经做到了伸屈自如：在《商业周刊》最近的专栏上，他宣称克林顿主政下美国经济的繁荣，充分证明了供给学派经济学的有效性。时间回到1993年，当时的罗伯茨和他的同党们一起，对克林顿经济学将带来的灾难性后果进行了预测："更庞大的赤字，更高的失业率，上升的通货膨胀率，以及随后的货币危机。"如今，面对道·琼斯工业指数近8000点的高位，20年来最低的失业率，以及自里根政府以来最低的财政赤字规模，有些人会尽量转移这一话题，而罗伯茨本人却不为所动。

那么，他到底能说些什么呢？对于克林顿政府的成功，有一种标准（且属实）的反驳：当前的经济繁荣并非克林顿政府的功劳，而要部分归功于格林斯潘，更重要的原因是美国私有部门的活力与弹性。然而，这种"曲线救国"式的说法并不适用于供给学派。假如他们认为，20世纪90年代长达六年的无通胀条件下的经济增长，与克林顿的经济政策没有多大关系，那么他们

也必须承认，80年代的七年扩张时期，同样也与里根的政策关系不大。里根式经济学——从一开始光芒四射的“美国的早晨”，然后逐渐被大雾迷漫，到如今只给我们留下了债务——也许都是供给学派留给我们的吧！

什么是供给学派经济学？它并不像某些人所宣称的那样，只是认识到供给层面对经济的重要性（其实，没有一个正统的经济学家会否认这一点），也不是对高边际税率有害于经济增长有什么不同的独到见解。这些还只能算是比较传统的看法而已。例如，现任财政部长劳伦斯·萨默斯早期的一些研究重点就是考察税收对储蓄、投资以及经济增长的影响，但是萨默斯过去和现在都不属于供给学派，因为他也常常考虑到其他因素的重要性。

那么，对于供给学派经济学，其实不能以它包括什么，而应该以它不包括什么来定义。供给学派相信只有供给层面才是重要的。当出现经济衰退的时候，你也许会认为是需求不足的问题，那么美联储就可以通过降低利率来帮助国家渡过经济难关。但是，供给学派却并不这么认为（至少当他们前后一致的时候是这样的。不过，一旦有必要他们就会怪罪于美联储）。他们不仅相信税收会影响经济增长，几乎所有经济上发生的坏事，他们都要将责任归咎于增税，而所有的好事则一定是减税的结果。供给学派的这些观点，其潜含义是减税总是好的，他们根本不理会国家经济或政府预算的现实状况。

听起来美妙的理论，未必就是正确的。多年以来，供给学派已经为质疑者准备了一大堆答案。比如，随着里根政府的减税，美国经济开始逐渐复苏，这证明了传统经济学的错误，以及供给学派经济学的正确。

这种说法非常不诚实，因为20世纪80年代的经济表现，完全是按照传统“剧本”来演绎的。以70年代末一本极为畅销的主流宏观经济学教科书为证，该书由鲁迪格·多恩布什和斯坦利·费舍尔两人合著，书中描述了以下反通胀的场景：“一开始，失业率急剧攀升，然后维持一段较长时间的增

长，在此期间通货膨胀和失业率均同步下降。”换言之，这一场景看起来与1979－1990年美国经济的实际路径非常相似。但是，由于大多数人对传统经济学只有一种模糊的概念，因此很难为它邀功。这相当于为供给学派经济学提供了一段较长的活动时间，使它能够逃避对其错误见解的惩罚：一方面是80年代的经济表现，另一方面是有关它对世界运行方式的看法。

最近几年的经历标志着供给学派理念的全面溃败。要想否认这一点，你必须拥有一种很强的选择性失忆能力。事实上，供给学派已经走得太远，来到了某个悬崖边上，而这个悬崖突然间坍塌了。我们先不谈政治。假定你按照四年前金里奇的说法或者《福布斯》杂志的观点进行个人理财，那么你也许已将所有股票清仓，而且可能将现金换成黄金。如果基金经理信奉的是供给学派的观点，估计你会把他们炒掉，甚至会以工作失职的罪名来起诉他们。

经济学家们常常会做出一些糟糕的预测。无法预测到超越人类极限的事件，与根据某种潜藏在内心的意识形态做出预测（主流经济学家认为正确的偏要说成是错误的），两者之间是有显著差异的。的确，大部分经济学家都没有预见到20世纪70年代滞胀的来临。不过，又有谁预见到了呢？然而，后一种预测则与主流经济学家的观点完全相反，而且总是将其他持不同意见的人贬低为骗子或傻瓜，可以预见，这时要让人们再次尊重你，那可就很难了。供给学派曾经说过，克林顿的增税政策将导致一场灾难；相反，传统的经济学家并不这样认为。谁对谁错，相信读者自有公道在心。

当然，供给学派经济学并不会像一团烟雾似的消失得无影无踪。经济上的谬论从来不会绝迹，它们顶多是慢慢地凋零。如果只因为经不起现实的检验，就期望他们放弃那些建立在传统教条上的事业或价值观，那就太天真了——可以说，这正是人类的本性。而且，支持对富人减税这种意识形态势

必会非常顽固，它的支持者大都位高权重，而且那些鼓吹者也并未打算放弃他们的主张。因此，供给学派还将陪我们度过漫长的一段时间。

或许是因为在预测方面遭遇了重大的挫折，近来供给学派的一些言论显得更加张狂。例如，杰克·坎普就曾（在与阿尔·戈尔展开的那场辩论中）宣称，他有办法在15年内让美国的经济规模翻番。这意味着，从几乎充分就业的状态开始，每年实现5%的增速。他一定是认为，里根政府花了7年时间才将两位数的失业率降低至4%以下，简直是太无能了。更奇怪的例子来自万尼斯基（供给学派的创始人之一）。他认为种种迹象表明，富人们实际上已经变“穷”了。他的理由是，如果以黄金为标准，那么股票价格比30年前还要低不少。

你用不着惊讶，那些有地位的人也会说出一些有关经济学的蠢话。从经济史来看，某种观念的影响力大小，也许与它的品质如何丝毫没有关系——正如一种极具号召力的意识形态，即使没有任何逻辑性和必要的证据支持，最后也有可能获得权力的宝座。在政治世界里，供给学派经济学也许只是一颗流星，也没能为我们带来多大意义。挫败的确让某些供给学派人士感到几许落寞，但还不至于让他们突然抓狂，因为他们一直在发狂。





第七章　不平等的交易*

单纯对读者而言，爱德华·N. 沃尔夫的新书《头重脚轻：关于美国财富不平等恶化的研究》似乎并不会引起社会强烈的情绪反响。作为纽约大学的一位经济学教授，沃尔夫在此书中详细描述了美国财富分配状况不断恶化的趋势。尽管他的描述有些枯燥，但还是把握住了事件的本质。然后，他也提出了对财富适当课税的主张。该书的数据材料丰富而翔实，技术手段也非常高超。所以，通过这本书，沃尔夫教授向我们展示了一幅有关财富分配的全景图，尤其是在长期趋势及国际比较方面取得了突破。不过，总体而言，他的观点与过去五年来经济学家的主流观点并没有什么特别之处。

然而，令人吃惊的是，沃尔夫的著作却成为保守派们大肆攻击的目标，其中包括《华尔街日报》专栏上的多篇文章，以及一些不友好的图书评论等。一本如此温和的小书，为何会引来巨大的争议呢？

---

* 原文发表于《华盛顿月刊》，1995年10月。

我的理解是，该书所讨论的主题，即财富分配，使得很多保守主义者都无法保持理性。以一个简单的陈述为例，“美国最富有的20%的家庭，拥有全部财富的85%”，保守派坚持要改为“美国最富有的20%的家庭，创造了全部财富的85%”。还有，如果采用非政治标准对收入分配的长期趋势进行评估，并以两个经济周期中处于相同阶段的1973年和1989年来进行比较，那么保守派会生气地说，卡特政府的政绩怎么能与里根时期相提并论。

当然，保守主义者对财富不平等的看法是错误的，但原因并非他们不够聪明。从他们近乎疯狂的反应中可以找到一些端倪，并了解他们的政治目的。国会众议院多数党领袖理查德·阿米在其新书《自由的革命》中竭力否认财富不平等的事实。说穿了，保守派就是不希望公众知道得太多，因为他们害怕那样会危及自己的政治地位。

为了理解沃尔夫一书的重要性，我们来做一个思想实验：考虑两个社会，一个社会的人全都以某种职业（比如捕鱼）为生，他们每年所得几乎完全取决于自身的技能和努力。在这个社会里，人与人之间的收入是不平等的，因为有些人更擅长捕鱼这项技术，而有些人更愿意努力工作。不过，收入的波动范围并不会太大，而且人们都赞赏那些捕到更多鱼的人。

另外一个社会，人们的主要收入来源于黄金勘探。因此，会有少数人因发现大金矿而成为富人，另有一些人则找到小金矿，其余大部分人只能拼命工作以挣取微薄的工资。于是，这个社会就形成了一种极不平等的收入分布。当然，这也反映了技能水平与努力程度的差异：有些人生来就对金矿的特征异常敏感，或者愿意花更多的时间进行勘探。平均而言，这些人更容易发财。可是，也有一些人有天分且勤劳却没有成为富翁，有些甚至过着穷困潦倒的生活。

可以肯定的是，绝大多数美国人无论多么保守，都会选择第二种社会而

不是第一种。然而，同样可以肯定的是，如今我们的国家离纯朴的渔夫型社会越来越遥远，而更像是一个无情的淘金型社会。关于这一点，有大量的证据可以证明，包括政府机构如美国人口普查局，以及《财富》杂志的年度高管薪酬资料等。其实，明眼人从现实的遭遇中也能够体会到这一点。沃尔夫并不是经济学家，也不是自由主义者，他只是一位敏锐的观察者而已。当他想描述美国社会的真实情况时，就写了《虚荣的篝火》这部小说。

以下情况基本属实：在美国所有的家庭中，占总数10%的最贫困家庭，其生活标准比上一代明显降低，中产阶级家庭勉强维持现状或稍有改善，而占总数20%的最富有家庭的收入却实现了增长，增速甚至接近20世纪40年代至70年代初那段黄金时期。同时，高收入家庭（例如，占总数1%的最富有家庭）的实际所得成倍地增长。

人们往往将贫富差距的扩大归因于教育重要性的提高。的确，平均而言，拥有大学文凭的员工要比受教育程度低的人表现得更加出色。但是，在存在收入差距的人群中，大部分人的受教育程度其实很接近。例如，高中教师的待遇虽然不同于看大门的人，但是他们的收入远远无法与公司的CEO相比，即使受教育程度相同也是如此。

进一步来说，贫富差距的扩大并不仅仅表现在某一组别，还可以在该组别内进行细分。例如，将拥有高学历或最富有的20%的人与其他人相比时，可以将最富有的5%与另外的15%相比，也可以将最富有的1%与另外的4%相比——前者的财富增长速度要比后者快——如此推算，可以一直追溯到比尔·盖茨。沃尔夫一书的主要贡献在于，它指出美国财富分配状况不断恶化的趋势无处不在，超级富豪之间当然也无法幸免。

沃尔夫的重点在于财富而非收入，也就是说，关注资产而非现金流。这一做法在衡量一个家庭尤其是富人的经济地位时，比年度收入指标好得多。

有些年收入很高的人，也许只是在那一年获得了很高的收入。另外，我们经常看到，有些富裕家庭的年度收入是负数，因为他们很有可能投资了某个失败的项目。在以上两种情形下，将资产作为衡量他们收入等级的标准就显得尤为合理。更重要的是，财富指标有时候更能透露出成功人士的秘诀，即财富异常集中的原因。与收入相比，1989年最富有的1%的家庭拥有全国资产总额的39%。然而，他们只占有16%（仍然不错）的收入份额。

鉴于沃尔夫在书中所做的统计，人们或许将停止对美国财富增长不公平的讨论，这些讨论对最富有的20%的人或大学毕业的员工进行了跟踪。1983－1989年，尽管最富有的20%的家庭所占的财富份额有了实质性的增长，但其中80%－99%的家庭所占的份额却是下降的。换言之，当我们说美国的富人变得更富有的时候，“富人”这个词并不是指公园里的那些雅皮士，而是指真正的超级富豪。

看到这里，保守主义者可能再也读不下去了，或者除了愤怒之外，对我的文章不做任何的反应。不过，对于我的那些忠实读者，我想说明的是：以上统计数据丝毫没有责备谁的意思。当我们说1989年的美国是一个比1973年更不平等的社会时，这仅仅是对事实的陈述，而不是对里根总统的攻击。再回顾一下那个渔夫和淘金者的故事：后一种社会更不平等，并不是因为它的领导层更糟糕，而是因为它处于一种完全不同的环境之中。而且，随着环境的改变，例如市场或技术发生改变，渔夫型的中产阶级社会可能会演变成令人失望的贫富差距悬殊的社会。因此，这未必是处心积虑的政策后果。

事实上，这正是美国今天所发生的事情。富人收入的飙升和穷人收入的减少，并非由罗纳德·里根一手造成。当然，他对高收入者实施了减税，并削减了社会底层的项目预算。不过，财富差距的扩大源自市场内部，体现在家庭的税前收入上（大量的观点论述了市场的变化，如技术进步和国际贸

易）。事实上，财富分配不公现象早在20世纪70年代尼克松、福特和卡特时期就已经出现，而且一直延续到90年代的克林顿时期。这种情形在其他国家也能见到，只是可能没那么明显而已。

有关收入分配的话题一直以来都带有一定的政治性。理由很简单：不平等的程度与政策的制定密切相关。不妨举个例子，在渔夫型的社会中，人们认为只有残疾人、寡妇和孤儿这样的人才可以接受公共资助；而在极端不平等的淘金型社会，不难想象大部分人都会要求那些凭运气发现金矿的人将他们收入中的绝大部分拿出来与其他人共同分享。的确，这样一种再分配方案，没有理由不受到普遍的欢迎。

不过，该方案获得广泛支持的前提是人们对现实情况达成了共识。此外，还有另外一种可能：让我们来看看阿米的《自由的革命》这本书。平心而论，该书的立论不是很严谨，写得也比较粗糙。书中大量充斥着标准保守主义的论调，以及作者武断的臆测。尽管如此，它仍不失为一份重要的研究资料，充分暴露了这位多数党领袖的思路。阿米也曾经是一位经济学教授。关于不平等的扩大问题，他本可以论证我们对它什么都不能做或者不应该做什么。可是，他竟然宣称，根本没有发生什么改变，实际上我们仍处于中产阶级的渔夫型社会。

首先，阿米否认20世纪80年代是富者愈富而贫者愈贫的时期。他写道，统计学家将所有人口分为五个收入组别，称为五分法。按照这种分法，整个80年代的平均实际收入如下所示：

最低的1/5——增加12.2%

次低的1/5——增加10.1%

中间的1/5——增加10.7%

次高的1/5——增加11.6%

最高的1/5——增加18.8%

这组数据来源于美国人口普查局的《当前人口报告》。不过，作者并没有注明，原因可能是怕读者去核对事实，然后就会发现他撒了个小谎。其实，这些数据的时间跨度并非整个80年代，而是1983—1989年。在这段复苏时期之前，美国经济经历了自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衰退，而且穷人受到的影响比富人严重得多。下表中的第一列显示了1979—1983年衰退期的收入百分比变化。

1979—1983年与1973—1989年收入变化的百分数

收入层级	1979—1983	1973—1989
最低的1/5	−14.2	−3.6
次低的1/5	−8.1	3.1
中间的1/5	−6.2	9.0
次高的1/5	−2.9	14.8
最高的1/5	−1.4	26.0

保守主义分子可能会说："经济衰退是卡特的过错，而复苏则证明了里根政策的成功。"我们暂且将政策搁置一边，先来看一个简单的事实：1983—1989年恢复期的最后一年，最低的1/5的穷人收入比1979年还要低，而收入增长的大部分来自最高的1/5的富人。长期来看，从表中第二列的数据（时间始于经济周期的顶峰，即1973年）可以发现不平等有继续扩大的趋势。我们有理由相信，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最高的1/5内部，即最高的5%和最高的1%，甚至不平等的程度更深。

当阿米（以经济学博士的名义）写下上述文字的时候，想必在他面前也

有一张这样的表格。因此，他必定知道，他对80年代所做的描述严格来说是在撒谎。他不会不知道，即使在他精心挑选的时期，收入的不平等也要比70年代严重得多。换言之，他是故意那样写的，目的是误导读者。

更有趣的是，阿米在书中引用了一项研究，认为美国人的收入有极大的流动性。它所传递的信息其实很简单：别担心有人找到了金矿而有人没找到，因为明年你或许就是赢家。他用数字证明1979年最贫穷的人，到了1988年只有不到15%仍留在原组。然后他断言，一个人从最低升到最高的可能性比他停留在原地的可能性更大。同样，他也没有说明这一数据的来源和出处。所幸的是，这些数据很容易找到，它来自布什政府1992年公布的一份报告。该报告刚公布即遭到众人耻笑，作者也迅速被人们所遗忘。

这份研究报告对目标群体1979—1988年每年缴纳的个人所得税进行了追踪调查。因为在此期间，只有近半数的劳动人口有实际的缴税，所以统计结果存在一定的偏差。而报告的作者还将这些数据与总人口进行了比较，最后的结论是：1979年，统计对象中有28%属于收入最低的阶层（占总人口的20%），而到了1988年，这一数字降至7%。

按照阿米的推断，这些人很可能已经跃升到收入最高的阶层去了。委婉地说，这一推断是够蠢的。那份研究报告提到的跃升者，1979年的时候大概只有22岁左右。因此，芝加哥大学经济学教授凯文·墨菲评论道，这根本算不上是经典意义上的收入流动性。就像在大学书店打工的小伙子，到30出头拥有了一份真正的工作，原本就不足为奇。

现实中，从最低跃升到最高的情况是极其少见的。一个典型的估计是，某年收入最低的20%的家庭，只有约3%在10年后成为收入最高的20%的家庭，而近一半的家庭依然原地踏步。更何况，那3%也不是每个人都有霍瑞修·爱尔杰那样的传奇经历。在收入最高的阶层中，包括年收入6万美元的区

域经理，当然也包括沃伦·巴菲特。

阿米绝非笨蛋，他不可能不知道自己是在玩数字游戏。或许他认为，为了追求某个真理，做一点小小的改动又有何妨；也有可能他想进入一种双重思考的状态，此时政治上的投机行为与客观事实之间已经没有多大区别。最终的结果都一样，即他的书就是用来掩盖不平等现象不断加剧这一基本事实的。

我们不必对他的这种做法感到惊讶，因为打着民粹主义旗号的自由市场保守派们，无视广大民众和一小撮超级富豪之间日益扩大的财富差距。从阵容强大的右派政治领导集团身上，我们可以看到可怕的政治愚昧和个人的高傲自大，以及自由主义者中的文化精英主义。所有这些结合在一起，使阿米及其盟友获得了当前的政治地位。

尽管共和党获得了1994年的成功[①]，但是他们依然面临人们的质疑，即在美国，有少数人的收入比所有众议院议员的年薪总和还多，而这些人将是多数党新政策的最大受益者。

对于阿米及其盟友而言，避免这类风险的方法其实很简单，就是不让公众知道太多有关富人和其他人之间收入差距的实际情况。如果有人发布了一份关于收入与财富集中程度的最新研究报告，那么保守派就会动用大量的媒体资源，以各种可能的虚假事实来展开攻势。总会有足够大的地方以及足够多的人来从事这项工作，因为富人拥有你我无法比拟的巨额财富。尤其是他们拥有一些杂志和报纸，而且还经常资助某些智库，而这些智库的成员无论头衔如何，都会按照资助者的意愿来提供他们所需的服务。正如 H. L. 门肯所言，当一个人因为收入来源的原因，使得他的理解力不足以看清某件事的

① 指1994年在美国国会中期选举中共和党取得众议院多数席位的这场胜利。——译者注

时候，要让他了解这件事的真相实在是太困难了。

自由市场民粹主义在政治上的不稳定，或许是国会多数党即共和党决心对一般的经济分析发动突然袭击的主要原因。他们不仅打算取消美国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还想取消所有该领域的国家科学基金（NSF）资助，甚至还计划砍掉美国经济分析局的预算（提供国民收入的基本数据是该局的主要职能之一）。

事实上，上面提到的众多研究机构也为共和党的自由市场理念提供过支持，这无疑是一个巨大的讽刺。不过，共和党精简这些机构的动机很容易理解，因为如果一种信念所依赖的经济学观点与基本事实有所抵触的话，那么这种事实当然是说得越少越好。

沃尔夫的书写得不错，而阿米的书则令人厌恶。我们可以对两者进行如下比较：前者是由一位独立的经济学教授以一种温和的笔调写成的，他对美国社会中的财富分配不公趋势深感忧虑，因此怀着一种良好的改善愿望；后者则是由一位极端的保守主义分子，为了歪曲事实、攻击说真话的人而炮制的"大作"。但愿好书最终能够胜出。





第八章　凋谢的无花果叶：为何保守主义革命总会失败*

“从一月到五月，你拼命工作换来的血汗钱只能用来纳税，好让执政党拿去实现他们制定的优先政策目标。他们认为，无论是出于道义还是实际的考虑，由他们来处理你的收入要比你自己更为有效。在社会的某些角落，老祖母没钱给孙女打电话，小孩子上学没有课本，很多家庭买不起第一套住房……这一切的原因是缺钱。为什么会缺钱呢？因为克林顿政府供养着一批只会花钱的天才，不是资助某种理论或者某项计划，就是增设一个机构。”这些话是鲍勃·杜尔接受提名成为共和党总统候选人之后所说的（其实是由马克·赫尔普林捉刀代笔）。假如你想知道为什么共和党的改革在1995年年初的时候还搞得如火如荼，而不到一年便偃旗息鼓，你就不能不推敲一下杜尔的这番语。

在这篇演讲里，杜尔再三强调：当联邦政府拿走你辛苦赚来的血汗钱后，将它们中的大部分用在了一些与国计民生毫不相干的项目上。供给学派

* 原文发表于《滚石》杂志，1996 年 9 月 27 日。

经济学对减税有百利而无一害的这种承诺，可能给了保守主义者做出一些不负责任的声明的勇气。保守派给公众留下的一种印象是：官僚组织已经泛滥成灾，领取社会福利的人开着凯迪拉克轿车。保守主义者过去能够靠这种言论来逃避责任的一个主要原因是，他们可以将所有的失败归咎于控制着国会的民主党大政府。然后突然之间，他们发现自己已经掌控了国会，因此，这一片得以遮羞的无花果叶也就瞬间消失了。有些右派人士将他们目前的困境归因于战术的失误。例如，要是推选杜尔作为候选人，要是克林顿不那么无耻地窃占右派的立场，要是金里奇没有找空军一号的麻烦，那么保守派早已卷土重来。所以，他们确信挫败只是暂时的调整而已。然而，事实上极端保守主义分子的政治主张，是建立在对联邦政府“是什么”与“做什么”这些极为无知的基础之上的。

要想对保守派的惯常思维与现实情况之间的差异有一个初步的了解，不妨看一看在美国算得上是最好的一本书——《美国统计摘要》。如果有更多的人经常去翻一翻这本书，我相信我们的政治一定会有相当大的改观。我们很容易从《美国统计摘要》中了解到税收的确切去向。例如，在书中列有10项联邦政府施政计划的主要项目，每行后面的数字是该项目占1994财年支出的百分比。

社会安全：21.6%

国防支出：18.9%

贷款利息：13.7%

医疗保险：9.7%

医疗救助：5.8%

联邦职员退休金：4.2%

退伍军人津贴：2.6%

运输（主要是公路、航空等）：2.6%

失业保险：2.0%

国家司法体系（含法庭、法律执行等）：1.1%

这个列表向我们透露了三个方面的重要信息。首先，它包括了政府支出的绝大部分，准确地说是82.2%。所以，任何大刀阔斧精简政府规模的计划，都必须砍掉上表中项目的支出。其次，几乎所有项目都是公众喜欢的。当人们反对大政府的时候，其实并不反对这些支出项目。我们相信，举债是有利的，我们认为应当有强大的国防（事实上，保守派还觉得国防支出不够），我们需要有高速畅通的公路，我们也希望有高效的法律执行体系。也许，唯一不怎么受欢迎的是医疗救助，但医疗救助本身并不是为穷人服务的，而越来越多地是为老人、为养老院提供救济的，这些老人们大多都有属于中产阶级的孩子。

最后，我们可以发现除了国防和贷款利息之外，美国政府目前主要的课税对象是年轻人，然后将这些税收收入转移给老年人。再看看上面那张表，然后回想一下杜尔的演讲——老祖母没钱给孙女打电话，原因是缺钱，即纳税太多——就可以明白他这样讲是多么无耻！可以肯定，那位老祖母的居住条件比她的同龄人以前的居住条件要好得多，因为她和她的丈夫在社会安全体系上的投入要远比她们得到的回报少。她的孩子们可以很轻松地为她支付电话费，而且还会有医疗救助系统提供服务。

还有一种情况可以说明，美国的老人政治已经走得太远：对退休金的支付过于慷慨宽泛，甚至给了那些无须此项福利也能维持生计的人。然而，右派人士对此无动于衷，杜尔的演讲中也没有提到任何这方面的内容。作为小政府的真诚支持者，他们不应该将矛头指向精英化的政府机构，而应该对准佛罗里达州的那些生活优越的退休中产阶级们。

要总结联邦的法规，虽然不像了解联邦的支出那么容易，但它们的核心却是非常相似的，即政府的大部分职能实际上都是为人民服务，而不是将自己的意愿强加给人民。很多人听到嘲弄政府的蜗牛鱼[①]事件之后都会觉得好笑，但不可否认的是，只有少数人会欢迎政府废除某项关于空气或水净化的法律。对于那些一副少数分子模样的政客，选民们会产生怀疑，并做好惩罚他们的相应准备。

当然，联邦政府会浪费很多钱；但同样，私有部门也会产生很大的浪费（你有没有看过最新的《呆伯特》[②]漫画呢？）。杜尔在圣迭戈告诉我们的那种由喜欢干预的精英阶层所组成的专制政府，实际上只是保守派想象中的事物，这也正是金里奇和杜尔反胜为败的主要原因。他们的失败是注定的，因为他们的信念不足以支撑成功之后所担负的责任。

① 指1967年美国政府在小田纳西河上建造水坝快完工时，却发现水底生活着濒临灭绝的蜗牛鱼，因而遭到环保组织起诉。最后，政府不得不下令停止该水坝的继续修建。——译者注
②《呆伯特》是刻画上班族的一部漫画。——译者注



第九章 黄金迷变种：理解右翼的镀金梦*

在古希腊，有一个关于米达斯王“点石成金”的传说：神兑现了给他的许诺，凡是他接触过的东西都会立刻变成金子，连吃的喝的都变成了黄金。最后，这个老守财奴遭到了可怕的诅咒。普通人只是将这个传说解释为对人心贪婪的一个教训，这其实是一种误读。在我看来，米达斯真正的过错在于他对货币经济学的不了解。神是在向我们昭示，黄金只不过是一种金属。如果还有什么特殊之处的话，最多也就是人们觉得用它作为交换的媒介会很方便，仅此而已。换言之，黄金只是人们与其真正欲求之物之间的桥梁而已。其实，还有一些交换媒介，并非只有黄金。因此，如果将这种实用、漂亮的物质当成不可替代的东西，那么实在是愚蠢之极。

然而，如今还有很多人没有吸取教训。这其中，绝大部分是那些偏激的保守主义分子。一些倡导供给学派的人士，包括杰克·坎普、史蒂夫·福

* 原文发表于《滚石》杂志，1996年11月22日。

布斯和罗伯特·巴特莱（《华尔街日报》主编），坚持认为回归金本位是保持经济繁荣的关键所在。早在60年前，凯恩斯就曾宣称：金本位是一种“野蛮时代的遗存物”。幸运的是，这些后起的米达斯们，不可能拥有一根可以控制实际货币政策的金手指，但他们无疑是很有影响力的。作为共和党内部的重要派系，他们正在努力影响共和党的主张。我们可以通过金本位这一信条，来了解他们的大致思路。

存在这种可能性，即我们迫于某种原因不得不回到金本位。不过，这种情形实在是太糟糕。因此，大多数明智的经济学家都认为这不太可能发生。那些现代黄金迷（我们暂且将他们称为黄金迷的变种）的想法，实在是疯狂之极。他们对黄金的迷恋，不是实用主义的态度，而是表现为某种神秘主义。

当前的世界货币体系并没有给黄金留下特殊的位置。实际上，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简称美联储）也不承担将美元和任何东西挂钩的义务。它可以在认为合适的时机根据需要加印或少印钞票。这种无约束的体系，有着极大的好处。首先，美联储的自由度很大，因此一旦遇到实际的或潜在的经济衰退，可以向体系内注入货币以增加流动性。不妨举一个实际的例子，1987年的美国股灾起因于货币流动性的缺乏，如不采取措施就会酿成另一次经济大萧条。当我们向市场注入充分的流动性之后，这次股灾并没有引起实体经济的大衰退。

尽管允许自由浮动的货币体系优势明显，但同时也面临着巨大的风险，它会给国际贸易和投资者带来潜在的不确定性。在过去五年中，1美元可兑换的日元从120到80不等。这种浮动究竟需要付出多大的代价，其实是很难具体衡量的，部分原因在于成熟的金融市场对绝大部分此类风险的消化能力比较强。不过，可以肯定的是，这种代价不容忽视。进一步来讲，这个体系不但

赋予了货币管理当局行事的自由，也为他们提供了不负责任的机会。这一点已经在某些国家得到了应验，比如阿根廷就是一个例子。这个国家曾发生过多次严重的通货膨胀，每一次都得出如下结论：货币独立，犹如盛着毒酒的圣杯！当前的阿根廷国家法律中有一条规定：1比索[①]与1美元等值。而且，每1比索的发行，都必须有1美元的储备。

因此，关于是否将一国货币与某个外在标准相挂钩，并没有绝对的答案。一种方案是，在货币与货币之间设置固定的汇率，甚至采用共同的货币，它可以使国家与国家之间在兑换货币时的不确定性得以消除。对于那些历史上曾有过不负责任劣迹的国家而言，这种方案可以帮助它们重建信用。意大利政府想加入欧洲货币联盟的重要原因是，它希望按照德国的利率重新为巨额外债申请贷款。不过，这种方案会遇到下列麻烦：如果两个国家的货币已经挂钩，其中一个正经受严重的通货膨胀，另一个则正经受严重的通货紧缩，我们该怎么办？这种情况完全有可能发生。20世纪90年代初期，欧洲其他地区的失业率都达到了两位数，唯独联邦德国的经济快速增长，甚至出现了通货膨胀。由此可见，适合A国的货币政策，未必就适合B国。这些鲜活的例子，充分说明了货币政策本身存在某种模棱两可——它可以解释为什么睿智的经济学家们在遇到欧洲共同货币这一难题时，会分成不同的派别。我个人的观点是：一般而言，共同货币的建立将导致欧洲陷入更深的失业状态。不过，有很多人并不同意我的这一看法。

那么，黄金是怎样被牵扯进去的呢？即使一些国家根据理智的判断做出了放弃货币自由浮动的决定，一般也是将某个负责任的国家的货币作为外在基准。例如，美元拯救了阿根廷，而意大利则受益于德国马克。黄金迷们的

① 比索是西班牙前殖民地的货币，有阿根廷比索、墨西哥比索等。——译者注

潜台词是：现实中的美联储和德国银行都只是普通人，谁能保证它们不受滥发钞票的诱惑？为什么不把货币的基础建立在客观的标准之上，而非要去相信人的智慧呢？为什么不效仿我们的先辈，将货币直接与黄金挂钩？

关于这种想法，很少有经济学家会表示赞同，因为它代表的是某种神秘主义，而不是务实的态度。首先，金本位制具有严格固定汇率体系的所有缺点，即使是那些支持欧洲共同货币体系的人，也认为如果将欧元与美元或日元挂钩，那就走过头了。其次，更重要的一点是，黄金的价值相对于其他物品和服务而言并不稳定。毕竟，它只是一种消费品而已，价格受到某些行业的影响很大，比如牙医业，而这一行业与世界经济并无太大干系。

自1971年之后，美国就已经放弃了稳定金价的政策。从那以后，黄金的价格已经上涨了大约10倍，而同期的消费品价格则上涨了250%。由此可见，如果我们仍然维持金价不变，那么其他商品的实际价格将会出现较大幅度的下跌。换句话说，将出现自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通货紧缩。因此，金本位绝不是一种好的体制。

那么，杰克·坎普和罗伯特·巴特莱等人，为什么要盯住金本位不放呢？当我读到裘德·万尼斯基写给《琼斯母亲》（一本左倾的杂志）的一封信时，才彻底明白了他们的逻辑。作为供给学派经济学的奠基者之一，万尼斯基也是该学派的教父。信的主要内容则是对近三十年来富人更富这一事实的否认。下面这段话值得关注：

> 首先，我们必须改变计算资产价值的单位，也就是放弃什么也不是的纸币，代之以人类已经使用了近6000年的黄金（单位：盎司）。现在的道·琼斯工业股票平均指数（DJIA）为6000点，换算成黄金之后，我们会发现它的价值只有30年前1000点时的不到60%，因为当时的黄金价格是每盎司35美元，现在则上涨至每盎司380美

元。事情再清楚不过：在过去的30年间，美国人丧失了40%以上的以权证、股票等形式持有的财富；越是穷人，损失越少，而富人因为持有大量的股票，恐怕在这一轮经济衰退中连裤子都给赔进去了……

关于道·琼斯指数能否恰当反映美国的社会财富，这与我们现在正在讨论的主题毫不相干。这里的重点在于，万尼斯基将黄金当做衡量财富的标准，而毫不关心它能购买到多少实际的产品和服务。有一个事实：从1970年美元与黄金脱钩以来，道·琼斯指数已经上涨了七倍，而与人们福祉关系最密切的商品，包括食物、住房、衣服、汽车和服务的价格，大约上涨了250%。由此可见，美元的购买力除了黄金以外均大大提高了。然而，万尼斯基说这些普通的商品都不重要，只有黄金才有价值。显然，万尼斯基又犯了米达斯王的错误：他忘记了黄金只不过是一种金属，真正的价值来自用于交换的日常物品。

我不知道神是否会光顾我的这个专栏。如果会的话，他们知道怎么做。







第三部分

全球化与全球胡话



克莱尔·布斯·卢斯发明了“全球胡话”（Globaloney）这个有用的词汇，她的原意是指那些与地缘政治有关的空谈以及大话。不过，这一称号对当今的某些政客或权威来说却完全适用，因为他们喜欢将世间发生的每件事情都纳入全球化这一模糊的概念范畴中。作为一种现象，全球化当然是真实存在的。比如，国际贸易和国际投资的增长速度比世界经济增长速度要快得多，从而导致各个经济体正在日益丧失其独立性。然而，无论是全球化所造成的影响，还是各国彼此之间的依赖性，都有被人为夸大的成分存在。甚至在许多知识分子眼中，存在妖魔化全球化的强烈倾向，认为它应当为所有的罪恶负全责，而贸易与投资的增长不过是肥了那些资本家而已。

这个部分的第一篇文章“我们并非世界”，正是为了纠正上述倾向而写。至少对于美国而言，它并不是经济全球化的牺牲品。然而，该文一经发表，立刻引起各方非常强烈的反应。其中，特别令人惊讶的是，这些尖酸刻薄的评论置本文的主要论点于不顾，却紧紧抓住了一小行注解——经济全球化对第三世界的穷人们是大有好处的——来借题发挥。我原本以为那不过是一些明显的事实而已，但现在看起来它还需要更进一步的讨论。因此，就产生了第二篇文章“高赞廉价劳动力：低工资、坏工作总比没任何工作要好”。

最后一篇是“东方已在翻红：中国贸易的平衡视角”。此文讨论的是近来迅速流传于政客和权威人士之间的观点：新兴工业化国家的经济增长将导致全球生产过剩，因为这些国家只产出不消费，只出口不进口，而中国表现得最突出。在本文中，我将以香港回归中国的例子为证，对他们的说法进行一番剖析，从而发现对这一案例来说，在理论和实务两方面都存在很大的误解。希望读者们也能从这一堂轻松的贸易平衡经济学课程中得到一些启发。





第十章　我们并非世界 *

货物、资本和技术在各国间的快速流动，彻底改变了世界经济的游戏规则，这已是众所周知的事实。传统的智慧告诉我们，国家已不再拥有完全控制其命运的力量，而政府甚至可能任凭国际市场摆布。

很多人对此欢呼雀跃，他们认为无论富人还是穷人，都已经从中受益。然而，也有越来越多的人，包括新闻业者、工会领袖、两党政客甚至商界人士，对此痛恨不已，在他们看来，正是全球化导致了不稳定、失业以及收入的下降。

事实上，上述两种观点都是错误的。它们的共同点是，想当然地认为全球化无所不能。因此，没有意识到有关国家丧失自主权之类的报道显然过于夸张。

---

* 原文发表于《纽约时报》，1997 年 2 月 13 日。版权归《纽约时报》所有，重印时已获得其许可。

随着全球化的发展而对它产生某些幻想，倒也可以理解。近半个世纪以来，世界贸易的增长速度超过了世界产出，而国际资本的流动也比以往任何时期都迅速。新兴工业化国家的出口快速扩张，无疑对发达国家的低技术工人造成了沉重的压力，但它却为第三世界的数千万人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会。我将在下一篇文章中指出，虽然第三世界工人的工资仍处于令人吃惊的低水平，但是同他们以往的极端贫困相比，已经获得了极大的改善。

全球经济整合的程度的确是在进一步加深，但其速度远没有全球化的批评者认为的那样快。威廉·格雷德最近出版的新书《资本主义全球化的疯狂逻辑》，对“罪恶”而“失控”的经济全球化进行了讨伐。帕特·布坎南和罗斯·佩罗等政客，则专以攻击开放市场为业。连金融大鳄乔治·索罗斯也在《大西洋月刊》（*Atlantic Monthly*）上发出警告：对一个“开放社会”来说，当代全球资本主义的威胁比极权主义还要大。

上述这些全球胡话正在日益普遍化。有许多观察人士正打算将全球市场视为本国经济与社会问题的根源所在。即使有时候事实清楚地表明，问题的症结主要在国内——通常是来自政治上的因素。

例如，全球化的批评者常常会引用法国的例子。按照他们的说法，法国的失业率已经达到了两位数，尽管政府采取了很多措施，但收效甚微。这充分说明，国家在面对缺乏人性的世界市场时，已经失去了影响力。最近在《纽约时报》上有一篇文章，上面说道：法国什么也做不了，因为“欧洲经济的整合是适应全球市场竞争的需要”，而法国显然必须配合这种整合。

法国的政策，看起来的确是自相矛盾的，但其中的原因并不是缺乏人性的市场力量，而是法国国内有威望的政治家有意不让法郎对德国马克贬值。英国则不同，它愿意让英镑对马克贬值，因而能够逐步地降低失业率，同时也并未产生不良后果。换言之，法国陷入困境的根源，在于政治而非经济。

诚然，法国必须符合1991年《马斯特里赫特条约》——旨在建立单一化的欧洲货币——所开列的条件，但这个条约的目标与其说是经济上的，倒不如说是政治上的，它主要作为欧洲统一的一个象征。许多经济学家纷纷指出，货币统一的代价将会超过它所能带来的利益。因此，更确切地说，是该国的政策击败了市场，而不是相反。

美国的情况又如何呢？联邦政府和美联储一直在努力振兴经济，这是不是就没有问题了呢？全球化的批评者对此的惯常态度是：美国或许在国内创造了大量的就业机会，但普遍存在的企业裁员使得就业情况变得异常脆弱，而裁员正是对国际市场竞争的一种反应（这个思路也为企业提供了裁员的好借口）。

1996年初，《新闻周刊》以“打击手”为题，大篇幅地报道了负责裁员的公司经理人，包括美国电话电报公司、纽约电话公司、西尔斯公司、菲利普·莫里斯公司和达美航空公司等在内的公司总裁，都赫然在列。国际竞争确实在某些企业裁员行为中产生了不小的影响。可是，《新闻周刊》也承认，它不是裁员最重要的原因。据我所知，日本的会社并未在我打长途电话上参与美国公司的竞争，韩国的企业集团也没有为我提供本地的电话服务。而对大部分美国人来说，他们还没打算到墨西哥的商店购买家居日用品，或者改抽法国香烟。如果我从波士顿启程前往纽约，更不可能乘坐国泰航空公司的航班。

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使得全球化的重要性经常被高估呢？我认为，部分原因是出于精打细算的考虑，因为对全球化的高谈阔论很容易吸引人们的眼球，从而提高自身的知名度。在一些重要的场合，这种效应尤为明显。比如，瑞士小镇达沃斯的世界经济论坛年会，或者南卡罗来纳州希尔顿总部的文艺复兴周末聚会等。

当然，还有一个更深层次的原因，那就是左派和右派之间达成了某种非同寻常的默契，他们假装有外部的全球化力量在起作用，即使实际行动都是完全本土化的。

很多左派人士一直不喜欢全球市场这个概念。他们对市场的认识就是一个没有人管理的场所。实际上，那只看不见的手正支配着大部分的国内市场，而多数美国人也接受这种生活方式。但是，对于希望加强社会管制的人们来说，由那些住在遥远国度、名字奇怪但具备经济影响力的人所引起的普遍不安，正好为他们提供了理由，使他们可以从意识形态的高度来对全球化进行攻防。同时，很多右派人士也利用了经济全球化的概念。他们认为，人们不应该再期望企业承担任何的社会义务。例如，他们高举着竞争的旗帜，坚决反对环境管制。他们对任何可能增加美国企业成本的措施都提出警告：我们的产品将被世界市场淘汰出局。

既然经济全球化并不像普通人认为的那么重要，那么，由众多专家炮制出来的全球胡话是否已经产生了实质性的伤害呢？答案是肯定的。至少，公众已经被严重误导，他们相信所有的国内问题，都是因为国际贸易而产生，从而可能引发贸易保护主义。这样一来，全球化给人们带来的诸多好处将会大打折扣。除此之外，夸夸其谈还有一种微妙的后果，那就是宿命论的风行。既然问题如此严重，我们怎么可能与它对抗呢？只有乖乖就范。事实上，这种宿命论在西欧国家已经广为流传，那里的人们经常含糊地说，是世界市场造成了“经济恐怖”。也许，他们忘了问题的背后还有推行糟糕政策的国内领导人。

对于美国的经济和社会政策来说，没有一个重要的约束来自于国外。在现有的资源条件下，我们本可以为穷人和不幸者提供更好的福利和照顾。如果说我们的福利政策正变得越来越严苛的话，那也只是我们做出了政策上的

选择，绝非迫于某种未知的外部压力。毕竟，我们不能将一切行为的责任，都推卸给全球市场。





第十一章 高赞廉价劳动力：低工资、坏工作总比没任何工作要好*

在菲律宾首都马尼拉，曾经有一座巨大的垃圾堆放场，号称烟山，它经常被媒体用来展示第三世界的贫穷。多年以后，这里成了一个象征性的符号。成千上万的男人、女人及其小孩，以烟山为谋生的场所。他们忍受着恶臭、苍蝇和有毒物，在种种威胁下，从成堆的垃圾中清理出可回收物，包括废弃了的金属物。他们宁愿天天捡垃圾拾荒，因为与过去的状况相比，全家现在如果干上一天，就能换得10美元的收入。

如今，这群人已经不见了，因为菲律宾政府要举办环太平洋峰会，为了装点门面，警方将拾荒者全部驱离。我最近收到了一堆不怀好意的邮件，看完之后，思绪就一直停留在马尼拉的这座烟山上。

事情的起因是我曾经给《纽约时报》的评论版写过一篇文章，名叫“我们并非世界”。我在该文中指出，在第三世界国家，新兴的出口工业虽然只

* 原文发表于《滚石》杂志，1997年3月20日。

为工人们提供了极低的薪水和恶劣的工作条件，但是“同他们以往的极端贫困相比，已经获得了极大的改善”。没想到，这段评论竟然引来了大量愤怒的声讨。其中，有这样一段话：“你是待遇优厚的美国教授，所以对你来说，一个12岁的童工无关痛痒。换做是你的话，你愿意干那种一天只挣2美元的活吗？”

义正词严的道德怒吼！诸如此类的话，通常出自全球化反对者的口中。所谓全球化，意思就是技术和资本的转移——从高收入国家转移到低收入国家，并引起这些国家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出口增长。那些批评者，其实心中充满成见：任何人，只要敢对上述过程说句好话，那么他不是幼稚，就是腐败，反正都是全球资本压迫国内外劳动者的代理人。

然而，事实并非那么简单，道德的界线也没有那么清楚。我想说明的是：全球化反对者们总是一副清高的样子，他们高唱道德腔调，以立场来划分人，而不是对问题进行实事求是的思考；他们看不到，虽然体态臃肿的资本家从全球化的过程中大捞好处，但是最大的受益者，其实还是第三世界的穷苦劳工们。

遍及全球的贫困现象，并非跨国公司榨取利润的产物，也不是最近才出现的。假如将第三世界国家的时钟往回拨20年，其他国家则保持不动，我们会发现，当时虽然在亚洲有几个小国家开始引起人们的注意，但是像印度尼西亚或孟加拉国这样的第三世界国家，经济方面还一直维持原样，即依赖原材料的出口，同时进口工业产品。它们的制造部门效率低下，受到进口配额制度的保护，负责国内市场的供应，只能创造少量的就业机会。另外，迫于人口的压力，许多农民跑到最偏远的地方去开垦，或者寻求其他的谋生方式，其中就有一些人在垃圾山的附近住了下来。

由于雅加达或马尼拉缺乏赚钱的机会，所以你只需支付很低的工资，就

可以很容易地雇到劳动力。不过，20世纪70年代中期，尽管发展中国家拥有廉价的劳动力，但它们的产品在世界市场上仍然缺乏竞争力，因为发达国家的优势非常明显，有实力向本国的工人支付高于发展中国家10倍乃至20倍的劳动报酬。这些优势，包括先进的基础设施和关键性的专业技术、庞大的市场规模和便捷的零部件供应，以及稳定的政治环境和设计精巧的社会协调机制等，所有这些共同造就了发达国家高效的经济体系。

然而，从那以后，情况开始悄然发生改变。有一些我们至今仍然无法充分理解的因素——例如，关税壁垒不断降低、电信设施得到改善和空中运输变得更加便宜——出现了，因此发展中国家的劣势得以弥补（尽管如此，将生产放在发达国家有时仍不失为一种好的选择，因为我们经常听说，某某公司将它的制造部门转移到墨西哥或东亚地区以后，在当地遭遇了各种阻力，最后不得不撤退回来）。在相当多的生产领域，发展中国家的产品已经成功打入世界市场。比如，以前可能只卖黄麻或咖啡，现在可以制造衬衫和运动鞋并大量出口国外。

对于那些在衬衫厂或鞋厂工作的工人来说，无法避免的一点是，他们只能领取微薄的薪水，而且必须忍受恶劣的工作环境。之所以说“无法避免”，是因为我知道那些工厂的老板并不关心员工的身心健康，他们只想着给工人们最低的工资，具体怎样低还取决于当地的人们在找工作时的难易程度。这些国家仍然贫穷，因此即使是住到垃圾山附近，也会有很大的吸引力。

我们必须看到，哪里有新兴的出口工业，哪里的生活水平就会得到明显的改善。原因在于，一方面要吸引到劳动力，就必须提供比原先更高的报酬；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制造业的发展将与其他出口部门之间形成交互作用，从而产生涟漪效应，最终惠及整个国民经济。由于要征用农村的土地来

办工厂，因此农村的收入将随之提高；当渴望工作的城市失业大军逐渐萎缩，工厂之间将为劳动力资源展开争夺，于是工人的工资随之提高。这个过程将持续下去，直到当地的平均工资达到美国青少年在麦当劳餐厅打工的收入水平，比如韩国和中国台湾地区就是如此。最后，人们自然不再向往垃圾山（烟山的情况不一样，它会持续到最近，因为菲律宾并没有像邻国那样建立起出口导向型的经济体系，该国国内比拾荒更好的工作实在是很少了）。

对于新兴工业化国家来说，出口导向型的经济体系给人民带来的普遍利益，不是理论上的推测，而是实实在在能看到的。以印度尼西亚为例，它仍是一个穷国。如果以一般人吃到的食物作为衡量标准，那么该国的进步是非常明显的：1970年，每人每天摄取的热量不足2100千卡，如今这个数字已经超过2800千卡。尽管该国目前仍有1/3的儿童营养不良，但是1975年的时候这个比例甚至超过50%。类似的改善在环太平洋国家处处可见，甚至在孟加拉国也是一样。这些改善不是因为西方慈善界人士的资助——外国援助向来很少，近来更是大大萎缩。而且，这些国家的政府并没有变得更加仁慈，相反，它们同以前一样既冷酷又腐败。正确的答案是：这些改善是一个间接和无意的过程，即冷酷无情的跨国公司和贪婪的当地企业家，为了赚取最大的利润，充分利用了廉价的劳动力从事生产。的确，这种事情并不光彩。姑且不论其动机，反正最后的结果是不计其数的人脱离了赤贫的状态。也许情况仍然很糟糕，但是已经改善了不少。

那些给我写信的人，为什么要生那么大的气呢？难道说，在印度尼西亚某个鞋厂，工人们正在缝制运动鞋的场景（每小时赚60美分），会比在该国某块土地上，农民们正在辛勤劳作（每小时赚30美分），或者在菲律宾的某个垃圾山，一群妇女和小孩正在拾荒这样的场景，更能牵动人的感情吗？

作怪的是某种吹毛求疵的心态：在鞋厂劳动的工人和在自己土地上忙碌

的农民不同，他们是在为我们卖命，而所得的工资待遇有些像奴隶，于是我们觉得有一种罪恶感。所以，一些自以为是、反对全球化的人，纷纷提出了要求统一国际劳动力标准的主张。这些人会说，除非鞋厂和衬衫厂向工人提供像样的工资和良好的工作条件，否则我们不应当购买他们生产的产品。

乍看起来，这种要求合情合理，但是仔细一下：果真会如此吗？让我们设想一下它的后果吧！

首先，在第三世界的新兴出口产业中，即使工人们获得了更高的工资和更好的工作条件，也无助于改善那些占总人口比例最大的人——例如，农民、小时工和拾荒者等——的处境。最极端的情况是，一旦强迫他们照搬我们的劳动力标准，那么将在当地形成一个享有特权的“劳动者贵族”，而其他大多数人却依然穷困潦倒。

其次，有可能出现另外一种情况。对于发达国家而言，其工业体系的优势是根深蒂固的；而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只有凭借廉价劳动力的供应，才能与发达国家的工业品相竞争。如果连这仅有的优势也丧失殆尽，那几乎等于扼杀了它们继续发展的可能性，甚至连已经取得的成就都无法保住。这些以出口为导向从而使经济获得增长的发展中国家，尽管体系内不可避免地存在各种不公正，但是无疑也为绝大多数人民创造了巨大的利益。因此，任何措施，只要阻碍了这种增长，都显然不符合他们的利益。在理论上承诺提供好工作的政策，到了现实中却可能导致无工作可做；虽然缓解了我们良心上的不安，可是计划中的政策受益人却化为了泡影。如果是这样，要这些政策还有什么用？

也许你会说，做人要有骨气，就算穷困潦倒，也不应为那些有钱人服务，去从事伐木、抽水和缝鞋的事情。但是我问你：他们还有其他的选择吗？是不是要让他们等待外国的经济援助呢？你不要忘了，意大利南部地区

的历史表明，这种援助只会产生持久的依赖倾向。任何大规模的经济援助，从来没有获得过几许成功。那么，是否可以期待贫困国家的政府去扭转社会的不公正呢？理当如此！然而问题在于，他们才不会这样做，至少不会马上按你的意思办。所以，如果你想不出一种办法能够取代低工资的产业，那么强迫取消它，就意味着你无视这些产业为改善穷人生活所提供的最佳机会。你之所以会觉得不舒服，是因为它们不符合你的审美标准，换句话说，你不喜欢工人们为了一点微薄的工资就低下头来，为西方人生产时髦的商品。

总之，给我写信的人只会摆出一种自以为是的姿态，却并没有把问题搞清楚，他们的观点不值一驳。当你的愿望和数亿人密切相关时，尤其需要全面而周到地考虑清楚，然后再行动，这不仅是形成思考习惯的一个要求，更是道德上的一种义务。

关于全球化的一个注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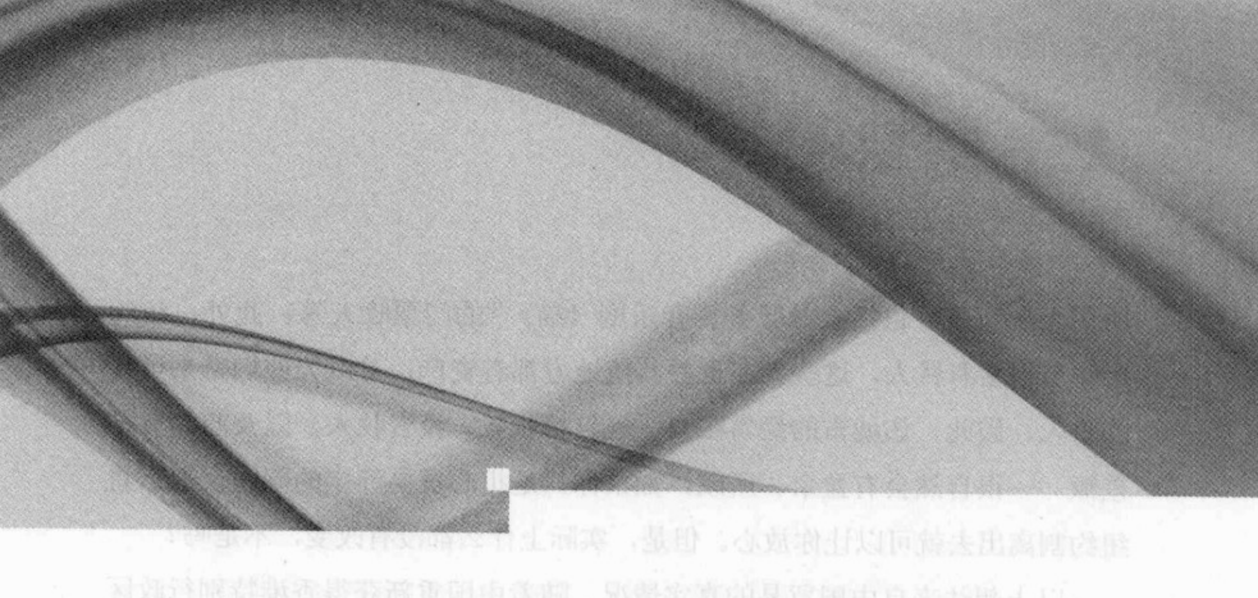
津巴布韦的蔬菜出口量，最近有加速增长的迹象。我最喜欢引用这个例子来讨论全球化背后的驱动力量。近年来，哈拉雷（津巴布韦首都）附近的菜农开始向伦敦市场供应新鲜的蔬菜。他们首先对蔬菜进行拣选，然后用卡车运往机场，经过一夜的飞行，抵达伦敦希思罗机场，最后在第二天清晨便可以出现在乐购超市的货架上。

这种出口业务至少需要具备三个条件。首先，必须有廉价的空中运输，而波音飞机已经成为现代商业“可抵达任何港口的不定期货轮”。其次，必须拥有现代化的电信设施。从下单到配送，菜农都需要获得相关的信息。而在过去，这种通信方式只有先进国家才能提供。最后，需要一个开放的英国市场，如果存在进口配额或高关税壁垒，那么这项业务就不可能完成。

现在，你对这件事情的看法是不是有所改变呢？请注意以下事实：蔬菜生产是一个需要适宜技术的产业。也就是说，这种生产方式是劳动密集型的，它需要人工种植，并经过手工拣选，辅之以较少的机器。因此，这些专业的蔬菜农场为该国创造了大量的就业机会。它们在成本上拥有竞争优势，因为支付给工人们的工资很低，而工人们由于缺少其他的赚钱机会，因此很乐意获得这份收入。除此之外，所有的工人都是黑人，而雇用他们的则是白人。这些白人先前都是殖民者，他们在津巴布韦的新政权成立后，选择了继续留下来。







第十二章　东方已在翻红：中国贸易的平衡视角 *

你知道消除美国贸易赤字最简单的办法吗？答案是，只需要宣布：从今以后，纽约市成为独立实体，拥有自己的国际收支账户核算。我敢保证，这个国家其他地区（我们称之为美国大陆）的贸易赤字一定会马上消失。

如果真的这样做，那么进口到纽约的商品都不再登记为美国国际收支账户上的借方，而且所有从美国大陆运往纽约的商品将记为出口。虽然从纽约运往世界各地的商品不再是美国的出口，同时运往美国各城市的商品则必须记为进口，但由于纽约并不做或基本不做实物生产，因此这些进出口加起来也微乎其微。可以预见的是，纽约市将会处于贸易赤字的状态，其数字甚至要大于全美当前贸易赤字的总和。所以，一旦将纽约分离出去，美国大陆的贸易就能实现盈余。

当然，纽约对外的无形商品输出，将弥补它自身绝大部分的贸易赤字。

---

* 原文发表于《滚石》杂志，1997年7月17日。

所谓无形商品，包括金融服务、音乐剧《猫》[1]的门票收入等。此外，纽约还住着很多有钱人，这些人在世界其他地方都有资产，可以为他们带来可观的收入。因此，该城市的经常账户——包括服务、投资收入，以及商品贸易差额——很自然会有盈余。所以，如果你只是担心贸易赤字的问题，那么将纽约割离出去就可以让你放心。但是，实际上什么都没有改变，不是吗？

以上想法来自中国贸易的真实情况。随着中国重新获得香港特别行政区的政治主权，将它们视为两个独立经济体的借口，也将不复存在。因此，那些将中国的贸易顺差视为威胁的人们，应该可以放心了。近年来，中国内地（不包括香港地区）的贸易盈余数额巨大，而且增长速度很快。但是，如果加上香港地区，则贸易盈余并不多。例如，1997年4月之前的一年，中国内地的贸易顺差为240亿美元，而主要提供服务业的香港地区同期则有190多亿美元的逆差。因此，两者相抵后为顺差46亿美元，这一数字并不是很显眼。换言之，中国巨额的贸易盈余主要是由统计方式所造成的幻觉：该国有很多产业的经营权和所有权，在统计时界线非常模糊。

尽管说出这些事实并不能改变什么，但它或许可以缓解很多人的恐惧。这种恐惧，深深困扰着那些主张敲打日本的人，他们就像冷酷的古代武士，正四处寻找新的敌人。

最近，阿兰·托尼尔森在《纽约时报》上发表了一篇书评，清楚地向我们展示了一种特有的恐惧。文章评论的对象是前商务部副部长杰弗里·加藤所著的《十大新兴市场：它们将如何改变我们的生活》。我之所以会被这篇书评吸引住，是因为我发现它与国会众议院少数党领袖（即有望问鼎总统宝座的理查德·格普哈特）所做的演讲非常吻合。托尼尔森一方面吹捧加藤，

[1] 《猫》是纽约百老汇剧院的第一长寿剧目，由安德鲁·劳埃德·韦伯作曲。——译者注

认为“十大新兴市场将越来越有能力制造出物美价廉的产品和服务，从而降低美国人甚至是富人和高学历者的生活水平”，另一方面又驳斥他关于发展中国家（包括中国在内）将成为发达国家重要的出口市场的想法纯粹是妄想，“这些新兴国家的消费市场在今后几十年内都不可能成长起来，如果它们不刻意维持低工资和低购买力，将很难吸引到外国投资，因而其外债的偿付和经济的增长都会出现问题”。

当权威人士发表此类看法，尤其是在重要的场合时，我常常感到庆幸，因为这样我就可以破除人们对大人物的迷信：以为他们的想法——可能在社会上获得广泛支持——一定是正确和有意义的。

托尼尔森还宣称：“新兴市场的经济增长，即产品和服务的生产、销售均大幅增加，然而它们在支出方面却没有相应地增加。”也就是说，它们将拥有巨额的贸易盈余。然而，当经济增长时，总收入必定会随产品的价值而增加；你或许会否认工资也将上涨，但人们的收入必定会在某个时候获得提高。我们凭什么臆断：新兴国家的人们和发达国家不一样，他们根本没地方花钱吗？

事实上，对新兴经济体的一个合理预期是，它们至少将在经常项目上出现贸易赤字。因为这些国家急需引进外资，所以它们会让投资超过储蓄，也就是说，支出高于收入。具体而言，凡是通过引进外资来偿付外债和提升经济实力的国家，按道理必须保证其所购买的产品和服务的价值高于它们所销售的产品和服务。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处于贸易赤字的状态。

当一个国家结合了第一世界的生产力和第三世界的工资水平时，它就拥有了巨大的成本优势，怎么可能还会出现贸易赤字呢？事实上，这个问题的前提就错了：如果新兴经济体的生产力增长，那么它的工资水平也必定随之上升。因此，那种认为新兴经济体“越来越有能力制造出物美价廉的产品和

服务”的想法是不可能实现的。

就算我的逻辑是正确的，我想很多读者也会觉得以上描述与事实并不相符。毕竟，第三世界国家已经拥有了大量的贸易盈余，而且工资水平并没有伴随生产力而上升，对吧？

那么，就请随我一起做更深入的统计吧。你可以去买一本《经济学人》杂志，然后翻到最后一页，这里有一些表格列出了许多新兴经济体的每周经济数据。我想，你一定会感到吃惊：加藤书中提到的10大新兴经济体中，有6个都出现了贸易赤字，而将它们合在一起计算时更是如此。经常项目出现赤字的有9个，而在表格所列的所有25个经济体中，有17个都出现了贸易赤字，经常项目出现赤字的则有20个。如果在美国劳工统计局的外国劳工统计网站上查看一下有关工资的数据资料，我们会发现：1975年，中国台湾地区和韩国的每小时工作收入为美国同类工作的6%；而到了1995年，两个地区的收入已经分别达到美国的34%和43%。

以上事实验证了“乐观派”经济学家的观点，而与那些冷冰冰的消极看法完全相反。然而，持消极看法的人们并不会认输。像托尼尔森或格普哈特这样的聪明人，绝不是因为无知，他们显然带有故意的成分。毕竟，对于一位专职从事贸易写作的评论家来说，不仅要在文中频繁提到第三世界的威胁，还必须引用统计数据充实他的文章，他不可能注意不到那些新兴工业化国家的贸易赤字，或者它们的工资水平与过去相比已经有了很大提高这些情况。而且，从事这种职业的人如果不能领会简单的算术公式，即吸引大量外资一定会导致贸易赤字，那他们的基础素质就太差了。

或许，这种视而不见的神秘能力来自他们对中国的过分关注。的确，从表面上看，中国在吸引外资的同时，还拥有大量的贸易盈余。我们曾经指出：这些盈余的大部分来自统计上的幻觉。不过，话又说回来：为什么中国

在吸引大量外资的同时，并没有引起相应数量的经常项目赤字呢？那些钱去哪里了呢？

一条有用的线索是：重新查看一遍《经济学人》杂志的最后一页，找找看哪个国家的贸易盈余最高。是不是俄罗斯呢？答案是肯定的。这并非因为俄罗斯经济拥有超强的竞争力，事实上，它恰好反映了俄罗斯糟糕的社会现状。在这个国家，没有安全感的商人和腐败官员，将他们获得的一大部分国家外汇收入转移到国外以躲避风险，而这些外汇收入本来是可以用于支付进口的。

再回到中国，其实也存在类似的情况，只不过程度稍微轻一些而已。国内流出的资金抵消了流入中国的外资，在这些外流的资金中，有很多正如香港回归前所创建的海外避险私产那样，一旦回归后，就可以为通过诚信经营积累了大量财产的香港人提供服务。

我绝不是在为中国政府辩护，我只是不担心中国的贸易盈余，我想你也不应该担心。

关于“东方已在翻红”的一个注记

在美国，绝大多数主张敲打中国的人其实并不在乎中国内地（不包括香港地区）总体的贸易盈余，他们关心的是中国和美国之间似乎非常巨额的双边贸易盈余。我之所以要加上“似乎”这两个字，是因为对具体数字还存在很大的争议。问题在于，我们很难区分中国内地和香港地区的经济。这一点也不奇怪，因为美国对中国内地的出口有一部分必须经过香港地区。而且多数专家都同意，美国方面的出口数字高估了香港地区——对香港地区出口500亿美元这个数字明显被夸大了，300亿美元还差不多——而低估了中国内地，

即使没有低估，在考虑中美贸易差额时如果将香港地区排除在外，那就相当于在考虑美加贸易差额时不计算纽约市的进出口额一样，都是极为愚蠢的。

许多分析家特别指出，美国从中国内地进口的增加，反映了原先在香港和台湾地区的生产基地向内地转移的现实；在美国对中国内地贸易赤字上升的同时，对上述两个地区的贸易赤字却呈现下降的趋势。因此，美国与上述三地的贸易逆差虽然仍在增加，但其增幅远不及单单考虑与中国内地双边贸易时的情况。

以下我将继续深入分析中美贸易失衡的原因。这种失衡，的确反映出美国开放市场和其他国家封闭市场之间的贸易不对称。不过，表现最为明显的并非中国，而是另一个发达国家——日本。

请记住，总体的贸易差额是由储蓄和投资之差来决定的。从表面上看，这似乎和贸易政策毫不相干。现在，让我们假设又出现了一个生产制造国，打算出口劳动密集型的产品并进口大约等值的高技术或资本产品。由于一些国家（如美国）的市场相当开放，而其他国家（如日本或法国）却设下了层层关卡以阻止该新兴经济体的产品出口到其国内，那么很显然，新生产国会将它的大部分产品都出口到市场相对开放的国家。然而，它并不会从该国购买同等价值的产品。这就是中国对美国拥有巨额贸易盈余的原因。

再一次提醒，总体的贸易差额取决于储蓄和投资之差。因此，开放市场的美国对中国的巨额贸易赤字，将由美国与其他国家之间更大的盈余或更小的赤字来弥补（这种转移机制很可能通过美元与其他发达国家货币之间汇率的相对弱势来实现）；同时，中国对其他国家的贸易赤字，将抵消它对美国的贸易盈余。事实上，世界经济正在上演石头、剪刀、布的游戏：中国获得美国的市场，美国获得其他发达国家的市场，而这些国家以获得中国的市场

作为补偿。因此，表面上看美国的负担似乎过重，从东方醒狮那里吸收了大部分的出口，却没有获得同等份额的中国市场，但实际上美国在这场游戏中处于最优越的地位。为什么这样说呢？

首先，认为美国比其他国家的处境更糟糕是因为我们允许进口，这种观点让我想起19世纪的经济学家弗雷德里克·巴斯夏说过的那句名言："这就像说，我们应当封锁自己的港口，因为其他国家拥有崎岖的海岸。"通过购买来自中国的劳动密集型产品，而专心制造其他更高层次的产品，美国把握住了一次难得的机会。其他国家则错失了这种机会，因为它们卖给中国的产品，几乎和已经不卖给美国，甚至开始从美国购买的产品一样。

其次，如果你认同有些产业比其他产业更重要的想法，比如说它们能产生技术溢出效应，那么将制造衬衫和袜子的工作机会让给中国的同时，美国重新获得了日本和欧洲的计算机或半导体市场，显然后者的技术溢出能够带来更大的经济利益。

当然，我们必须考虑这场游戏所造成的负面效应。准确地说，是开放市场使我们拥有了更多的高薪工作，而失去了低薪的就业机会。同时，对中国外销产品的过度吸纳，将导致人们收入差距的不断扩大。

更重要的是，中美两国的双边贸易失衡，绝不意味着中国人利用了我们的天真（我不是说他们不会这么做，请你注意其中的差别）。主要原因是其他国家对中国的出口采取了限制措施，并不是中国对我们的产品进行了限制。我们没有被利用。事实上，贸易失衡的现状恰恰表明，我们利用了其他发达国家错失的那些机会。





第四部分

增长的幻觉



在经济学中，像经济周期这样容易引起人们争议的话题并不多。所谓经济周期，是指围绕产出与失业的长期上升趋势的波动。事实上，上一代经济学家对经济周期起因的见解非常一致。然而，随着滞胀现象（20世纪70年代通货膨胀和经济衰退并存的局面）的出现，更重要的是，由于方法上的差异，研究经济周期的经济学家们开始分为不同的门派。有些人的主张其实是旧瓶换新酒，例如凯恩斯主义的方法，其他人则试图全盘否定旧观点。这些不同的门派之间打了几场有关景气周期的“大战”。结果是，经济学作为一门专业学科的信誉，因此受到了严重的损害。人们由此产生了一种感觉，即经济学家在这一问题上表现得非常无知，这就为各种稀奇古怪的说法打开了方便之门，尤其是供给学派经济学。

这些论战已经基本上结束，但请不要对其他人这样说（普林斯顿大学的艾伦·布林德将它称为“宏观经济学的一个纯洁小秘密”）。因为，尽管各门派仍然倾向于使用各自的语言，但实际上他们的观点已经逐渐与前一代趋同。然而，对于经济学所遭受的伤害已经无法弥补。时至今日，人们依然认为经济学对经济周期的讨论毫无用处，而各种奇谈怪论方兴未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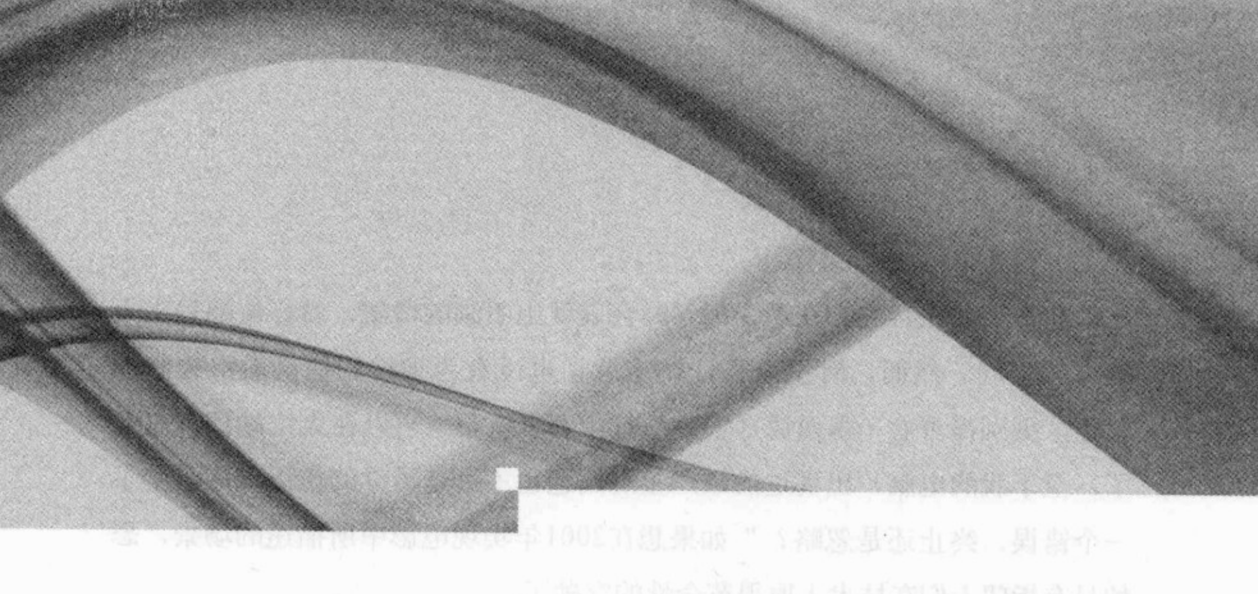
所谓新范式，正是这些奇谈怪论的一个典型例子。它的意思是新的动力（如全球化和技术革新）已经使得旧规则不再适用于经济世界，因此经济增长的极限可以被突破，甚至经济周期本身也可能会消失。关于这种论调，我们会发现它漏洞百出，例如，全球化和技术是否真的像人们宣称的那样进展神速？在“我们并非世界”一文中，我已经对全球化提出了质疑；在本部分的第一篇文章中，我将继续提出关于技术的类似疑问。

更重要的是，新范式似乎混淆了经济周期与长期增长之间的区别，并且误解了货币政策所具有的功能和存在的限制。我将在第二篇文章“4%的那些蠢驴们”中阐述这些区别。

当我对高速增长的预期提出质疑时，很容易被人们划到另一个同样误入歧途的阵营。在这个阵营中，人们相信唯一的优先政策目标是控制通货膨胀，并且认为对经济上发生的衰退和失业问题，我们什么都不能做。这种信念在中央银行的掌权者身上表现得最为明显，由此在世界各地制造了巨大而无谓的经济伤痛。第三篇文章即“为通胀美言几句”，主要关注的是欧洲，我将通过论述对一味追求物价稳定的欧洲国家提出质疑。而第四篇文章讨论的是日本经济，消极的货币政策部分（虽然不是全部）导致该国经济陷入长期低迷。

最后，我将通过一篇书评“寻找起伏波动中的规律”来阐述我对经济和历史的看法，并说明为什么经济周期在各经济体中还没有接近消亡。





第十三章　技术的奇迹：并非那般神奇*

最近，许多商界领袖和思想家开始沉溺于所谓的“信息技术悖论”。大致的内容是：我们生活的时代，正处于空前的技术革新时期，每个人的效率都比以前高很多。但是，生活在这个时代具体有哪些好处呢？看起来，普通美国人的生活标准并没有显著提高啊！相反，倒是有许多人觉得谋生越来越难。如果我们真有那么精明和高效，为什么没有变得更富有呢？

关于这一悖论，不乏精辟的解释。但是，有一种说法似乎还没有人敢提出来：或许我们耳熟能详的所谓“技术奇迹”，并没有那么神奇！

要弄明白这句话的意思，你可以想一想2001。注意，我这里指的不是2001年，而是1968年上映的电影《2001：太空漫游》。想必大多数读者都看过这部电影，影片中有一段是对33年后生活场景的幻想。电影中的那个世界，在有着喜来登厅堂风格的太空站之间，开通了定期的商务航线；而电脑

* 原文发表于《今日美国》，1996 年 12 月 12 日。

已经非常智能化，它们在遭受侮辱时会表现出不满的情绪，就好像邮局工人的突然生气。然而，时至今日，航空公司也没有为乘客们提供太空度假的服务，更别提香农·露西德（太空站首位女宇航员）可以在太空站预订房间了。至于我的电脑，出现过的最严重的问题也不过是“你的应用程序产生了一个错误，终止还是忽略？”如果想在2001年实现电影中所描述的场景，恐怕只有指望人们在技术上取得革命性的突破了。

本文的重点在于：如果衡量技术进步的标准不是多少MIPS（每秒百万条指令的操作）或字节数[①]，而是它们影响人类生活方式的程度，或者使工作得以顺利进行的能力，那么你就会发现，过去30年间人类所取得的成就并不让人感到吃惊，相反，倒是有些令人感到失望。

我们以电脑为例，让人感到惊奇的不是它们的运行速度多么快，体积多么小，而是它们仍然太笨了。如果时光能够倒流，让我们回到1958年，当时的计算机科学先驱赫伯特·西蒙曾信心十足地预言：到1970年计算机将成为国际象棋的世界冠军。然而，直到多年以后[②]，IBM公司的超级计算机“深蓝”才最终以微弱的优势战胜了国际象棋大师加里·卡斯帕罗夫。也许制造一台能匹敌高段位棋手的电脑并不是什么难事，但是要设计出可用吸尘器清扫房间的机器人，恐怕还得几十年的时间。

在那些电脑已经非常普及的场所，如现代化办公室，生产力有多少实质性的提升也值得怀疑。近年来，很多公司都开始意识到：在为办公室员工配备电脑的同时，公司还必须为此承担巨额的隐性成本。要保证每台电脑能够正常使用，不仅需要提供相关的技术支持，频繁购买新版本的软件，还必须反复对员工进行培训等。每个员工办公桌上的电脑本身可能只值2000美元，

① MIPS是描述运算速度的参数，字节数是描述存储空间的参数。——译者注
② 具体时间为1997年5月11日，前五局以2.5比2.5打平，第六局卡斯帕罗夫只走了19步便已认输。——译者注

但由此带来的隐性成本可能高达每年8000美元，而这还不包括员工将大量的上班时间花在打游戏或网上冲浪上的成本。

对于不涉及数字信息的日常生活技术，又是怎样的一番情形呢？让我们想象一个典型的中产阶级家庭：与40年前相比，它在生活方面因技术进步的原因发生了哪些变化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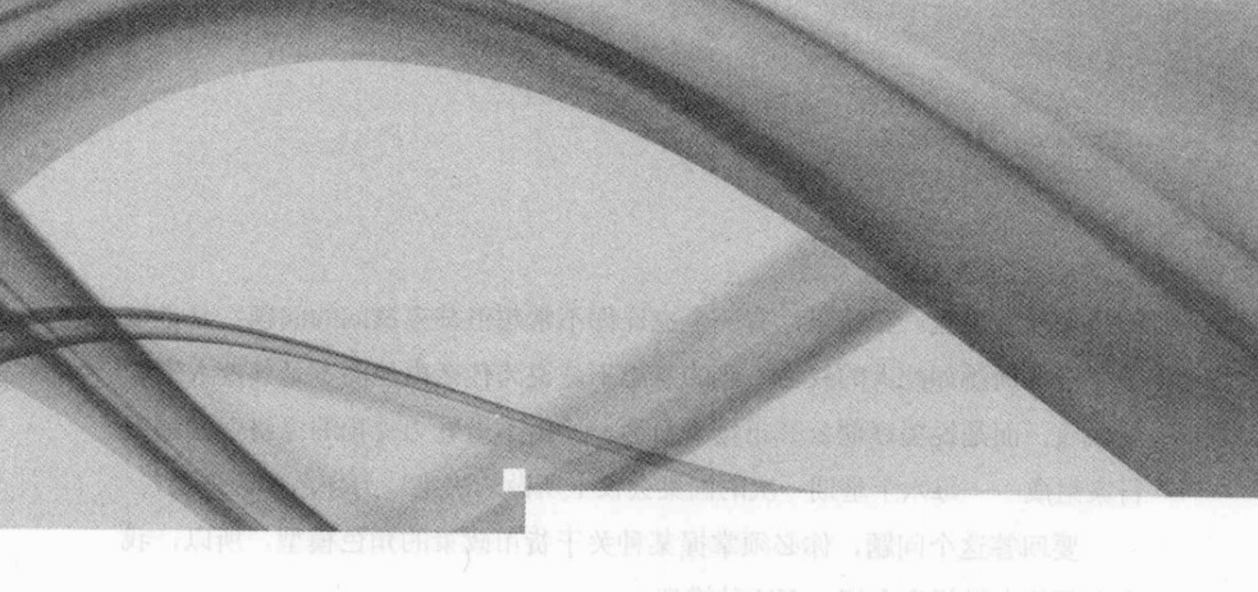
碰巧的是，我在这方面有足够的发言权，因为我现在的厨房在20世纪50年代末期算是最新款式，至今从未改造过。当然，不能够自动除霜的冰箱，以及火苗暴露在外的煤气炉，这些都让人非常沮丧（说句题外话，是否有人认识一个好的建筑承包商呢），但无论如何，仍算得上是一个功能相当齐全的厨房。1957年时，房主没有微波炉；我们从收听黑白时代席德·西泽所主持的广播，变成了收看喜剧频道格调不高的幽默节目。基本上可以这么说，他们那个时候的生活比我们现在要丰富。如果再把时光倒回40年，也就是1917年，当时的人们用马车将冰块送到家里，然后装进冰盒中保存。那个时候的你没有电视可看，也没有任何形式的大众媒体可欣赏（定期的广播娱乐节目直到1920年才出现）。而且，在1917年的美国，还有近半数的人住在农村，其中大多数地方没有电力供应，有很多还没有自来水供应。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美国在1917年到1957年之间所发生的变化，都要比1957年至今发生的变化大得多。

总之，“我们生活的时代，正处于空前的技术革新时期”这种说法，不过是自欺欺人罢了。事实上，我们生活的时代，基本上没有太多、太大的变化。

我并没有指责任何人的意思。假如最后证明比尔·盖茨并不是另一个亨利·福特，那也不表明他在能力上有任何问题。因为真正能提升生产力的创造，像内燃机和流水线这样的发明毕竟是不多见的。在下一种T型车出现之

前，我们只能使用“次一级”的产品，比如个人电脑（PC）。不过，这也算不上是一个悲剧。只是，那些萦绕在我们耳边的夸张说法却会带来实质性的危害：它会让企业浪费资金，也会使政治家以推出高科技政策作为哗众取宠的手段，比如说发给每个孩子一台电脑。很显然，回归到基本教育，即教会孩子们阅读，才是最重要的。一个令人沮丧的事实是：高科技正在使我们退化。我们必须面对这种事实，以实际行动来阻止它的继续蔓延。





第十四章　4%的那些蠢驴们*

最近，一些有影响力的人物频频将矛头指向格林斯潘及其美联储的同僚们，谴责他们没有让经济更快速地增长。在这些人中，最突出的或许要算是费利克斯·罗哈廷了，此人曾是美联储副主席的人选，但从未获得过正式的提名。值得注意的是，罗哈廷的政策主张并不是“适度”的经济改革（这是很多经济学家的共识）。他所要求的是大规模的货币扩张：在未来10年，美联储制订的2%–2.5%的经济增长速度太过保守，至少应达到3.5%–4%。为了方便起见，下面我将以“4%分子”来称呼罗哈廷及其盟友。

很显然，针对美联储经济政策的争辩，本身就是一件大事。通过这件事情，我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即聪明人也会对经济说蠢话。而其中的原因和他们说蠢话的方式，就是本文要探讨的内容。

我将稍后再对4%分子的主张进行详细的剖析。现在，先让我们从一般性

* 本文是作者在 1996 年 4 月举行的华盛顿经济俱乐部会议上的讲稿。

的概念开始说起。在这里，有一个也许你不常想但却应该问的问题：是谁赋予了格林斯潘如此大的权力？我的意思不是说为什么由他而不是其他人掌管美联储，而是说美联储公开市场委员会——由不惜魅力受损的经济学家和银行家组成——每六个星期一次的圆桌会议上所做的决定，为什么如此重要？

要回答这个问题，你必须掌握某种关于货币政策的角色模型。所以，我有必要花点时间来介绍一下这种模型。

听到这里，你或许会想："拜托，不要搬出那些经济学的方程和术语来卖弄了！"其实，用不着担心，因为我并不打算介绍那种模型，相反我倒是希望，这个模型会让你感到相当有趣。当然，关于这个问题将会有一些智力问答题，所以还请你务必注意听。

理解美联储的功能与限制的最佳模型，也许你们已在我的那本《兜售繁荣》中见到过了。该模型的原始描述最早出现在琼和理查德·史维尼夫妇的论文"货币理论与大国会山保姆合作社危机"中。

20世纪70年代，史维尼夫妇参加了一个临时保姆合作社，该社的成员主要是年轻夫妇，大部分都在国会山工作。他们达成了以下协议：在轮流原则的基础上，互相照看对方家庭的孩子。对于任何类似的团体来说，如果它的成员数量超过了某个限额，那么就必须设计出一种制度，以确保每对夫妇都能公平地负担其工作量。这个保姆合作社通过发行代价券来解决问题，方案如下：每个成员可分配到一定数量的配给票即代价券，每一张相当于一个小时的保姆看护量。如果有一对夫妇想要外出就餐，那么他们就必须付给看护者一些配给票，而收到配给票的看护者夫妇可以在其他场合消费它们。你会发现，这个制度具有自我管控的功能，也就是说，经过一段时间后，每对夫妇的保姆工作时数，其"施与"和"接受"的量一定相等。

也许你还能想到，这个系统要想正常运行，就必须确保有相当数量的

代价券用于流通。一对夫妇可能需要在某段较短的时间内连续外出几次，但同时他们发现自己没有时间或者机会来从事保姆工作，以赚取足够多的代价券。更进一步来说，某些夫妇可能无法确定自己未来的时间表，因此希望在平时积攒一些代价券。平均而言，要保证临时保姆合作社能够正常地运转，每对夫妇必须拥有相当数量用于流通的代价券。

我想，不需要谈论太多有关如何发行代价券的复杂细节，我们只需要知道以下这一点：经过一段时间后，该合作社就会陷入一种没有足够多的代价券供人们流通使用的窘迫境地。这种情形导致了一些特别的后果，比如夫妇们变得不愿意外出就餐了，因为他们没有太多的代价券，即使有一些也会留到以后的重要场合使用；而为了积攒足够多的代价券，有些夫妇希望额外地多做几次临时保姆的工作。这里的关键是：某对夫妇所做的外出就餐决定，恰好成为另一对夫妇做保姆工作的机会。因此，赚取代价券的机会将越来越少，而这反过来又导致夫妇们更不愿意外出就餐——因为要消费积攒的代价券。最终的结果是：大部分的夫妇都很不情愿地待在家中。他们会等到手头有更多的代价券之后才会外出一次，而有些则根本赚不到足够多的代价券，因为没有人外出就餐了。

简而言之，临时保姆合作社令自身陷入了“衰退”。

由于合作社的成员多数都是律师，因此该社的经济学家成员很难让其他人相信问题的本质在于货币。相反，合作社管理者的最初反应是：应当通过管制来解决这些问题。比如，他们曾尝试过制定一项规则：要求每对夫妇每个月必须至少外出两次。但是，最后还是经济学家的观点获得了胜利，合作社发行了更多的代价券给它的成员。

这样做的效果让人非常吃惊：在拥有更多的代价券后，夫妇们变得更乐意外出了，因此要当保姆也非常容易，这又进一步促使人们外出，如此等

等。合作社的“保姆生产总值”（GBP）也得到了大幅提升。于是，它继续加大代价券的发行量。等到有太多的代价券之后，又引起了新的问题，即出现了通货膨胀的苗头。

我曾在本文伊始提到会有智力上的问答题，现在就要问：你们觉得我刚才讲述的这个案例的意义在哪里呢？

如果你的回答是“嗯，这个故事很不错，但我看不出它和美国经济有什么关联啊！”那么，你只能得到D的评分。这说明你还没有了解简化模型可用来驾驭复杂的真实世界。

如果你的回答是“简直是胡说嘛！我想谈全球化和信息时代的新经济，而你却大讲什么保姆看护？！”那么，真的非常遗憾，你的得分只有F。你不仅不明白模型的用处，而且还犯了一个非常幼稚的毛病：以为有深度的经济学，一定要谈大问题说大话。

事实上，这个保姆模型就如同具体细微的美国经济，而格林斯潘呢？就是那位控制“代价券”发行量的管理者。通过对这一模型的研究，可以得到一些深刻而重要的见解。对于某些知识渊博的人来说，这些见解似乎是永远无法领悟的。让我特别举两个例子来说明。

首先，因增加货币供应而带来的经济增长与源自经济体内部因素的长期增长，两者有着本质的区别。在保姆模型中，增加了新的代价券后，GBP得到了大幅提升。其中的原因并不是合作社的成员们引进了高科技的保姆设备，也不是他们接受了新的训练之后在全球的新保姆经济中效率大幅提高，更不是他们可免于使私有保姆企业发展受阻的政府管制和税收负担问题。合作社的问题，根源仅仅是流动性不足导致的协调失灵，而在增加货币供应量后，问题就解决了，系统也因此恢复了正常，如此而已。

其次，只要我们对保姆故事进行深入的思考，就会认识到货币政策自身

的局限性。钞票印得太少，自然是一件坏事，但是通过增发钞票来提升生产总值的做法，到一定程度后可能会变得不可控制。事实上，发行太多代价券的结果是对合作社造成了伤害，因此过度扩张的货币政策反而对生产是不利的。

从保姆模型中得到的以上两项见解，完全适用于大规模的成熟经济体。经济周期中的两段复苏时期，即1982—1989年和1992—1994年，正是因为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针对衰退中的经济加大了货币供给量，从而使闲置的资源重新得到合理的利用。从中我们几乎没有看到基于可持续发展基础上的经济增长作用。因此，那些说里根时代的经济复苏代表了长期经济增长的人（他们说，只要采取统一税制就可以了），根本没有从保姆合作社的例子中吸取教训；而那些认为美联储可以任意选取某一经济增长速度作为目标的人，同样也没有从合作社的例子中得到另一种教训（即引发通货膨胀的危险）。

让我说得再具体一点吧！就美国经济而言，要区分产出的周期性波动与潜在的长期经济增长，并非什么难事。过去20年的经验，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可靠的事实：当经济增长速度超过2.5%时，失业率将随之下降——增长速度每提高1个百分点，失业率则降低0.5个百分点；相反，当经济增长速度低于2.5%时，失业率将会上升。这一事实暗示着潜在的经济增长率应该是每年2.5%。近来的一些数据并没有表明该数值已经往上增加。要说有什么趋势的话，反倒是由于劳动力的缓慢增长导致了它的略微下降。

扩张的极限是很难确定的，但我们从保姆合作社的例子可以看到，这样的极限一定是存在的。经过近30年的激烈辩论，加上数以百计的统计研究，如今大部分经济学家都认同以下观点：如果美联储试图将失业率压得太低，通货膨胀就会呈螺旋状上升。那么，多低才算是太低呢？非加速通货膨胀失

业率（NAIRU）可作为一条警戒线，它的取值范围是5.5%–6%。不过，我马上就会解释，其实和4%分子们进行论战的时候，失业率下限的精确数值根本无关大局。

有了保姆模型这一工具，让我们再来看看那些批评美联储的说法是否还站得住脚。我将特别关注以下观点：未来5年内，每年的经济增长率应达到4%。

请你务必记住，根据可靠的估算，产出的年均潜在增长率低于2.5%，而且经济增长速度每提高1个百分点，失业率就会降低0.5个百分点。那么，“未来5年内，每年的经济增长率应达到4%”这种说法，就意味着5年后失业率将降至大约1.5%。

我想，没有人会认为这个失业率目标是可行的。也许，你认为NAIRU不是5.5%，而应该是5%，甚至是4.5%（显然，这也与统计数据不相符），但是1.5%可能吗？那些聪明人怎么会认为4%的增长率是可以实现的呢？我曾亲自与增长拥护者们进行过一番讨论，也曾收到过其他进行类似讨论的经济学家们的报告。他们的思路大致如下：首先，旧法则已经不再适用，因为当前的现实是我们正经历一场“生产力革命”；其次，当前的经济生产潜力，其增长速度要比以前更快。

这种说法错在哪里呢？事实上，美国经济分析局（以下简称“分析局”）对生产力的估计，压根儿没显示现在正处于产业革命时期。虽然有许多商界人士声称分析局的数据是错的（尽管有若干互相独立的理由可以怀疑生产力在平稳增长），但无论如何，这种声称也不能作为增长拥护者的论据。原因在于，同样的数字被用来估计生产力的增长与GDP的增长。如果你觉得生产力的增速实际上是3%，而非分析局提供的1%，那么你也必须相信GDP的增速不是分析局提供的2%，而是4%。换句话说，美联储已经给了你

想要的4%的经济增长率。除此之外，你还有什么问题吗？顺便提一句，据不太可靠的小道消息称，美联储的经济学家的确曾试着向那些杰出的4%分子们解释这样的说法，但结果是石沉大海，没有获得半点反应。

经济增长的鼓吹者们还经常宣称，全球化——特别是美国经济对进口的大举开放——能够避免通货膨胀的发生。乍听之下，这种说法颇有些道理，但只要你了解近年来的经济史并稍做思考，就会发现其中的破绽。英国就是一个尽管开放经济体但并没能避免通货膨胀的例子。20世纪80年代末期，英国由于对进口产品敞开大门，使得以GDP计算的进口比例，几乎是美国的三倍。这导致该国政府对货币政策的制定过于理想化，而没有充分考虑到经济扩张自身的限制。结果，就像教科书上预测的那样：该国国内的通货膨胀不幸爆发了。最后，政府付出了惨痛的代价，在失业率攀升至两位数以后，才将局势控制住。

再者，讨论全球化问题时不能不注意到美国采取的是浮动汇率制。如果美联储打算实施扩张性的货币政策，那么一个必然的结论是美元将会大幅贬值。如果你真的相信美国的物价基本上受到国外竞争的牵制，那么你也不得不承认美元价值的缩水，将会直接导致更为严重的通货膨胀。其实，对贸易伙伴间通货膨胀传导机制的传统分析表明，对于进口比例较高且实行浮动汇率的国家来说，一旦实施扩张性的货币政策，那么它对物价的上涨所造成的影响要比相对封闭的经济体更大（而不是更小）。

由此可见，无论是生产力的增长还是全球化，都不能作为支持“更宽松的货币政策”的依据。除此之外，也许存在其他类似的依据，但是罗哈廷们还没有炮制出来。简而言之，这并不是一场严肃的辩论：虽然4%分子争取到许多政治与商界人士的支持，但是他们在理论基础上，甚至找不到一个可用于支持其观点的证据。

你们可能会认为我所谈论的这群人都是笨蛋，比如杜尔就可能说，克鲁格曼自以为他比罗哈廷更聪明。我当然不是这个意思。我的问题是：为什么这些聪明人也会说傻话，他们为什么没有找到一个更好的例子？以及他们的模型是什么呢？

我的答案是：他们根本就没有模型。罗哈廷一伙人的问题在于他们不了解经济学原理。他们以为，搞经济就像是律师为客户准备状子——先决定意见，然后再尽可能多地搜寻支持这些意见的证据。他们将经济学中的一些传统看法，如美国经济的潜在增长率只有2.5%，或者自由贸易是好事等，都想象成是用同样的方式来获得的。

当然，那绝非严谨的经济学。真正的经济学家，绝不会事先设定一种政策观点，而是首先假定一个社会如何运行的故事。这个故事，几乎都采取某种模型的形式，即对真实世界的简化表示，人们可以通过它来降低问题的复杂程度。只要有一个模型，你就可以推算它和实际情况的符合程度。如果符合程度很好，还可以继续考虑它的重要程度，或者考虑可以对它进行哪些取舍等。然后，你的政策观点才会从这个模型中自然呈现出来，而不是反过来。美联储的经济学家之所以认为美国经济的增长率不可能达到4%，原因不是他们喜欢低速的经济增长，也不是他们陷入了对传统的偏执，而是因为他们拥有一个看起来很符合实际情况的经济模型，而这个模型告诉他们4%绝对不是合理的目标。也许他们会犯错误，但是如果你想要主张更快的增长速度，就必须提出一个更好的模型来驳倒他们，否则你就只是在从事修辞学而非真正的经济学。

让我再做一些补充吧！如果你曾经努力去了解那些真正有用的模型，比如经济学家们主张自由贸易的模型，那么你会知道一件很重要的事：模型通常比你更聪明。我的意思是，对某个连贯性模型的集中思考，往往会迫使

你接受某些意料之外的结论，而放弃那些你原先的成见。因此，即使你只懂得最简单或看似最平常的经济模型，也要比某些人的思想更加深刻，这些人只知道成百上千的事实和典故，只会讲各种大话空话，却缺乏一个前后一致的模型来贯穿他们的思想。如果你已经领悟了上述保姆合作社的故事，那么恭喜你：关于货币政策和经济周期的本质特点，你已经比99%的文艺复兴周末成员知道得更多了。如果你已经花时间了解了大学一年级经济学课堂上的“英格兰用布料与葡萄牙换酒”的故事，我可以向你保证：就经济全球化这个问题而言，你比目前的美国贸易谈判代表以及大部分前任都要清楚得多。

另外，再提及一点。当我谈论严谨的经济学和夸夸其谈的修辞学之间的差别时，总有人对我提出“傲慢”、“自以为是”这样的指控，我以前一直想不通原因何在。现在不妨试着来分析一下吧！

像罗哈廷这样的人无疑是在说：“我没必要花时间去了解经济学家的传统看法从哪里来，也不需要了解大学经济学教科书上的内容，我已经足够聪明，脑子里有自己的一套宏观经济学，而且它比任何已有的理论都更胜一筹。”然后，过来一位令人讨厌的经济学家，向他指出他的论证过程中存在几个很大的漏洞，而且只要是用功读过大学教科书的人就可以避免的。人们的反应就是：“那个克鲁格曼啊，真是太张狂了！”

面对这种情况，该怎么处理呢？首先，我必须承认，经济学家的确没让那些聪明人——他们不愿涉及过多的技术细节，以便理解其中的基本原理——太好过。数学当然是一种很精妙的工具，而用最少的数学去解释经济学基本模型这样的尝试还太少。我们需要做一些真正的努力，用平易的语言来解释经济学，尽量跳过高深的微分拓扑学。我正在做这种尝试，当然要走的路还很长。另一方面，对于并非经济学家的人们来说，虽然他们不必去拿博士学位，但是如果想精通经济政策，那么做一些努力也是必要的。我曾经

说过，这并不是时间问题，而是态度问题。很多商界人士、政治领袖和其他人虽然都很喜欢谈论和阅读经济类书籍，但是真要让他们回到学校就不乐意了。他们宁愿去看戴维·哈尔伯斯坦[①]的五本书，也不愿读完教科书的任何一章；他们最讨厌有人要求他们了解“布料与酒”和“保姆合作社”这样的古怪故事，并在此基础上开展经济事务，而不是直接神侃全球化和新经济问题。

很可惜，这种捷径并不存在。如果你真想掌握经济学（或者其他任何学问），那就要做好重返学校的思想准备，而且要一次又一次地“回炉”。在说大话——最好能够避免——之前，你必须先学会运用小模型。要是你临阵退缩，或许你认为自己年事已高不再适合做这种事，那么就算你能给别人留下一种辩才的深刻印象，又有什么值得称道的呢？毕竟你连自己都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

① 被誉为“美国记者之父”。——译者注



第十五章　为通胀美言几句*

早在很多年前，保罗·萨缪尔森就曾明确警告：千万不可根据“口号”来制定经济政策。他担心的是喊口号会取代严谨的思考。严格来说，这个词被误用了。根据《牛津英语词典》（OED）的定义，口号的意思是“党派所用的暗号或准则，借以识别支持者或追随者，并将其他人排除在外”。不过，从更深的意义上来说，萨缪尔森用得也没错，因为过于简化的经济学理念已经成为各个门派的身份识别标志，他们反复念诵某些特定的字句，然后错误地将这些字句理所当然地视为真理。

对货币政策的公开讨论，逐渐萌生了两个派别。其中，一个派别的口号是“经济增长”，另一个派别的口号则是“稳定物价”，而这两个派别之外的声音已经很难听到了。事实上，新闻记者和政客们对这两个派别之外的经济学家常常感到不可理解。你必须在以下两种立场中做出选择：要么相信中

* 本文摘自作者发表在《经济学人》(1996 年 8 月) 杂志上的一篇文章“对快速经济增长和稳定物价说不”。

央银行应该放弃其他考虑，完全以零通胀作为目标（因为稳定物价将带来巨大的经济利益）；要么认为中央银行不必考虑通货膨胀，而应该尽全力推动经济增长（将重新带来20世纪60年代的高速增长）。

实际上，我们不需要做出这种选择。对于高速经济增长的愚蠢承诺以及稳定物价的神秘信念，我们能够而且应该给予拒绝。

在“4%的那些蠢驴们”这篇文章里，我已经讨论了经济快速增长的问题。现在，就让我再做一回不受欢迎的人，谈一谈稳定物价的弊病。

1995年，由参议员康尼·麦克提议的《经济增长与稳定法案》声称，物价的稳定“是保持高水平的生产力、实际所得、生活标准、就业以及全球竞争力的关键条件”，并要求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以这种稳定性作为首要目标。这种自信满满的宣称，的确让人几乎无法质疑。

然而事实上，当前发达国家的通货膨胀率并不高（不到两位数），而为此付出的代价无论从理论上，还是从实证上都很难估算。严重的通货膨胀会导致人们不计成本地放弃持有现金，因而必须谨慎对待。此外，为通货膨胀所付出的代价，与通货膨胀率之间并不是线性的关系，比如，3%的通货膨胀率所造成的危害要比9%的通货膨胀率所造成的危害的1/3小得多。

即使稳定物价的好处没有麦克参议员想象的那么大，它仍然不应作为美联储的首要目标，为什么呢？代价太高昂。20世纪80年代，由于美国政府的全力阻击，通货膨胀率从10%降至4%，然而却由此导致了长期的失业率升高和产能闲置问题。美国的失业率直到1988年才降至1979年的水平，而累计的产出损失则超过1000亿美元。可以预计，如果要实现零通胀率，将产生一个很可观的“牺牲率”——可能要放弃500亿美元的原有产出，才能将剩下的近3%的通胀挤出系统。这相当于是用巨大的短期痛苦来换取微小而不确定的长期痛苦。

事情还不算完。有证据显示，通往零通胀率的过程，将不仅导致暂时性的产出损失，还会造成永久性的高失业率。不过，有关这一点还有些争议。标准的观点体现在非加速通货膨胀失业率（NAIRU）的概念中，即在通胀和失业之间不存在长期的转换关系。但是，乔治·阿克洛夫、威廉·狄更斯和乔治·佩里在最近的一篇工作论文中[①]指出：在极低的通胀率情况下，上述的无转换关系将不成立。也就是说，在低通胀率的条件下，长期的无转换关系是存在的。

NAIRU假说基于一个合理的命题，即人们可以计算出通胀的效果。也就是说，工人和老板都能意识到通胀率10%的情况下加薪11%，与通胀率5%的情况下加薪6%，两者的效果是完全一样的。所以，任何一个长期的通胀率，都将被简单地纳入价格和工资决策之中。有大量的证据支持这一假说的正确性。这也就意味着，与5%的长期通胀率相比，10%的长期通胀率并不能“买到”明显较低的长期失业率。

然而，如果我们假定通货膨胀率处于较低水平，并且市场有一种降低工人实际工资的趋势——即使平均的实际工资在上涨，为了维持充分就业，也不排除某些产业和职业的实际工资被迫下降的情况，那么，通胀率5%的情况下加薪2%，与物价稳定的情况下却减薪3%，两者是否等价呢？对于超级理性的工人来说，可能是等价的。然而，根据常识，跟不上物价上涨步伐的加薪和明明白白的减薪，实际上会造成不同的心理感受。阿克洛夫等人的文章表明，工人们很难接受名义工资的减少。而名义工资的变化分布情况则表明，其减少的概率几乎为零。即使有明确的迹象要求很多工人的实际工资应当比通胀率下降得更快，也是行不通的，因为那样做需要削减工人的名义

① 这一结论出自于布鲁金斯研究所的研究论文“低通胀宏观经济学”（1996年1月）。——译者注

工资。

名义工资的刚性意味着：一旦将通货膨胀率降至最低，将损害实际工资的灵活性，甚至会因此推高长期的失业率。考虑加拿大的情况，该国的中央银行把稳定物价视为坚定不移的目标。目前，加拿大的通胀率只有不到1%。20世纪60年代，该国的失业率几乎与美国相当，但自从70和80年代之后，它的失业率持续升高，很多经济学家将这种现象的原因归结为失业保险系统过于宽泛。然而，即使失业保险系统没有那么宽泛，加拿大的失业率还是会增加（该国目前的失业率为10%）。为什么呢？来自该国的经济学家皮埃尔·福廷指出，1992—1994年间，该国有高达47%的劳资谈判协议的工资被冻结了，也就是名义工资完全保持不变。多数经济学家认为，类似于加拿大的高失业经济体通常会遭遇实际工资灵活性不足的问题，而福廷的文章表明，这种流动性问题的原因不是结构性的、宏观层面的，而只是加拿大银行过于热衷反通胀的结果而已。

总之，绝对的物价稳定当然是一种莫大的福音，它能够以较低的代价（如果有的话）换来较大的利益。可惜，这不是建立在实证基础上的，而只是一种信仰而已。实际情况表明：价格稳定的利益是难以触摸的，而代价却是巨大的。而且，长期来看零通胀也未必是好事。

有人会问：假如你摒弃了增长派的神奇魔方和稳定派的过时信条，那么，你到底想鼓吹哪种政策呢？

一种非口号式的策略看起来也许是这样的：首先，将某个低通胀率（比如3%—4%）而不是零通胀作为最终的目标，这对于缓解因市场而施加的削减实际工资的压力应该是足够了，同时通胀本身所需的代价仍然比较低。不过，由于货币政策对通货膨胀的影响有一段较长时间的滞后性。因此，有必要制定一个更具操作性的中间目标。理性的策略是，尽量将失业率稳定在与

已设通胀率一致的估计值附近，即使该估计值并不完美，而且经济结构会随时发生变化；然后，根据通胀率的实际情况相应地小幅上调或下调失业率目标。当然，如果由于误判导致的通胀率上升或下降超出了目标范围，就必须采取挽救措施了。

这一政策建议大概会让两个派别都感到愤怒。增长派会将它视为对失败主义的接受，他们坚信为了提高生活标准和解决预算问题，需要更高的经济增长率。然而很不幸，经济学不仅是“你想怎么样”，还是“你是否能够”的一门学问。增长或许是好事，但简单地宣告通胀的死亡，恐怕无济于事。

与此同时，稳定派会指责该政策建议是不负责任的，它将把我们带回到20世纪70年代那条糟糕的滞胀老路上去。然而，我们的方法并非无的放矢。恰恰相反，它的依据是世界上几家主要央行所采取的实际政策。特别是，我所描述的策略与所谓的泰勒法则非常接近，后者成功地刻画了美联储的政策轨迹（更具讽刺意味的是，美联储的政策其实比西方其他国家的央行更偏向增长与就业的导向，但却常常遭到增长派的攻击）。而且，该策略对其他国家央行的作为也可以做出很好的描述，包括英格兰银行；我相信德意志银行也不例外，该国的银行虽然经常谈论货币学派的规则，但实际上很少能实现它所宣称的目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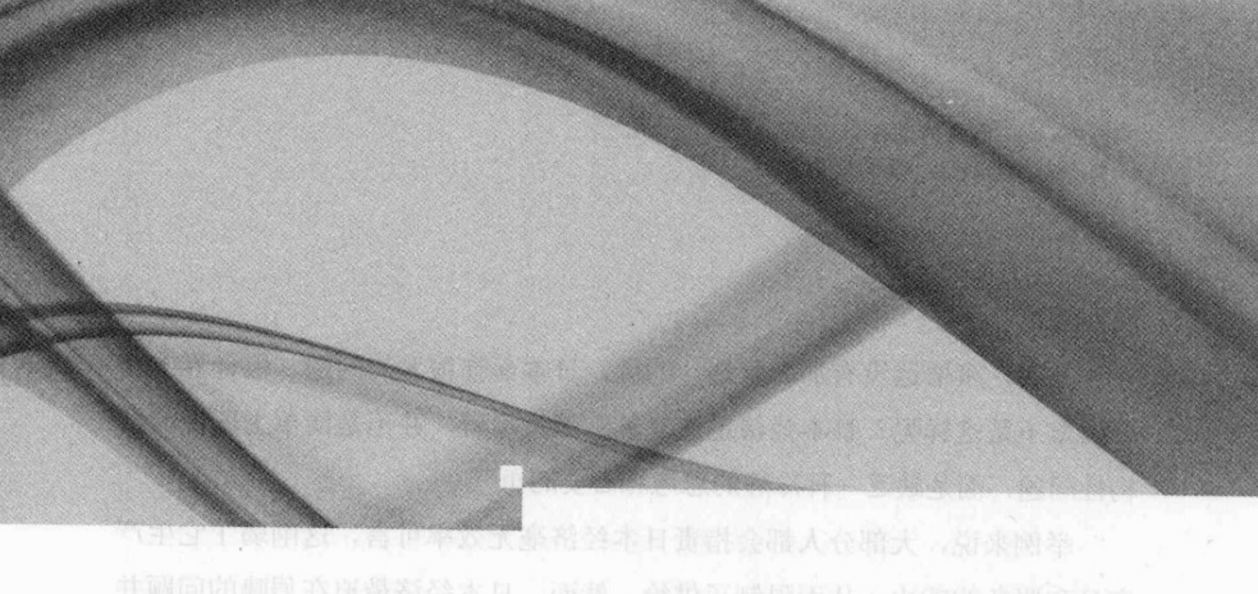
当然，这些聪明的中央银行一定不会承认，他们采用了我的策略，这倒也可以理解。任何人如果在报纸上看到一个央行的新手坦率直言，一定会笑他太天真，这说明无论是出于善意还是冷静思考，有经验的老手都喜欢将他们的行为掩饰得朦胧一些。不过，伪装虽然有用，但也面临危险。最大的危险在于，你可能会开始相信自己所说的话。这不是一个假设，确实有一些重要的央行（例如，加拿大银行和法国银行）似乎真的相信自己所说的要保持物价稳定的政策，而这种虔诚的代价是丧失了国内数十万的工作机会。

不难想象，一种不容乐观的、可能的未来情形是：货币上的种种口号将成为世界上大部分发达国家的政策基础。在美国，左、右两派的强势集团正大肆宣称增长可以解决一切信条，除了让我们再次回味滞胀的“乐趣”之外，他们的这种运动还削弱了我们控制财政赤字的决心。不过，最大的风险可能在欧洲，虽然那里的失业状况比美国严重得多，但是，稳定物价的观点并没有遇到很大的挑战，而且对实际政策的影响力可能有增无减。

假如欧洲货币联盟成为现实，后果会怎么样呢？按照宪法条约的规定，新成立的欧洲中央银行将把物价稳定作为压倒一切的优先政策，而尤其重要的是，欧洲央行会觉得必须有所表现，以不愧为德意志银行的接班人。这就意味着，它将真的实行那些德意志银行只在理论上遵循的政策，结果便是欧洲本已严峻的失业问题更趋于恶化。

经济上的口号只是让人们感觉良好，原因不仅是它们可以避免严肃思考的痛苦，而且经过很多人的重复之后，还给人们一种生活在一个家庭的印象。然而，我们必须从口号中走出来，无论它们令我们感到多么舒适，因为货币政策实在太重要了，绝对不能建立在几句简单的口号之上。





第十六章 日本究竟怎么了？*

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日本经历了令人钦佩的40年经济增长，但突然之间，该国的经济连续六年陷入了停滞①，而且至今还没有实质性改善的迹象。你可能会认为，人们应当把追究经济停滞的原因视为最重要的事情，但目前的情形是，大部分人只是以一种令人感到奇怪的漫不经心来谈论这个问题，而这些人中有许多还是日本人。对日本经济的停滞不前不但不做认真、深刻的分析，反而不停地数落它的不是。他们对日本的问题列出了一份长长的清单，认为日本的金融部门非常虚弱、管制太多、缺乏市场竞争、公司将生产部门转移到东南亚等。这些都没错，可是开列清单无助于分析问题。事实上，用这样的清单来解释日本经济的问题会带来很多负面影响，它助长了宿命论的流行：既然问题如此之多，我们怎么可能奢望一种快速而有效的解

* 原文发表于《日本经济新闻》。

① 人们后来将其称为“失去的十年”，日本国内的另一种说法是“平成萧条十五年”。现在甚至有人指出，日本经历了“失去的二十年”之痛。——译者注

决办法？

其实，事情远没有那么复杂。的确，日本面临很多的问题，但世界上哪个国家不是这样呢？日本经济迅速复苏的最大障碍，并不是清单上所说的结构性问题，而是缺乏一种冷静的思考和必要的勇气。

举例来说，大部分人都会指责日本经济毫无效率可言，这削弱了它生产产品和服务的能力，从而限制了供给。然而，日本经济最迫在眉睫的问题并非供给太少，而是需求不足。关于日本经济未能充分利用其产能的叙述，常常出现在人们的问题清单上，但可惜与之毫不相干。

一般而言，现代经济体并不会遭受需求长期不足的苦痛，因为要增加需求太容易了：只要让央行即日本银行扩大货币供应量，或者增加政府支出即可。那么，日本经济为何长期陷入需求低迷的困境呢？

当然，这里有结构上的原因。日本的消费者仍然喜欢将他们大部分的收入用于储蓄。这意味着，如果不想让经济体的需求过于低迷，就必须说服企业维持较高的投资率。然而，一旦银行体系遇到麻烦，信贷必将受到限制，上述问题将变得更为严重。所以，为了将需求维持在可充分利用产能的水平，需要进行刺激。但为什么不提供这种刺激呢？

标准的答案是：利率已经很低，这表明日本银行能做的都已经做了；同时，日本政府的财政问题很严重，因此不能再增加政府支出或者再削减税收。总之，就是除了进行结构性的变革以期待情况的好转之外，什么也做不了。

上述答案听起来很负责任，似乎也符合实际情况。但是，它的前提却完全错了，即日本银行能做的都已经做了。一个简单的事实是，对于央行来说，可以增加的货币供应量并不存在某种极限。比如说，日本银行能否在下一年将货币基数——包括银行存款和流通的现金——增加一倍呢？完全可

以。只要购买等量的政府债券就可以了；而且，在增加如此数量的货币后，也不会对利率造成多大影响，因为利率已经够低。除了降低利率外，增加货币供应量也是解救日本经济的一条捷径。将更多的钱用于流通，能够直接刺激消费：额外的钱发挥了“鼓励人们尽情挥霍”的作用。因此，要么是原先致力于储蓄的银行变得更加愿意借贷，要么是持有现金的个人绕开银行以寻求其他的投资方式。即使这些都没有发生，只要日本银行通过购买政府债券来扩大货币基数，就可以为政府支出或者减税提供更大的空间。

所以，不必在意那些问题清单。面对日本当前所面临的经济低迷状况，解决之道很简单，那就是：印刷更多的钞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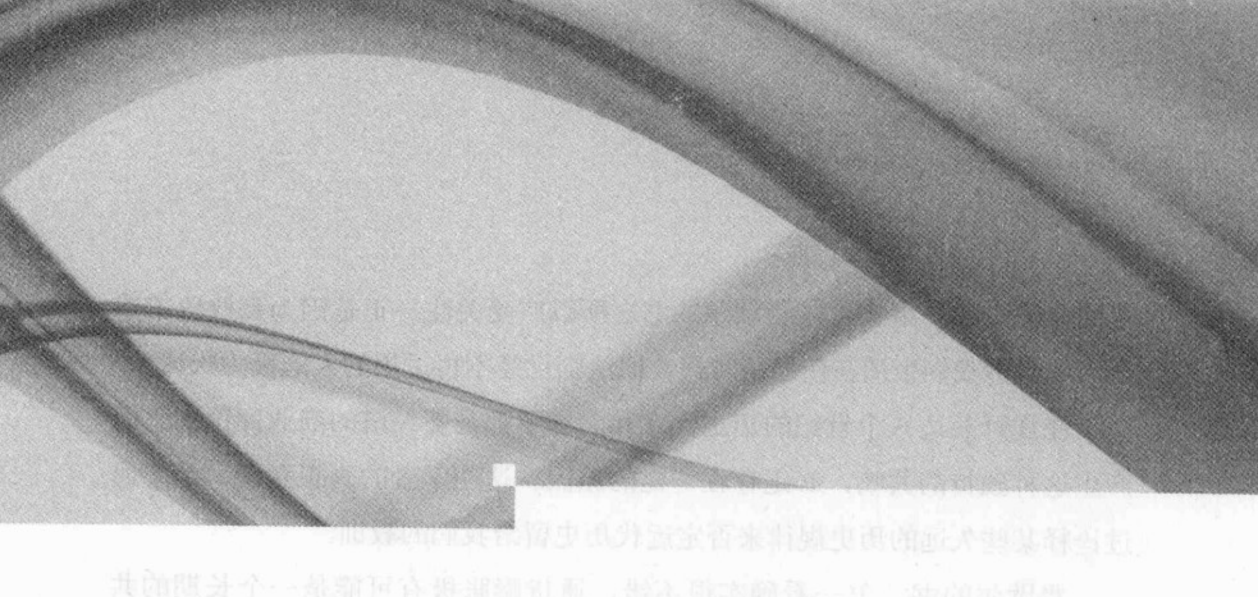
也许你会问：那样会不会导致通货膨胀呢？请你放心吧！不要忘了，日本银行的软弱无力是众所周知的。就算多印钞票，人们也只会存起来而不是花掉它；只有当人们喜欢花钱，而且所花的钱超过产能时，多印钞票才会造成通货膨胀。你不能一方面说货币政策对增加需求无效，另一方面又因为担心通货膨胀而反对增加货币供应量的措施。

那么，日本银行为何还不出面印制更多的钞票呢？我曾经听到的最棒的理论是：日本银行与大藏省的官员们，仍然受到泡沫经济的催眠。所谓泡沫经济，是指20世纪80年代末期的疯狂投机，造成股票与不动产的价格上涨至疯狂的水平（回忆一下，当时单单东京皇居的地皮，就号称超过美国加州全部地皮价值的总和）。这些人相信，正是宽松的货币政策制造了泡沫——也许没错，然后泡沫的破灭导致了20世纪90年代日本经济的极度低迷——可能也没错。因此，他们害怕，现在再增加货币供应量将会重蹈覆辙。

在这里，我想引用一个老掉牙的笑话：一位司机不小心开车碾了行人，结果，该行人倒在了车后面。司机看了看，嘀咕道：“太抱歉了，我得弥补我的过错。”于是，他把车往后一倒，再次碾了那个行人！日本经济的掌舵

者就像是笑话中的司机，他们不明白1997年不是1987年，做相反的事情只会导致问题更加恶化。





第十七章　寻找起伏波动中的规律 *

一本书如果涉及历史理论，那么它在专业领域内的名声就像掷骰子一样难以确定。这类书往往宣称，它们从发生在不同历史时空的事件中找到了一般规律。尽管这方面的好书并不多，但如果有，就应该算得上是经典了。例如，威廉·麦克尼尔的《瘟疫与人——传染病对人类历史的冲击》就是这样的经典名著，它可能会永久地改变你看待人事的方式。然而，很多与历史有关的大部头著作却没有这么走运，它们大都表现得牵强附会，而且穿插着对自我的标榜，甚至有一些贻害不浅。

人们似乎对能够解释历史全貌的理论非常感兴趣，这或许正是此类图书源源不断出现的原因之一。大卫·黑克特·费歇尔的书《大波浪——价格革命和历史节奏》近来也引起了不小的反响。这样一本厚达五百多页的书，主要讲述的是数百年甚至上千年的历史，竟然获得了那些对历史毫无兴趣的商

* 原文发表于《外交》杂志，1997 年 5—6 月。

业团体的青睐。事实上，费歇尔的书之所以广受关注，正是因为那些曾不遗余力地告诉我们生活在新经济时代、旧法则已经不再适用的人的极力吹捧。

在视野长达八个世纪的历史学家和满脑子都是新经济的商业评论家之间产生这种独特的共鸣，必定存在一定的原因。这些学者的真正意图，是想通过诠释某些久远的历史规律来否定近代历史留给我们的教训。

费歇尔的书，乍一看确实很不错。通货膨胀极有可能是一个长期的共同规律。该书的开始部分也相当精彩，对历史学中数量化的角色进行了有力的辩护。不过，就此而言，我更喜欢的还是科林·麦克伊韦迪在《企鹅地图集——古代历史图集》导言中的那句不朽名言："历史学，作为生物科学的一个分支，它的最终表达一定也是数学。"我打算将《大波浪》一书放在书架上，以方便查阅图表和数据，显然作者在这方面付出了大量的心血。

遗憾的是，这本书最后竟然错误百出。不过，我们也不必过于苛责，因为它的错误看上去还比较有趣，我们可以判断费歇尔是从哪里开始走向歧途的，并分析其中的原因，相信从中一定能够获得不少益处。

费歇尔在书的伊始给出了一个经验性的观察结果：西方世界自从12世纪以来的物价历史，可以大致分为一般物价上涨时期和物价大致稳定时期，两者时常交替出现。我们都知道，20世纪是一个通货膨胀的时代，而从1500年到1700年这段时期的物价水平也保持了长期的上升趋势。费歇尔的实证研究告诉我们，另外有两段物价上涨的时期，即黑死病之前的中世纪和18世纪。

传统的经济史理论对这些"价格革命"做了何种解释呢？答案是：以上两种时期的物价上涨都归因于货币供应量的增加，不过它们的驱动因素互不相同。从1500年到1700年的通货膨胀，主要是由于西班牙统治下的新殖民地开采了大量的银矿；现如今，政府只需要印钞票而不用挖矿，并且很喜欢去做这件事。通过印钞票既可以支付政府开支，还可以用高物价来换得低

失业率。

但是，费歇尔则认为，这些解释并不充分。他坚决主张，通货膨胀只是某个深层次过程的一个外部征兆，这个过程也伴随着人口增长、不平等扩大、实际工资减少以及最终的危机爆发等现象。他还认为，这个过程是重复出现的。因此，所有的价格革命在本质上都是类似的。尤其是西方发达国家最近几十年来的经济阵痛，代表了一种典型的价格革命游戏的终结。令人感到安慰的是，在度过这段困难时期之后，必定会迎来一个长时间的“均衡”时期。

这一理论不仅有趣而且具有安慰的功效，因为它暗示着最坏的情形已经过去了。但真的是这样吗？《大波浪》的问题之一是，费歇尔与大众历史作家一样，犯一个共同的毛病：他们宁愿花上一整年的时间搜寻事实资料，也不愿花一天时间去掌握某种理论，或者学会拒绝这一理论。结果就是，他完全误解了通货膨胀的传统理论，却仍然用书中的数据来反驳这一理论，实在可笑之极！

费歇尔对分析思考的缺乏耐心，已经扩展到自己的专业领域。只要稍做认真的思考，就能发现书中有许多谎言和臆断。一个明显的例子是他对1500年之后的物价上涨原因的讨论。费歇尔指出，欧洲物价的上涨发生在新殖民地的白银运抵之前。这一点没错，但是他认为就此驳倒了货币学派的主张。实际情况却是——他本人也承认——欧洲在15世纪末，本地的白银产出也大量增加，主要来自波西米亚和南部德国的矿藏。其中，有个矿区叫约阿希姆斯塔尔，所铸银币流通很广，因此“泰勒”就成为所有银币的泛称，最后由于某些拼写和发音上的偏离，就变成印有乔治·华盛顿肖像的绿色纸钞（即美元）。然而，费歇尔却坚持认为，欧洲白银产量的增加是通货膨胀的一个结果而非原因。也就是说，矿藏的开采和扩张，都是为了满足因物价上涨而

导致的“流动性之极大需求”。

请你考虑一分钟！我们可以确信的是，15世纪的德国矿主既不会了解，也不会关心所谓的欧洲流动性需求，他们只是想多赚钱。现在请问：通货膨胀（即以白银计价的商品和服务价格上涨）使得经营银矿的利润更高，还是更低呢？答案应该非常清楚：利润更低！也就是说，现在从银矿中提炼一磅白银，能买到的商品和服务比以前少了。如果费歇尔肯花几分钟时间来思考这个问题，他应当能明白其中的道理。可惜的是，声称物价上涨必定导致货币供应量增加，成为他书中所有理论的核心部分。

该书还有一个更大的问题。与大多数想从大历史中梳理出对现代社会教训的人们一样，费歇尔试图构建一种理论，用以否认工业革命对整个世界的革命性影响。然而事实上，始于18世纪的工业革命确实彻底改变了世界，不仅对人们的经济生活，对整个人类社会也是如此。就影响的深度而言，可以说是自从文明诞生以来前所未有的。这并不是说，我们从之前的历史中学不到任何东西，而是想提醒人们在做历史的比较时必须非常谨慎。

很多角度都显示，工业革命前的世界和我们现在生活的世界大相径庭，就如同另外一个星球。我们将把重点放在两个与本文最相关的改变上。

首先，在过去5700年的历史中，马尔萨斯说对了5500年。“说对了”的意思是，我们的文明在技术进步方面的全部历史均表明，它并没有导致人们生活水平的持续提升，充其量也就是技术进步的成果为人口的增加所分食，最终对有限的资源产生了压力，而使人们的生活条件大致恢复到以前的水平。路易十四所辖臣民的营养状况，并不比古代苏美尔城邦国家好多少。也就是说，虽然他们在好的时代可以繁衍更多的子嗣，但是其生活水平非常接近于四骑士[1]可以时不时将他们带走的境况，从而保持人口的大致稳定。

---

① 即《圣经》上提到的“天启四骑士”，指战争、瘟疫、饥饿和死亡。——译者注

马尔萨斯的不幸在于：虽然他的理论能够解释人类历史的绝大部分，可是对于其著作出版后的这两百年却显然无效。当然，这并非只是偶然。马尔萨斯生活在他的时代，因此他的思考只是反映了理论家的科学见解，而同时出现的还有工业革命。

在前工业时期，经济活动中的大波浪无疑是存在的，而且可以用马尔萨斯的理论来解释，但其背后的驱动力量却与最新的经济波动关系不大。特别是，要了解前工业时期人口和实际工资的长期波动，最重要的学科不是宏观经济学，而是微生物经济学。在人类历史上，毁灭性的新疾病会不时爆发。正如麦克尼尔在《瘟疫与人》中所描述的那样，疾病常常伴随着征服一个地方或者新贸易通道的开辟而出现，因为这两种情形都使得原先不相往来的人群产生了接触，所以病菌就有了更大的传播空间。最初，人口将急剧下降，而实际工资则大幅上扬。随着微生物和人类共同演化到一个新的均衡阶段，人口及对资源的压力再度增加，然后会出现大量营养不良的人群，这些人对下一次瘟疫的抵抗力非常脆弱。以上论述相当精彩，不过要将它和21世纪的经济前景扯上关系，那就很有问题。

其次，就是经济周期概念的提出。当然，经济上的不稳定一直伴随在我们左右，但是1800年以前的经济低迷都起因于供给层面，例如粮食歉收、战争等。它们与现代经济的衰退完全不同，后者是货币需求的暴跌导致的。纸币信用结构是发生现代意义上的经济衰退的前提，即以纸币完全取代金银作为流通中的货币，否则，就不会出现信用紧缩的局面。此外，面对需求的下滑，经济体的反应应该是减产而不是降价，否则，金融领域的收缩只会导致通货紧缩而不是实际产量的减少。我们知道，工业革命之前的经济并没有衰退的现象，其中的一个原因是当时的货币体系非常单纯，另一个原因是当时主要还是农业社会，农民应对农产品需求减少的主要方法是降价而不是

减产。

经济史学家一般认为，在近代历史上，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衰退发生在拿破仑战争之后的英国，即率先工业化的国家，这也和人们的预测相符。那些较晚工业化的国家，直到稍后才经历了衰退的命运。我的一位同事——杰出的经济史学家彼得·特明告诉我，美国直到1873年的经济恐慌[①]之后才经历了真正的衰退。而且，他的研究也表明，美国和英国在1820—1860年间的经济表现有着显著的差异：美国依然处于古典经济阶段，因为它的金融紧缩只是导致价格下跌，而对生产的影响有限；而英国却已经进入凯恩斯主义阶段了。

至此，我们终于明白，为什么商界人士会认为费歇尔在书中的论述与当前的事件有关系。同时，我们也知道，它们之间根本就没有任何联系。

只要你阅读商业方面的期刊，你就知道最近的报道总是洋溢着一种天真的乐观情绪。经过六年的稳定增长，而且几乎没有通货膨胀，各大报纸、杂志要么暗示，要么宣称：经济周期已经死亡，1990—1991年间的衰退是最后一次，在可预见的未来都不会再发生了。

怀疑主义者如我，试着戳破这种祥和的假象。其实，它忽视了历史的教训。就在不久前，乔治·布什还因经济问题而吃了败仗，实在是愚蠢之极。20世纪80年代早期我们经历了一场严重的经济衰退，而墨西哥、日本甚至加拿大（还记得它们吗？这些国家离我们并不远）的经历可以作证，90年代的世界经济并非和美国近几年一样到处都是风调雨顺。更何况，我们今天的境况也似曾相识：20世纪60年代晚期，也就是那段黄金时期的期末，宣称经济周期已死的论调也和今天一样普遍。

① 即1873—1879年间由维也纳交易所引发的世界第12次经济危机。——译者注

为什么说经济周期还会继续存在呢？这是因为：世界不会原地踏步，而政策总是在后面追赶——人们很少会把这句话贴在汽车保险杠上。如果我们分析一下上次经济周期以来经济盛衰变化的原因，我想你会对历史向我们抛来的各种“曲线球”感到由衷的敬畏。1969年的时候，谁会料到中东的一场战争，竟然引发了世界性的经济大衰退？更不用说伊朗的原教旨主义革命了。谁又能想到一向秩序井然的日本经济，会由于房地产和股票价格飙升引发的金融泡沫而陷入低迷呢？谁能预测到两项很有意义的计划，包括德国的政治统一和欧洲的货币统一，会互相碰撞直至产生灾难性的后果？的确，我们通过历史了解到：1987年的股市崩盘与1929年不一样，因为这一次艾伦·格林斯潘懂得如何应对。然而，就在我们学会如何处理旧的盛衰起因时，新的因素又出现了。

有人说，那些过去导致经济衰退的力量，现在已经是强弩之末。比如，我们的制造业经济色彩已不再那么浓厚，存货在衰退中所扮演的加速器功能已经日渐式微，等等。的确，有一件事他们说对了：未来不会再发生和过去同样的问题。我们将面临不同的问题，而且由于问题是陌生的，因此我们可能穷于应付。经济周期依然还会上演。

对商界的博学人士来说，此番言论一定很不中听。对他们来说，费歇尔的书已经给出了完美的答案。他们现在当然可以说：经济周期在过去的150年中的确伴随着我们，而且从长期来看，当我们经历价格革命时，不稳定是常态；但是，只要经受住危机的考验，我们就可以抵达新的“均衡”状态。“你猜得没错，现在我们刚刚抵达这片土地。”

然而，现代的经济周期与困扰欧洲前工业时期的经济波动相比，并没有多少相似性，其差距就如同北约组织和神圣的罗马帝国一般大。将两者等同起来，可能会使我们忽视了20世纪的真实教训。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历史对我们就不再具有指导意义，而只能成为某些想法的借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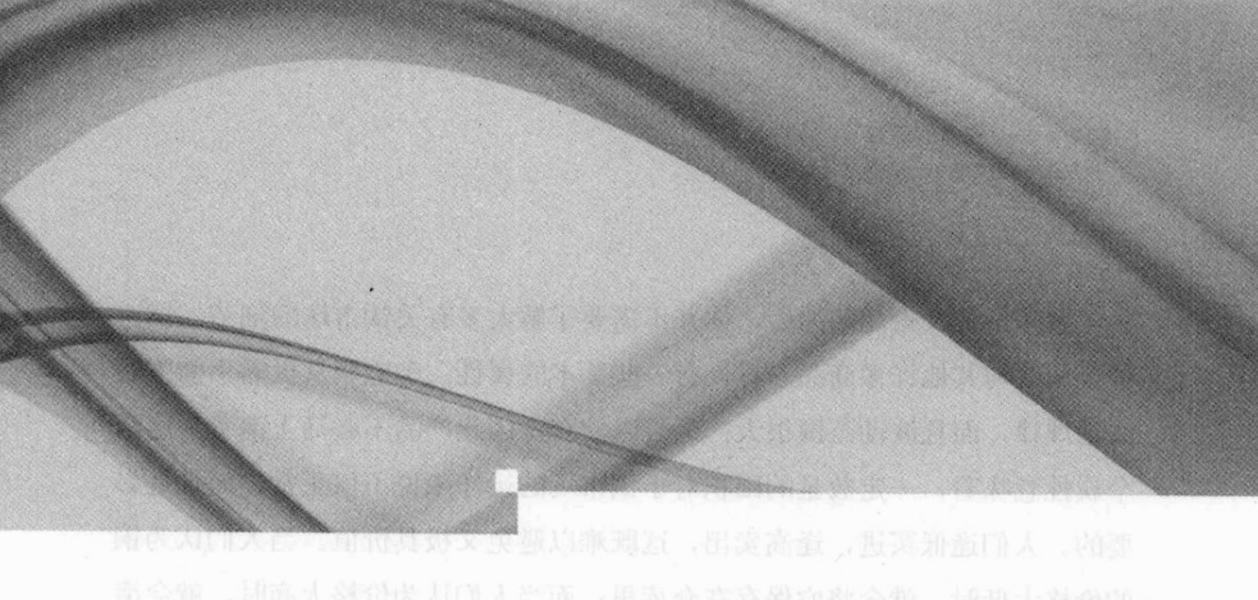
第五部分 投机客的赌局



对于金融投机客来说，20世纪90年代是一个伟大的时代。市场操纵、货币崩溃以及瞬间的巨额盈亏，我们已经好几代人没经历过这样的事情了。本部分的评论文章，就是要弄清楚这些事情。第一篇文章“铜是如何走向惨败的？”讲述了住友集团如何从垄断世界铜市场的成功走向令人惊讶的惨败的故事。第二篇文章“龙舌兰酒效应”讲述了更为悲剧性的事情：1994年爆发的货币危机，对墨西哥等拉美国家造成了极大的破坏。然后，随着泰铢的中毒，我们前往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最后一篇文章“抗御索罗斯的世界安全能力”试图回到更广阔的视角，文章中引用了欧洲的一些具体事例。







第十八章 铜是如何走向惨败的？*

1995年，当巴林银行的一位年轻雇员在贸易投机上损失了10亿美元，几乎导致这家英国的老字号银行倒闭时，全世界都为之震惊了！然而，时隔仅一年，便爆发了更大的金融事件：由于员工在铜市场上的投机失败，住友集团为此付出了30多亿美元的惨痛代价。这件事很快掩盖了巴林银行的耻辱，人们对此的反应是："哎呀，那不过是又一个滑头的交易员而已！"

事情最后弄清楚了，住友集团的滨中泰男和巴林银行的尼克·李森完全不一样：后者是由于钻了监管不严的空子，拿公司的钱去无法预测的市场上进行赌博；而滨中泰男正好相反，他是在执行公司制定的针对世界铜市场的囤积战略。这个战略已经执行了很多年，也给住友集团带来了巨大的利益。然而，滨中泰男的傲慢让他最终失手了。这个故事真正让人感到困惑的，并不是他最后的失败，而是他开始的成功。

---

* 原文发表于《滚石》杂志，1996 年 7 月 19 日。

要了解住友崛起的原因，你并不需要了解太多有关铜市场的细节。铜这种金属（与其他许多商品一样）有一些基本的属性：①它服从供需平衡下的波动规律，而且波动范围很大；②可以储存，因此产品不必马上消费。这两个属性意味着，一定数量的囤积对于铜市场的运作来说不仅正常，而且是必要的。人们逢低买进，逢高卖出，这既难以避免又极具价值。当人们认为铜的价格太低时，就会将它保存在仓库里；而当人们认为价格太高时，就会清空手中的存货。

到目前为止，一切都还算正常。然而，很久以前，有人——公元前1000年，一位从事锡生意的腓尼基商人——意识到，只要拥有足够的资本，而且头脑灵活，就可以通过控制市场来大赚一笔。细节往往错综复杂，不过原理却非常简单。首先，在市场上大量买进你想要囤积的商品，除了实际持有这些商品，你还可以购买期货——也就是在指定日期交割物品的某种承诺；然后，小心地保存这些商品；最后，伺机将这些商品卖出。也就是说，你的目的是人为地制造短缺的局面。一旦将价格哄抬上去，就可以清空存货以获取暴利。也许，你会因为手中滞留了部分商品而在价格下跌的过程中蒙受损失。然而，只要你判断准确，这种损失肯定比你从更高的现价中获得的收益要低得多。

主意不错！只是有三大障碍。首先，你得有能力进行大规模的操作。其次，只有在大多数人都不知道发生了什么的情况下，这一策略才会奏效，否则没有人会一开始就把商品卖给你，除非你开高价，而这样的话游戏就玩不下去了。最后，这种事情显然是违法的，第一个尝试的腓尼基商人很可能因此暴富，但第二个就有可能被献祭给摩洛神[1]。

① 古代腓尼基人所信奉的火神。——译者注

令人惊奇的是，住友成功克服了所有这些障碍。世界的铜市场虽然极其庞大，但是很显然，当时的确有单一的交易者能够并乐意支配该市场。你可能以为要守住这种操纵大型市场的秘密是不可能的，特别是在当今的信息化时代，但滨中泰男却做到了，部分原因是通过英国中介机构的配合，不过主要是与中国厂商（有些是国有企业）的密谋。至于管制者……我们就来谈谈他们。

这正是住友事件中让人感到纳闷的地方。如果滨中只是胡作非为的公司员工，那么人们的确不能责怪管制者没有将他管好，因为那是他所在公司老板的责任。但是，他并不是这样的。其实，他只是在执行老板制定的价格操控阴谋。在这场游戏中，住友的异军突起一开始并未引起人们注意，但“铜先生”和他所属公司操纵价格的意图，显然在熟悉铜市场的人们中间早已成了共同的秘密。实际上，当时的铜期货已经成为索罗斯之类投机者大量抛售的目标，因为内部玩家都相信滨中正竭力将价格维持在虚高位，最终一定会暴跌（不过，索罗斯早松手了几个月，显然这是因为受到了住友似乎有无限资源的震慑）。问题在于：为什么滨中能够恣意而为呢？

原因之一是，他的活动范围遍及全球，因此责任的归属很不明确。日本该负责任吗？因为住友是日本企业。或者说，英国该负责任吗？那是伦敦金属交易所的所在地。还是美国应该负责任呢？毕竟，住友将大部分的铜储藏在美国。面对这一责任归属难题，我们不禁怀疑管制者被“市场经济”的意识形态钳制了。当前，有很多人把自由市场的自我调节当成一种信仰，也就是说，即使像滨中泰男这样的人也无须管制，市场会自动对他们的所作所为予以最终的惩罚。

尽管住友的计划以失败告终，但这只是因为滨中不能面对这样的事实：即使最成功的市场操控者，也必须接受偶然失手的现实。可是，他不愿意在

亏一点的情况下将铜卖出，反而选择了冒险的行为，即重施原先得逞的计谋，将价格推到更高位。然而，从事市场囤积并非一蹴而就的事，所以他不愿意放手的结果就是导致灾难的降临。要是滨中更灵活、更务实一些，那么住友很可能从铜市场中以最小的损失全身而退，这些损失与先前的不当暴利相比实在是微不足道。

在住友事件中，最有趣的是，如果你不去管那些有异域风情的事情——日本人的名字、中国人的关系——那么它和美国“强盗资本家”[①]时代的故事如出一辙。近来，全世界兴起了一股解除金融市场管制的潮流，以便回到19世纪那种美好的旧时光，让投资者可以痛痛快快地赚钱。也许住友事件给了我们一个清楚的提醒：不是所有有利可图的事情都对社会有价值，而金融市场一开始就有管制也正是基于这个原因。

① 强盗资本家，是指19世纪后半叶美国的敛财大亨们，比如杰·古尔德和吉姆·菲斯克等人。——译者注



第十九章 龙舌兰酒效应 *

墨西哥和美国之间的关系，早就与20世纪90年代初期不可同日而语了。在很多美国人眼中，墨西哥是一个腐败国家：由毒枭所统治，并深受经济危机之苦。而在很多墨西哥人眼中，美国则不仅暴虐又自我放纵，还将严苛的经济药方强加给它的邻居，同时指责墨西哥的毒品交易都是别人的错。墨西哥的选民在1997年选举中更换了执政党，至少有一个原因，就是为了表达他们对政府和美国走得太近的强烈不满。

墨西哥的局势本来可能会更糟糕。说得具体一点，如果克林顿在1995年伊始未加妥善处理的话，那么墨西哥的经济早已经崩溃了，甚至会永远地结束那个遭受过长期痛苦的国家想要改革的任何希望。

在1994年的美国国会大选中，共和党取得了压倒性的胜利。在此后的数

---

* 原文发表于《今日美国》，1997 年 5 月 5 日。
龙舌兰酒是墨西哥的特产，也是墨西哥的国酒，被誉为墨西哥人的灵魂。作者以其浓烈的国酒隐喻墨西哥这场来势汹汹的金融风暴。——译者注

月之内，克林顿政府的许多核心成员仍然处于一种头脑昏沉的状态。就在那段黯淡的日子里，几个官员说服了克林顿支持一项大胆而有风险的、极不讨好的计划：以巨额贷款拯救墨西哥濒临崩溃的经济。一旦该计划失败，那么克林顿的总统连任愿望也注定要泡汤，还可能会有其他意想不到的后果。但幸运的是，这一计划最后还是成功了，历史会给克林顿的这一决策记下浓重的一笔。

墨西哥曾经是20世纪90年代早期国际投资者的最爱。当时的卡洛斯·萨利纳斯总统使投资者相信，墨西哥的经济改革将带来强劲的经济增长。一些经济学家曾发出警告，有关墨西哥的大肆宣传与其实际表现并不一致，然而很多人对此置若罔闻，每年涌入墨西哥的热钱仍然达到了300亿美元。直到1994年，一系列不妙的事件相继爆发——农民叛变、总统候选人被暗杀以及糟糕的经济数据——在市场上引发了一种恐慌的情绪。最后终于在12月份，不安的投资者人数达到了临界值，于是引发了针对墨西哥比索的全面溃逃。

到目前为止，上述故事还算平常。毕竟，货币危机是相当普遍的，而且一般来说对经济的长期危害是非常有限的。不过，你很快就会看到，墨西哥的情况完全不同：投资者多年来一直看好它，突然有一天，他们吃惊地发现，它并非新加坡和瑞士的结合。于是，他们一如开始注资时那样盲目地携款而逃。

接下来发生的事情，详细记录并未公之于众。不过，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即关键人物是美国财政部部长助理（现在的副部长）劳伦斯·萨莫斯，此人曾是哈佛大学教授，然后以克林顿政府的经济智囊身份跻身政坛。关于墨西哥的这场危机，萨莫斯得出两点结论：美国的干预可能会对其恢复或灾难产生不同的后果，而且这种冒险是值得一试的。

萨莫斯和财政部的同僚们了解到，墨西哥正陷入政治与经济的致命泥

潭。单单从经济层面的虚弱是无法解释投资者的恐慌的，将钱从墨西哥赶走的还是政治上的恐惧。也就是说，担心墨西哥近年来对外资和贸易的开放政策可能会走回头路，也担心该国可能成为反美国家。等到资金外逃之后，就会导致经济的严重衰退，而经济衰退正是政治动荡的强大诱因。总之，各种看淡墨西哥前途的悲观想法，都可能促成结果的自我实现。

正如他们所看到的那样，解决的办法是让墨西哥有一丝喘息的机会：贷给墨西哥政府一些钱，使它手头宽裕一些，同时避免私有部门受到摧残。如果一切顺利，那么不仅民间投资者的紧张情绪可以得到缓和，而且也能够将衰退的恶性循环扭转为复苏的良性循环。当然，万一情况不见好转，所贷的款项可能就会无法收回，那么麻烦就大了。墨西哥不是一个小国家，要是贷款规模太小，根本起不到什么作用。在这一事件中，美国和其他国家（迫于美国的压力）总共提供了500亿美元的贷款。想象一下：如果有一大部分的钱收不回来，那么公众会有什么反应呢？

既然如此，为什么还要冒这么大的风险呢？因为墨西哥和其他国家不一样：它不仅和美国有着2000英里的边境线，而且这个向来难处的邻居当时正由在美国接受高等教育的技术官僚掌权，他们的亲美作风在墨西哥并不多见。1995年年初的情况显示，“我们的兄弟”很可能会在经济危机中垮台，这无疑将是我国外交政策的一大挫败。坦白地讲，当时的考虑也包括了保护已经投资在墨西哥的大量私人资金。这样讲或许太过刻薄了。根据我自己的消息渠道，并不是鲁宾（时任美国财政部部长）的那些华尔街朋友，而是外交政策的利益主导了该项决定。

因此，在冬季的某一天，鲁宾和萨莫斯带着计划书走进了白宫的总统办公室。难以置信的是，克林顿竟然同意了。当民间投资者正落荒而逃的时候，将纳税人的钱借给墨西哥的想法，在当时并不受欢迎。事实上，国会也

不愿意拨出所需款项。最后，还是财政部想出了计策，利用法律漏洞在没有国会批准的情况下，将钱贷给了墨西哥。暴跳如雷的共和党人，在阿尔弗斯·德·阿玛托参议员的带领下极力谴责该计划，并准备一旦救援失败，非要让萨莫斯脱一层皮不可。

当然，这一救援计划并没有失败。墨西哥经济在危机的头一年衰退10%之后，开始恢复元气。民间投资者也陆续重返，逐步稳定了比索，而墨西哥政府甚至提前偿还了紧急贷款。虽然墨西哥现在还没有完全走出险境，不过美国的纳税人却大松了口气。

这个故事的寓意是什么呢？首先，有时候得听听专家的意见。很多人一看到劳伦斯·萨莫斯那样傲慢的技术官僚就会感到烦躁。不过，聪明人做聪明事，而他的确办到了。另外，有时候不讨好的事情却也值得去做。试想一下：如果那年冬天克林顿依多数民意行事，那么墨西哥可能已经成为最差的国家了，而鲍勃·杜尔则很可能已经是总统。



第二十章　泰铢之毒：谁对亚洲货币市场狠下毒手 *

如果你对货币危机很熟悉的话，那应当不会忘记乔治·布朗这位英国20世纪60年代中期的经济事务大臣。他把当时遇到的麻烦归罪于“苏黎世的那些侏儒们”①（其实，他弄错了，他说的那些银行家都在瑞士巴塞尔）。不过，布朗的地位最近可能得让给马来西亚的总理马哈蒂尔·穆罕默德了。上个月，也就是马来西亚的邻居泰国在做出泰铢不贬值承诺的数月后，终于让泰铢贬值，引起了投资者的极度恐慌，并开始疯狂抛售马来西亚林吉特、菲律宾比索，以及印度尼西亚卢比等。随之而来的是马哈蒂尔的大发脾气。其实，他的反应模式早有布朗这个先例。但是，布朗对那些“坏人”的身份和他们的动机并不清楚，而马哈蒂尔则有一整套的阴谋论：是美国政府，怂恿了投机客的领军人物乔治·索罗斯来搞垮亚洲经济，借以将西方的价值观（例

---

* 原文发表于《滚石》杂志，1997年8月14日。

① 虽然说的是苏黎世的侏儒们，但其实也是对苏黎世那些银行家的贬称。——译者注

如民主和人权）强加给亚洲。马哈蒂尔的部长级官员们，更是将他的理论加以发挥：货币币值的波动，起因于“敌意而不光彩的手段”，中间暗藏“坏蛋的颠覆行动”，从而达到了“国际犯罪的高度”。这些言论，对于长期利益有赖于与国际投资者保持亲善的政府来说，实在是太匪夷所思了。

不可否认的是，以上这些说法实在是很有趣。其实，在这场危机中，索罗斯并不是最大的玩家（因为没能成功预测到这场危机的发生，大家都以为他已经金盆洗手了），而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全世界最具野心也最鲁莽的投机客则是……由马来西亚政府控制的中央银行，它在损失了将近60亿美元之后才得以脱身。

货币危机常常会引起政府官员们歇斯底里的反应。原本，这个国家的经济一直在良好地运行，政府债券的信用评级是AAA，外汇储备有数十亿美元。然而，在突然之间，外汇枯竭了，没有人愿意买你的债券，并且只能将利率提高到足以诱发经济衰退的水平上，才能把钱留在国内。事态一旦变坏，其速度怎么会如此之快呢？

来自经济学家的标准答案是：在这种形势下，一味怪罪于金融市场，无疑是斩杀信使，因为危机不过是市场告诉政府其政策行不通的一种方式。也许，你可能会奇怪，为什么信息会透露得如此突然？此时，经典模型会告诉你，从逻辑上讲就是这样的。

为了搞清楚这里面的原因，我们暂时先把货币放一下。想象有一个政府正努力使某种商品（比如黄金）的价格保持稳定。只要开始时拥有大量的这种商品，这一点在短期内是可以做到的：如果价格上涨得快要超过目标区间，就可以卖出一部分存货。现在假定该商品的储存量因不断卖出而逐渐减少，聪明的投机者可以预测到——也许早在若干年前——商品储存量会有耗尽的那一天。他们知道自己的机会来了，因为一旦政府的存货耗尽，那么物

价便无法稳定，之后该商品的价格将急剧上涨。这些投机者要做的就是在耗尽之前，当政府卖出的时候买入，囤积起来等待最后的卖出，以获取其中的巨额差价。

很自然地，投机者的买入行为会加速存货的耗尽，从而使得那个估算的日子提前到来。于是，聪明的投机者就会行动得更早，由此又导致商品存货消耗得更快，而存货的消耗当然导致更早的购买，如此形成了加速循环。其结果便是，本来政府的商品储存量可以在较长的一段时期内渐渐减少，然而现在却突然在某个临界点（可预测的）之后急剧下跌。可想而知，经济崩溃也将随之而来（1969年的黄金市场就是一个典型例子）。

只要多点想象，以上的故事情节就可以应用到货币危机上。如果马来西亚政府试图通过干预外汇市场来稳定林吉特兑换美元的价值——或者等同于在1美元上面贴上以林吉特为单位的价格标签——那意味着卖出美元来保住林吉特的价格。同时假定，出于种种原因，该政府所采取的政策与维持永久的固定汇率并不相容。现在，完全和上面的故事类似，外汇储备扮演的就是黄金储备量的角色。按照相同的逻辑，我们便可以得出结论：投机客们不会守株待兔，他们会在某一临界时刻集体迅速出击，让巨额的外汇在几天甚至数小时内灰飞烟灭。

货币危机的突如其来，并不是毫无道理的晴天霹雳。在标准的经济模型中，真正的“恶棍”是政府自身政策的不一致。

能否因此说马哈蒂尔的抱怨是不成熟的荒唐行为呢？也不能。这么说的话，就有些像爱德·布什瓦尔德：他曾把自己的写作称为不成熟的荒唐行为。事实上，投机客并不完全如标准模型所说的那般无辜。

就市场而言，它并不总是处于冷静和安定的状态。有大量的证据显示，金融市场会不时遭受所谓的牛群冲击或从众行为：每个人因为看到其他人都

在抛售，所以也会选择抛售。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况，可能是因为个别投资者的非理性行为，也可能是由于目前全世界很多钱集中于共同基金的名下，而基金经理人当然不希望因落单而被过度指责。总之，“牛群”狂奔的结果，就是一国的货币往往被毫无缘由地抛售。

从某种程度上讲，国家的诸多政策是否行得通，同“普遍看法”密切相关。原本或许可以奏效的政策，因为受制于市场压力，最后只能被迫放弃，而这恰恰可能导致预言的实现。举一个例子，有才能的财政部长可能因为货币危机被迫离职，而平庸的继任者推出了不负责任的措施，最终导致局势的不断恶化，这正好坐实了市场原先对该国的负面评价。

以上列举的几种情况，也许为资源丰富的私人投资者在金融市场上使坏开辟了一些可能的途径。下面我们不妨讲述一下有关的纯理论。假设一国的货币正处于状况不明的时期，未来可能会继续维持现状，也可能不会。有投资者正暗中盘算卖空该国货币，也就是事先借入以英镑、泰铢或马币计价的一笔款项，然后投资于其他国家。一旦时机成熟，他就开始虚张声势，要出售这一目标货币，同时在伦敦《金融时报》上放言这种货币将遭受攻击等。当鸿运来临时，他就会驱动其他投资者进行一场货币大逃亡，迫使该货币贬值，进而减轻那些精心策划的债务，但无损于资产的价值。这样一来，他就可以赚进大把的钞票。

投机性的诡诈行为确实在货币不稳定的过程中扮演了角色。不过，问题在于：这种角色究竟有多重要？

1992年，乔治·索罗斯在英国的投机赚了一大笔，不过大家都知道他在那次事件中只下了一次手。当然，那是一个举世震惊的计谋，据说他从中至少赚取了10亿美元。不过，英镑贬值还有其他很充分的理由，危机是否因索罗斯而起，或者他是否敏锐地预测到了危机，这些都不清楚，也许他只是将

这场危机提前了几个星期。

20世纪90年代是货币危机爆发最频繁的一个时期，但是所发生的其他危机并没有阴险的金融炒家参与其中。这并不奇怪，其实像1992年那样的机会是很少的：前提是一国的货币体系极其脆弱，而且以前未遭受过攻击，最好还拥有一个狭窄的“窗口”（根据墨菲定律，事情如果有变坏的可能，不管这种可能性有多小，它总会发生）。金融市场并没有纵容国家犯错的习惯。

那是不是无法防范投机客的攻击呢？当然不是。事实上，有两种有效的方法可以阻止一国货币的外逃。一种方法是所谓的“善意忽视”，即不让投机者有固定的攻击目标。投机客很少能通过赌美元来获利，因为美国政府并不会固守某一特定的汇率，这意味着任何明显的美元下跌风险都已在价格上有了体现，某一天美元的价格就可能上扬。另一种方法是所谓的“凯撒之妻”，即政府对固定汇率的承诺是不容怀疑的。没有人会攻击荷兰盾，因为该国完全有能力和决心让荷兰盾紧盯德国马克。

对了，其实还有第三种选择：精心设计各种管制措施，以防止人们将钱转移到他国。当然了，如果投资者事先知道了这一点，那么他们一开始就不会愿意到该国投资。这种办法还算可行，虽然已经过时，但还不是彻底疯狂，它等于是放弃资金流入的利益，而避免资金流出的风险。不过，亚洲领导人在面对巨额的资金流入时（这些资金中有很大一部分流向了有风险的不动产），并没有说过一句抱怨话；只是当非理性的繁荣演变为大致成形的理性骚动时，他们才开始指责对方。

因此，马哈蒂尔宣称他是美国阴谋下的受害者，实在可笑之极。对于他所面对的困境，唯一需要指责的是他自己，这些话也正是乔治、鲍勃和玛德琳“怂恿”我说的。

关于货币危机的一个注记

我遇到过一些人，他们经常自信满满地大谈投机客的攻击事件。例如，1992年的英国英镑，1994—1995年间的墨西哥比索，以及1997年的泰铢。他们说，这些都证明我们正处于一个新的世界——贸易计算机化、通信卫星化等——老的经济规则和传统的经济理论都不再适用了（有一个物理学家说经济学已经“走向非线性”，现在是混沌理论的天下了）。然而，实际上，货币危机不过是旧瓶装新酒而已。例如，法国法郎在20世纪20年代就曾遭受过完全现代意义上的磨难，而70年代早期投机客的攻击（最终导致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崩溃）在规模上完全可以同最近的相比。自从20世纪70年代以来，货币危机就成为国际金融领域最受关注的研究主题之一。其实，这个主题也是我本人的爱好之一。原因很简单，毕竟我曾参与了该领域的一些奠基性工作。

货币危机的标准经济模型来源于20世纪70年代中期戴尔·汉德森和史蒂夫·萨兰特对黄金市场那篇精彩的研究论文，这两位经济学家当时都供职于美联储。他们的文章指出，导致政府黄金储备量瞬间耗尽的突发性投机攻击，其实是典型的价格稳定方案下的一个自然结果。1977年，我正好在美联储做实习研究，意识到萨兰特和汉德森的理论只要稍做修改，就能应用到耗尽政府外汇储备的货币危机中。稍后，罗伯特·弗拉德（现为IMF的经济学家）和彼得·戈博（来自布朗大学）便将以上二人的传统理论发展为货币危机的经典版本，即标准模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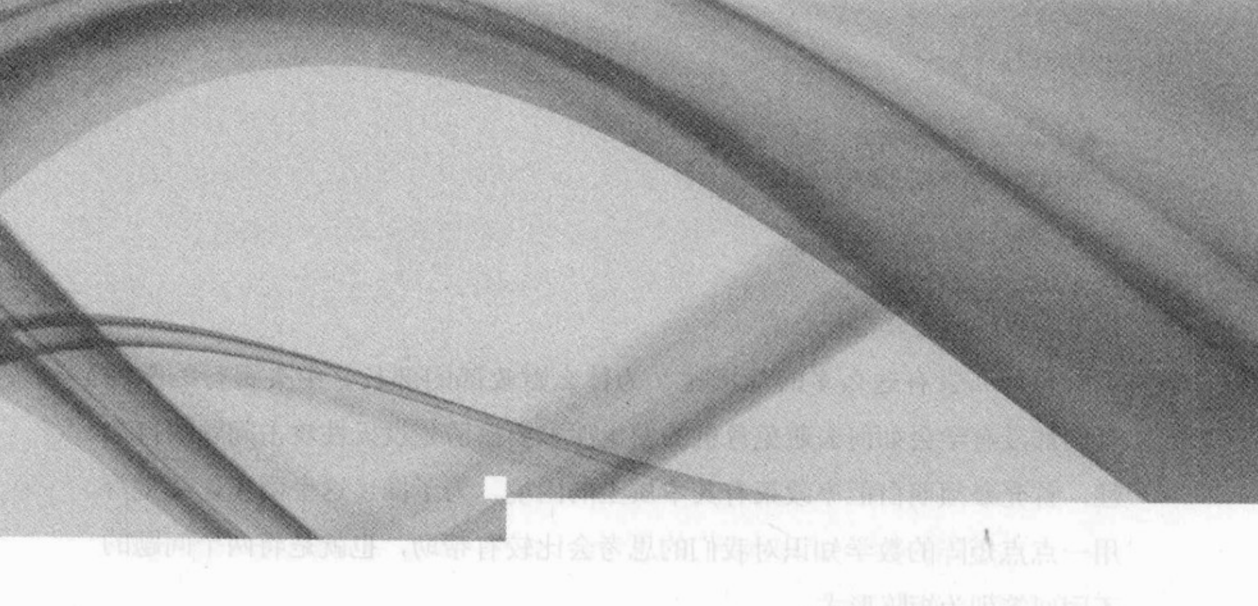
从标准模型中，我们获得的关键教训是：在短期内可卷走数十亿美元的突发性外汇流出，并不一定是投资人非理性的一窝蜂行为引起的，也不一定是罪恶的金融操纵的结果；相反，它是理性的投资人在预计政策难以为继之

后，所做出的一种正常反应。

然而，也有一些经济学家，较著名的有伯克利大学的茅瑞斯·奥伯斯法尔德和巴瑞·易臣格瑞，他们认为标准模型在处理政府政策的表现方面太过机械，现实中的政府可能有着更复杂的动机，因而使得投机行为更加不确定，也更为致命。近来，自我实现的货币危机（即如果该货币不受攻击，就可以继续存在下去）成为大家讨论的热门话题。但是，人们都会同意以下观点：一种充分可靠的货币绝不会遭到攻击，而完全缺乏信用的货币总会出问题。







第二十一章　抗御索罗斯的世界安全能力 *

我的第一篇经济学论文写于1977年，题目叫做“国际收支平衡危机模型”。众所周知，维持固定汇率的努力通常会导致突发性的投机攻击，也就是让数十亿美元的外汇储备在几天甚至数小时之内蒸发殆尽。这篇文章对其中的原因进行了理论上的讨论分析。对当时的我而言，最关注的是布雷顿森林体系的瓦解（1971年）以及之后短命的《史密森协定》，而那篇文章的主要兴趣放在对历史的叙述上，因为我真的不希望类似规模的闹剧再次上演。

很幸运的是，我错了。在这里，我用了“幸运”这个词，它的含义是我成为货币危机模型的奠基人。此后，有关投机性攻击理论的学术论文与日俱增——当然，这些论文也只是对危机进行一些经济学的分析和解释而已——而对我那篇文章的引用量也随着每一次真实危机的发生而不断上升。20世纪90年代称得上是货币危机的“大丰收”时期，要不是想到那些部长们发愁的

* 本文根据作者在 1997 年 4 月举行的伦敦 G30 会议上的讲稿整理而成。

样子，我应该会非常开心的。

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危机呢？为什么财政部的部长、中央银行的掌舵者们都没有学会如何去避免危机的发生呢？要搞清楚投机性攻击问题的持久性，首先必须明白汇率政策有其本质上的困境。为了描述这个困境，我觉得用一点点矩阵的数学知识对我们的思考会比较有帮助，也就是将两个问题的不同回答列为矩阵形式。

第一个问题，汇率的可变性是否有用。我们处在一个投资者可将他们的钱自由投向自己所喜好之处的世界，因此维持固定汇率的国家实际上放弃了拥有自主货币政策的机会：该国的利率必须设定在足以让外汇交易者愿意在目标汇率下持有本国货币的水平上。此外，允许汇率浮动的国家可以降低利率，这有利于抵御经济衰退；同时也可以提高利率，这有利于抵御通货膨胀。货币政策的这种自由是有用的，还是虚幻的？

第二个问题，假如让汇率浮动，你是否会相信外汇市场不会再发生那些疯狂的事情？市场是否会自动将汇率调整到某个数值上，使其多少与经济的基本面和政策的良性运行相一致？或者，市场是否会屈从于“不停歇的非理性骚动”（借用艾伦·格林斯潘的名言）和毫无根据的悲观想法？

对这个问题的不同回答可以在矩阵中分成四格，每一格内是其支持者。如下所示：

		汇率的可变性是否有用	
		否	是
外汇市场是否可信	是	轻松自在的人	浮动汇率的信徒
	否	固定汇率的信徒	精神紧张的人

如果你认为一国从汇率的浮动中所获得的货币自由意义不大，你也相信外汇市场不会做任何蠢事，那么你就是一个“轻松自在的人”。这意味着你并不关心政府采取哪种汇率制度。也许你对固定汇率有一点偏好，或者认为最好有一种共同货币，因为你觉得汇率稳定可以降低做生意的成本，然而你绝对不会因为汇率的选择而失眠。如果是这样，你采取的就是所谓“实质经济周期”学派的立场。他们笃信市场的效率，并且认为任何货币政策对市场如何运作都影响不大。

如果你认为一国从汇率的浮动中所获得的货币自由弥足珍贵，你也相信外汇市场是可信的，那么你就是一位“浮动汇率的信徒”。这意味着你认为应该将货币体系从固定利率的目标中解放出来。这样，国家就可以追求充分就业的目标，而这显然是一件好事。这种观点，在20世纪60年代晚期和70年代早期的经济学家中相当流行。实际上，当时还在上大学的我依然记得，我的老师们都认为整个布雷顿森林体系是一种“野蛮时代的遗存物”，是对宏观经济政策不必要的束缚。

如果你相信矩阵第二行第一列的回答，那么就意味着你认为：外汇市场极其不可信赖，它受制于变化无常的乐观与悲观想法，而从汇率的浮动中所获得的货币自由也没有多大价值。因此，你是一位“固定汇率的信徒”。你寻求将货币与某一标准挂钩的任何机会，最好是建立在一种为更多国家所分享的共同货币。按照我的理解，这正是欧洲大陆绝大多数中央银行所持有的普遍立场。

不过，如果你既相信从汇率的浮动中所获得的货币自由有其价值，又认为由市场来决定货币的浮动价值不可信赖，那么你就是一个“精神紧张的人”。在这些压力下，你可能会失常。你总是觉得，在货币体系之间做选择只是两种罪恶之间的选择，无论选择哪一种你都会焦虑，觉得自己选错了。

针对上述问题的答案，我们可以从最近10年发生的事件中找到很多例子。当然，这个世界很少会为我们提供一些显著的证据，即使在某些情况下已经非常接近。例如，当1987年爱尔兰决定停止将爱尔兰镑与英镑挂钩，而开始与德国马克挂钩时，该国的商品价格立即与英国脱离关系，转而遵从德国的指数。这种戏剧性的情形表明，货币和货币政策即使在小国家中也一样是举足轻重的。我相信，有足够的证据可以支持如下声明："精神紧张的人"是对的。一方面，浮动汇率的货币自由具有价值；但另一方面，外汇市场又是不可信赖的。

首先，我将阐述浮动汇率的价值。浮动汇率反对者的典型说法是，即使短暂的货币自治，也会很快招致负面影响。想象一种特殊情形，某个国家放弃了维持固定汇率的承诺，并且利用获得的货币自由来降低利率（当然，这会导致货币价值的下跌）。固定汇率的捍卫者坚持认为，结果并不是就业的增加，而是通货膨胀的出现，进而抵消了货币贬值所带来的对外竞争优势和对内需的实质性拉动。20世纪70年代英镑的一再贬值，以及1982年瑞典克朗的贬值，似乎都证明了这一点。

说实在的，我从来没有接受过这样的解读方式。近来发生的一连串事件也在不断否定上述观点。20世纪80年代中期，美元的汇率从240日元快速跌至140日元，从3马克跌至1.8马克。但是，美国并没有出现他们所预言的通胀迹象。很多欧洲人认为这个例子不足为训，因为美国是一个特例——它的经济规模过于庞大，而对国际贸易的依赖相对较小——要是某个欧洲国家遭受同样的经历，那情况将会大相径庭。那么，让我们再来看看1992年的危机。很多法国经济学家告诉我，英国脱离欧洲汇率机制后将很快遭到惩罚；而瑞典的财政部部长私下告诉我，克朗的贬值将导致通货膨胀的悲剧。然而结果是，英国并没有遭到惩罚，甚至瑞典克朗在贬值后也没有经受安妮·威博女

士所预言的痛苦。

很显然，没有人会认为，货币贬值时时处处都是好事。根据经验，我们只能说：通过实行浮动汇率制度而获得的货币政策自由是非常有价值的，前提是本国经济处于一种低通胀的状态，而且拥有足够的过剩产能以抑制价格的上涨。你或许觉得条件太苛刻了，其实未必，因为这些条件正是你先前想拥有降低利率这种自由所必需的。

到目前为止，一切都比较顺利。不过，别忘了还有第二个问题，即外汇市场。

关于金融市场的理论，经济学家们往往钟情于有效市场理论，这是可以理解的。所谓有效市场理论，是指金融产品的所有价格波动，都可以归因于当前或预期的基本面信息。有效市场理论是一个基准，它有效解释了资产价格的行为模式。该理论不仅实用，而且应用广泛，很多现代风险管理行业都建立在该理论的基础之上。然而，对于很多市场（包括金融市场）而言，有效市场理论越来越缺乏说服力。原因之一是该理论无法解释的异常情况实在是太多，这种技术上的检验难题导致该理论陷入了危机之中。

除此之外，还有一个简单可行的“合理性问题”，有时也称为“气味测试”。我不知道有没有人能够解释以下现象的原因：美元对日元的汇率从1993年的120日元，下跌至1995年的80日元，然后又上涨至1997年的120日元。市场知道基本面的实质性改变吗？如果将整件事情看成是外汇交易者遵循了由自己创造的趋势，不是更为合理吗？而且，这种汇率的波动绝对不算小：对日本企业来说，强势的日元完全是一种打击。

所以我认为，我们都属于“精神紧张的人”，这也是投机性攻击“产业”或者“产业群”——从业人员包括像我这样从事相关写作的人，当然，更重要的是包括索罗斯在内的那些实际操作者——如此“繁荣昌盛”的主要

原因。

假如各国财长都是“浮动汇率的信徒”，那么他们只需采取“善意忽视”的策略来应对外汇市场就可以了。这样的话，就不会给投机性攻击提供任何目标。假如他们都是“固定汇率的信徒”，那么就会采取自认为必要的任何措施来应对投机性攻击。一旦投机客尝到苦头，也就不会再轻举妄动。问题在于，为什么索罗斯还是有利可图，而我也可以继续发表此类文章呢？关键在于，各国财长虽然想要固定汇率，但是执行起来不够坚决，这样就给了投机客可乘之机。

在这种大环境下，有关投机性攻击的理论相继出现，对此我有必要再多说几句。20年前，我和另外几位学者提出了一个危机理论，在那之后，该理论有了长足的进展。原先的模型假定，某个国家的现行政策如果与固定汇率不一致，比如开动印钞机以弥补预算赤字，那么就会被盯上。因此，固定汇率最后也必然难以为继，而这无法瞒过目光如炬的观察者。于是，可以投机的因素就产生了。当投资者预计一切将无法避免的时候，他们知道该国货币难逃贬值的命运，从而会想方设法提前逃离，而这种防范动作将使该国的固定汇率制度解体。一些更精明的投资者，由于了解整件事情的来龙去脉，会比其他人先行一步……最后的结果是，在某一特定时刻该国弱势货币被大量抛售，原先该国的外汇储备可以支撑数月到数年。

以上仍是正统的分析方式，新近的讨论则更关心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一些经济学家特别强调货币危机中自我实现所具有的重要地位。他们想象一国政府在一般情况下，会为了固守某一特定汇率而付出任何代价。不过，一旦面临投机客对货币可能贬值的猜测，政府却不愿意且（或）无法通过维持高利率的方式来捍卫该汇率。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投资人也有相同想法，那么固定汇率将会幸存下来。但是，如果投资人失去信心，那么

固定汇率就会随之崩溃。

其次，的确有迹象表明：如果外汇市场受制于非理性的想法突变，那么随着“牛群”[1]的惊慌失措，针对固定汇率的攻击场景，其表现和浮动汇率制度下的货币价格起伏非常相似。20世纪90年代几次货币危机的显著特征，就是市场不提供山雨欲来的迹象。无论是英国的黑色星期三，还是1994年的墨西哥货币危机，几个星期前投资人还在兴高采烈，将大笔资金兑换成英镑和比索，并未要求额外的风险担保（尽管每次危机前，都有很多经济学家提出类似的警告）；然后突然间，每个人都开始往外逃。除了观察到大逃亡的现象之外，难道还有其他的实质迹象吗？没有。

最后，再回到“苏黎世的银行家”（发明这个称号的英国政治人物，竟然无知到不晓得重要的银行家都在瑞士巴塞尔）。当一国的货币遭受攻击，该国财长总会将原因归罪于那些邪恶的市场操纵者。然而，经济学家会对这种指控感到可笑。不过，如果阅读近年来的商业杂志，你会发现确实有一些投资人，他们转移资金的目的不仅仅是为了逃离货币危机，更重要的是为了想方设法地引爆危机，然后从中获得乐趣和暴利。这些新的投机客大家可能还不是很熟悉，不过我已经为他们拟好了一个绝妙的称呼——小索罗斯。

当然，有两种方式可以击败所有的投机性攻击。第一种是对汇率采取漠不关心的态度，这可以消除小索罗斯们的“单向选择”。第二种是排除一切干扰，锁死汇率，最好是创建一种共同货币，不给投机客留下任何操作的空间。

哪一种方案更好呢？这个问题极难回答。有一个理论叫做“最优货币区”，可以为我们提供应该关注的重要因素清单。不过，要将这份清单转化

① 指某种从众行为，参见第二十章的相关论述。——译者注

为可操作的一组规则却非常困难。最近的理论研究——由经验所支持——似乎表明，我们应该在上述两个方案中选择其一。也就是说，身处这样一个热钱可以随意流动的世界，威信不够的固定汇率制度是最糟糕的：它不但放弃了从浮动汇率中所获得的政策自由，而且向毁灭性的投机性攻击敞开了大门。

如果有一些国家打算采取共同货币体制，那么，从经济学理论中我们能够提供的建议就是：他们应当遵循巴里·埃肯格林提出的耐克战略——想做就做。长时间的过渡期，只会给投机性攻击创造有多个目标的攻击环境，因为市场将有时间怀疑：他们要做，还是不做？

如果建立单一货币体系需要长达数年的过渡期，那么我们可以预见的是，它将遭到投机性攻击的破坏。首先，过渡期的一些规范将导致参与国的经济困难，从而失去人们对这些计划的支持，而且无法为共同货币的基础做出实质性的准备。其次，更重要的是，这将产生一种不确定性：任何国家是否都被允许加入这个俱乐部，而不论它们对该计划投入了多少？由于最后能否加入的评判标准很难达到，因此，对这些标准的解释也非常含糊。

《马斯特里赫特条约》框架——欧洲建立经济和货币联盟的计划——的制定者是不是私底下拿了小索罗斯们的好处呢？或者，他们只是享受跟欧洲同胞们玩一种庞大的现实游戏的乐趣？还是他们根本就没有深思熟虑过呢？也许只有天知道。



第六部分

超越市场



货币使经济世界顺利运转，然而它只是手段，而不是目的。本部分将尽可能地用各种方法来辨别价格与价值的不同，而经济学分析正是区分这些不同的一种不错的工具。

第一篇文章是“地球的资产负债表”，该文将通过环境政治学来重弹经济学的老调：如果重要的稀缺资源没有获得合理的价格，市场必将出错。第二篇文章则继续这个主题，然而重点放在了交通阻塞上。以上两种情况都涉及市场失灵，这些为政府干预提供了一个强有力的理论基础。然而，非常不幸的是，民主政治本身也有类似“市场失灵”的困扰，这恰恰是政治过程中必须克服的重要问题，我将在第三篇文章“鼠辈的民主”中讨论这一困扰。

余下的几篇文章主题并不是那么传统，“医疗的困境”一文主要探讨医疗技术进步所引起的深层次的道德和政治议题：我们究竟愿意花多少钱？而接下去的“CPI与恶性竞争”一文则沿袭衡量通货膨胀争议的思路，严肃看待一个不容置疑的事实：人们在乎的不仅仅是生活条件的绝对好坏，还包括相互之间社会地位的高低。

最后，以“回首过往”一文作为本书的结束。对此，我可能需要稍做解释。此文是为《纽约时报》百年纪念专号而专门撰写的。原先各位作者都接到这项任务：在各自的研究领域，想象一下自己身处2096年，然后回首过往。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在15位应邀作者中，大概只有两位愿意配合，其余的作者都对这一任务置之不理，甚至索性直书“我预测下个世纪将会发生哪些事”作为替代。对我而言，这件事实在是不可思议，因为这项任务的想法是如此有趣。当然，我撰写的内容要比这一标题严肃得多。



第二十二章　地球的资产负债表：经济学家的“绿色”贡献*

当我们反省我们的生活方式给地球这艘宇宙飞船带来太多的负担时，我和大多数人一样在心里总会感到几许愧疚。但在1997年地球日那天，我的内心却不必如此自责。我相信，其他2500位经济学家也有同感。

几个月以前，美国发展重定义组织邀请五位经济学家——包括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罗伯特·索洛和肯尼思·阿罗、哈佛大学教授戴尔·乔根森、耶鲁大学教授威廉姆森·诺德豪斯，还有我自己——共同起草了一份“经济学家关于全球气候变化的声明”，大致内容是呼吁各国采取必要的措施来限制温室气体的大量排放。坦率地说，我之所以愿意成为这份声明的发起人之一，主要原因是想表达自己一直以来的一种良好心愿，尽管并不指望它能产生多大的影响力。结果却出人意料，最后有超过2500位经济学家随之签名响应。这份声明也揭示了一个鲜为人知的事实：经济学家也是热心的环保人士。

* 原文发表于《滚石》杂志，1997年4月17日。

这似乎有些不可思议。经济学家究竟是怎样的一群人呢？按照定义，他们应该是那些受过良好的教育，而且大多数生活富裕的人。此外，经济学家对于自身的阶级属性常常怀有偏见（自认为属于中上阶层）。只要环境保护与他们的生活方式不发生冲突，大多数中上阶层的美国人都会感性地对待其周围的环境（我就经常开着耗油的越野车把纸袋子和空瓶送到资源回收中心）。然而，直觉告诉我，经济学家通常会比其他具有相同收入和教育背景的人群更倾向于保护环境。这是为什么呢？因为标准经济学理论的信奉者会不自觉地坚持环境保护的想法。

当然，这似乎与经济学家的一般形象极不吻合。人们普遍认为，经济学家是一群熟悉所有东西的价格，却对其价值一无所知的人。这群人往往认为只要是能够增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经济行为，那就是有价值的，而其他的则毫无价值可言；他们也确信，只要是自由市场的结果，那就是正确的（很抱歉，在这里我必须指出，发展重定义组织中的某些成员的确在1995年的《大西洋月刊》中，以类似的思维模式来抨击经济学家）。

然而，事实并非如此。即使是最传统的经济学教义，也远比上述这些说法更加细致。的确，经济学家普遍相信，只要价格正确（尤其是当人们为自己的经济行为付出真实的社会成本时），自由市场体系就是一种能够让经济有效运转的方式。就其定义而言，环境问题多少也涉及价格的错误，即经济活动中的私人成本没有真实地反映出其社会成本。让我们引用教科书（作者是威廉·鲍莫尔和艾伦·布林德，该书是我去年教授初级经济学时的指定教科书）中的一段话："当一家工厂污染了河流，那么它在燃烧煤炭的同时，也使用了一些社会资源。然而，如果这家工厂只为煤炭的成本付费，却不对净水资源的使用付费，我们就可以预期：工厂的管理者只会在乎煤炭的有效利用，而不会在乎水资源的浪费。"换句话说，一旦遇到环境问题，我们根

本无法期待自由市场能够发出各种正确的信号。

那应该怎么办呢？自从萨缪尔森的《经济学原理》第一版于1948年问世以来，我所知道的每一本经济学教科书都会主张：政府应该干预市场，以阻止破坏环境的行为。书中通常的建议是对污染环境的人收费（也就是污染费），或者拍卖污染权。实际上，对气候变化声明异常热烈的回应提示我们，污染税就像自由贸易一样，已成为主流经济学的一部分，因此主流经济学家普遍支持这一声明。然而，尽管像污染和交通阻塞这样的负外部性问题变得如此严重，实际上将环境成本放到市场中去考虑的努力还远远不够。因此，只要是真的相信自己在课堂上所授理论的经济学家，基本上都会支持一个比现有方案更为积极的环境保护方案。事实上，他们倾向于反对具体地告诉人们应该怎么做以减少污染的管制方法，而更赞成提供减少污染的经济激励，并让私人部门决定实施具体细节的方案。我们很难想象，一个并非受雇于反对环境保护游说团体的经济学家会相信，美国应该减少环境保护的努力（顺便再提一句，在这份气候变化声明上签名的经济学家中，有13位来自于自由市场理论的神圣殿堂——芝加哥大学）。

但是，环境保护不是会导致GDP减少吗？不一定，而且就算会，又有什么不好的呢？

表面上看，征收污染税可能会导致GDP减少。毕竟，任何税收都会降低对人们工作、储蓄和投资的激励。对汽车排放的废气征税会使人们开更环保的汽车，或者甚至避免开车。不过，这也会让多赚钱的实际好处锐减（尽管多赚钱以后，你买得起第二辆车，但是有了污染税以后，你极有可能会打消这个念头）。人们将不会像没有废气税之前那样努力工作。因此，在其他条件都不变的情况下，污染税（或其他东西）会减少经济中以货币单位衡量的产出，也就是我们所说的GDP。

不过，即使没有污染税，政府还是会有大量的税收和支出，像美国这样的“小政府”（相对于其他发达国家而言），每年经手的资金也能占到GDP的1/3。因此，当前的各种税收政策早已降低了人们从事需纳税的各种经济行为的意愿，如工作或投资。事实上，一旦开征污染税，政府增加的这部分收入将可以用于弥补其他税收的损失，如社会保险税或所得税（注意，不是资本所得税）。虽然污染税会阻碍人们从事某些计入GDP的经济行为，但通过降低其他税率，也会鼓励人们增加那些相应的经济活动的意愿。因此，总体而言，GDP可能略有下降，但也有可能增加。

如果不考虑对环境的影响，对污染征税的观点能否自圆其说呢？如果我们不必担心全球变暖，那么是否还有必要征收煤炭税呢？对于这个问题，曾经有过令人头痛的学术辩论，也就是充满迷思的“双重红利”。尽管人们至今仍没有对此达成普遍共识，但认为污染税可能导致GDP减少的声音似乎更大一些。

但是，那又怎么样呢？所有教科书在介绍GDP的定义时，都会特别说明，“GDP不能用来衡量国家的经济福利”。如果改变环境的价格，那就意味着必须减少市场商品的消费，转而增加非市场商品的消费——比如说，新鲜的空气以及休闲时光——那就让它去做吧！

的确，令人非常吃惊。竟然有数千名经济学家不仅意见一致，而且都认为我们应该在环境保护方面付出更多的努力，这真是一个温馨感人的想法啊！2500位经济学家在一起可能会犯错吗？当然有可能，但绝对不是这一次。“绿色税大转移”将导致就业税和所得税减少，因此，转而向污染和其他负外部性征税就变得理所当然。这件事除了要有仁慈的心肠外，还要有真正的科学和经济学支持。

当然，不可避免的是，“绿色税大转移”计划在政治上胜算还不高。就

像很多好的政策思路一样，它也可能无法跨越三个“I”。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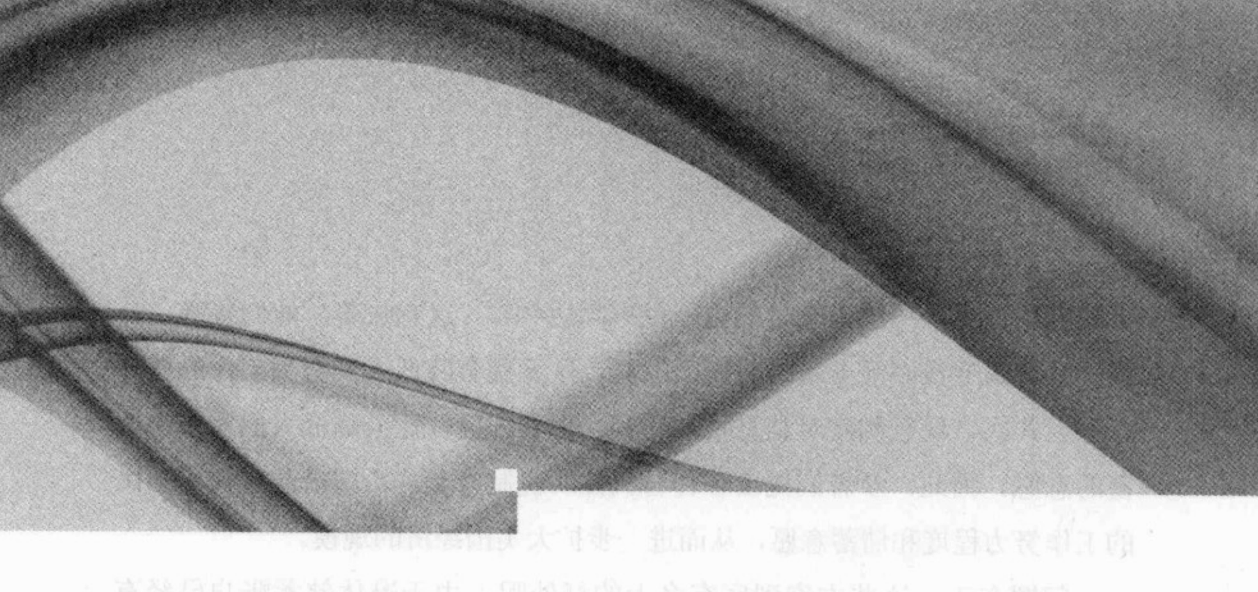
首先是无知（Ignorance）。1996年，国会为减轻短期物价上涨的压力，贸然决定降低石油税，当时只有少数选民质疑钱究竟从哪里来。因此，政客们怎么可能会笨到再去开征新的污染税，即使同时也提出降低其他税率的保证？（我那些在克林顿政府任职的朋友们说，只要涉及环保政策，即使只是在内部讨论，“税”这一字眼也是禁止出现的。）

其次是利益（Interests）。我们很难想出一个既可以控制全球变暖，又能避免煤炭行业的工作机会逐年减少的两全之策。当然，如果劳动力市场的调整机制正常的话，那么这样的问题不算太严重。然而，当煤炭工人和能源公司强烈反对环境税的时候，即使公众因环境税而大大受益，他们也不会为此去努力实践。

最后是意识形态（Ideology）。左派坚持认为污染是一种罪恶，因此，为它制定价格是一件很不道德的事情。这正是过去合理的环境政策不断难产的原因所在。然而，近年来的主要问题却出自于右派，这些保守派与大部分经济学家不同，他们真的以为自由市场是永远不会出错的——即使相当多的科学证据已经表明，在某些情况下，政府干预是必要的，但这些顽固分子仍然拒绝相信。

因此，我不得不坦率地说，我并不相信这份经济学家的签字声明能改变世界。但是，我又何曾料到，一纸声明能够获得如此多的社会回应。现在，我可以确定的是，那些签名的经济学家们绝对做了一件正确的事情。可能——仅仅只是一种可能而已——我们已在拯救地球这件事上贡献了一点绵薄之力吧！


PDG



第二十三章　税收与交通阻塞*

为什么我们要花这么多时间去讨论税制改革？为什么不能优先解决塞车问题呢？

这并不是一个愚蠢的问题。其实，处理交通问题，也是基于完美的自由市场经济学，每个环节都会与税制改革的讨论一样严谨。不同之处在于，目前的税制改革是一项不太可能完成的交易（目前极力推销的这一方案可能弊大于利），而交通改革却是一项相当明确的400亿美元的交易。交通阻塞与其他许多类似的议题一样——例如污染管理和水权——在目前的政治争论中常常被忽视（然而，当这些讨论浮出水面的时候，保守派的政客们也经常会站错位置）。那些自认为是自由市场拥护者的人，其心胸之狭隘可见一斑。

让我们来谈谈税制改革吧！各种方案漫天飞舞，包括统一税、增值税、全国销售税等。上述方案的坚定支持者认为，现行制度在经济效率上存在以

* 原文发表于《纽约时报》，1996年4月7日。版权归《纽约时报》所有，重印时已获得其许可。

下缺点：首先，一些人支付的边际税率高达40%。这意味着，他们每赚一元钱，就有四毛钱必须上缴给美国国税局，这无疑会降低人们努力工作的良好意愿。其次，现行制度对利息收入和利润也要征税，这会降低人们对未来储蓄的意愿。因此，学者们提出各种替代性的税制方案，希望借此来提高国民的工作努力程度和储蓄意愿，从而进一步扩大美国经济的规模。

问题在于，这些方案到底有多大的好处呢？由于退休储蓄账户已经有特殊的税收扣除，因此很多储蓄实际上已经是免税的了。而且，我们也不能完全免除所有的税负。无论你喜欢与否，我们都需要为政府所提供的服务付费。这也限制了边际税率下调的幅度。举个例子，在可行的统一税下，如果要维持现行所得税的税收额度，就需要20%以上的边际税率。虽然这比目前有些人支付的40%的税率要低，但事实上，大部分人根本不需要承担这么高的税率。而且，要让这种二十多个点的税率成为可能，必须通过其他新税源来进行弥补，比如取消房屋抵押贷款利息的免税优惠等。这意味着，整体经济可能会因为新的税制改革而获利，但实际上，数以百万计的中产阶级家庭将最终成为输家。

一些谨慎的税收专家相信，彻底改革税收体制的净收益非常有限。有些人会成为赢家，但也有些人会成为输家。实际上，我们不难想象中产阶级的愤怒。这意味着，为了推销统一税制度，必须维持不切实际的低利率。所谓“理想的税制改革”，必须要有利于经济增长。而典型的政治方案总是这样：一方面承诺对富人大幅度减税，另一方面又说不会增加中产阶级的负担和压力。最后的结果是，预算赤字的急剧膨胀。由此可知，对整体经济一定是弊多利少。

现在，我们再来讨论一下交通问题。交通阻塞绝不仅仅是令人讨厌的小事情而已。去年，美国人在交通阻塞上总共浪费了80亿个小时，经济成本高

达800亿美元。主要的损失是时间成本。另外，还包括额外的汽油消耗、汽车损耗等。

难道塞车真的已经成为我们生活中的一部分了吗？不对！它主要还是由制度造成的，就像税收制度一样，鼓励人们做出经济上无效率的决策行为。

不妨以我在1996年某一天的“反社会行为”为例。当时，我的工作和居住地都在斯坦福，一位住在附近的同事和我都要到30英里外的旧金山参加一次会议。其实，只要忍受少许的不便，我们便可一同前往。但是，我们并没有这样做。我最后还是决定自己开车，并为拥堵程度堪称世界第一的101高速公路做出我的“边际贡献”。或许我并没有妨碍别人的早上通勤，因为只让他们慢了不到1秒钟而已。但是，对于在我之后犹如爬行的车流来说，这样一个小小的延误，累积起来也是相当可观的。不难估算，为了我的那点便利，导致其他人的时间损失，加起来必定在1个小时以上。

对此，我们应该有办法解决才对：如果我没有增加公路的负担，其他司机必须对我和别人共乘的不便做出补偿。因为我在高峰时段开车让别人承受的塞车成本，远比我个人得到的收益要高，所以这笔交易应该让大家皆大欢喜才对。当然，这样的交易实际上很难付诸实践，但我们可以尝试通过其他方式来实现这一结果。

经济学家对待交通问题的传统药方是由政府来征收“拥挤费用”，即在车辆高峰时段征收公路使用费。以现代的技术，这样的方法甚至不需要任何收费站。电子扫描仪能够从仪表盘上的储值芯片里直接读数，或者用低能激光来扫描汽车挡风玻璃上的电子码。这些收费最终会归还给公众。合理的估算显示，这样的收费能够大幅度降低交通阻塞的成本，并且使大多数人都受益。那些在高峰时段选择不开车的人，可以从这些费用中领取现金，以作为他们不开车的补偿。而对于那些继续在高峰时段开车的人来说，则必须为更

流畅的交通额外付费。

我知道某些保守读者的想法，这又是一个政府干预私人生活的鲜明例子！但是，如果我们换个角度来看，那么这一问题涉及的财产权利并没有得到清晰的界定。高峰时段的101高速公路空间是一种稀缺资源，就如同海边那些待建的土地一样。不幸的是，没有人明确拥有这项资源，以至于它可能被滥用。

因此，我们为何不试着为道路空间的使用而建立功能健全的自由市场呢？假设在大城市中限量发行“高峰时段点数”，并分配给每个注册的司机，然后要求：凡是在高峰时段开车的人，都必须出示（由电子仪器来判断）一定的点数。同时，我们为这些点数的交易专门建立一个特殊的市场，让司机们可以自由交易。或许，有些人仍然坚持每天开车，那么他们就必须购买额外的点数。另外一些人将选择其他的交通方式，从而以交通所能承受的价格来出售他们手中拥有的点数。还有比该想法更具市场导向的解决方案吗？与收取拥挤费用一样，这一方案也能够增加多数人的利益。有些人通过卖出点数来获得额外的报酬，而有些人则因为高速交通所带来的收益大于购买点数的成本而买入所需的点数。

创造一个类似于“道路空间”的交易市场，与征收交通阻塞费用的效果是完全相同的。就像任何经济系的新生都会告诉你的那样，这两者基本上是等价的。两种方法都是通过提供市场激励，使得像我这样的人充分考虑到高峰时段开车会对其他人产生一些成本。

这一计划可带来的收益也是不容忽视的。交通专家告诉我们，合理规划的拥挤费用制度每年能够轻易地节省300亿或400亿美元的塞车成本。即使考虑到因放弃开车而产生的个人不便，每年获得的净收益仍然超过150亿美元。再加上对容易破坏道路的大卡车以及繁忙的空中交通运输征税，根据保守的

估算（你喜欢什么样的估计呢），交通改革将使美国公众每年增加400亿－500亿美元的净收入。

通过合理界定财产权利来获得可观收益的例子不胜枚举。其中一个比较典型的例子是美国西部非常稀缺的水资源。在目前的制度下，一些缺水城市的用水必须实行配给制。与此同时，沙漠中的牧民却使用宝贵的水来灌溉喂养牛群的牧草。为什么不建立水权的交易市场呢？另一个例子是电波频道。以往只是用来传送广播与电视信号，然而，现如今在人或电脑之间，对无线通信的需求日益强烈。广播权利已经成为一种极其宝贵的商品，可以在自由市场上交易。尽管近年来拍卖了一些波段，但大部分仍然原封不动。结果呢，浪费了原本可以用来传送重要商业资料的频率。

奇怪的是，为什么保守派的政治人物，即使以扩大自由市场原则作为竞选纲领，也不愿努力去建立一套应该存在但仍付之东流的财产权利制度呢？他们大可对选民做出承诺：国民收入每年将增长600亿、800亿，甚至1000亿美元，而且绝对可以光明磊落地以此为诉求，不必再靠移花接木的数据来支撑那些毫无新意的承诺。

平心而论，许多保守派的经济学家也提倡此类改革（自然，很多自由派的经济学家也是如此）。可惜的是，他们的主张完全被忽视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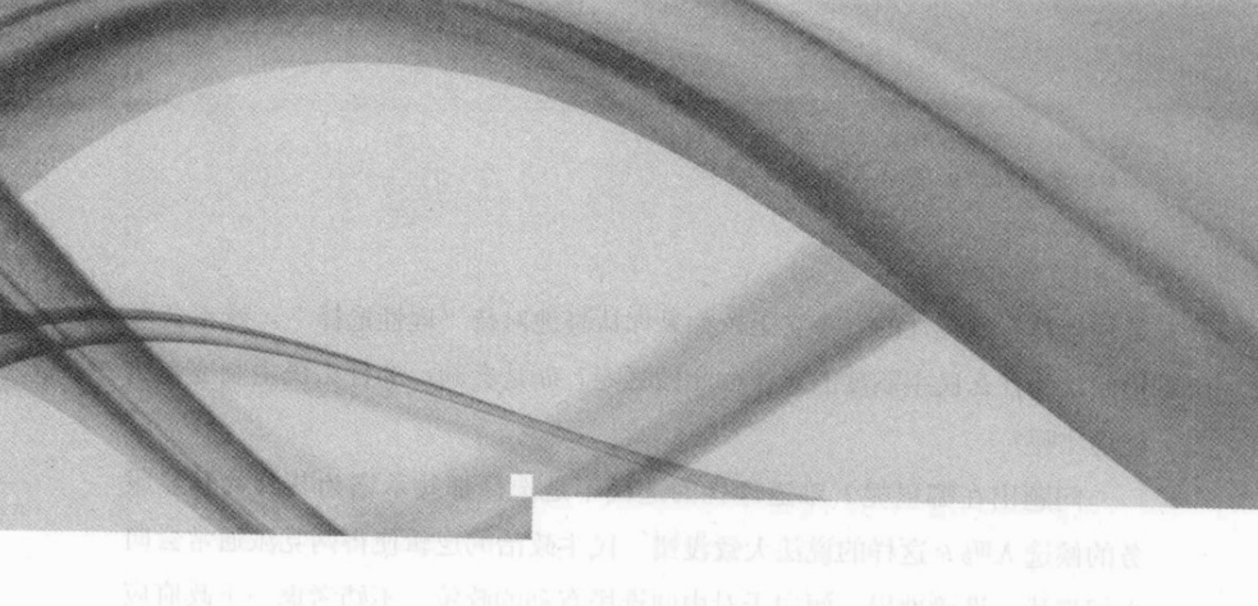
我相信，其中的原因是：在美国，许多保守主义者的那些政治诉求与所谓尊重自由市场价值的名义严重不符。他们只想用“不劳而获”的手段来哗众取宠，而极力反对“应该纳税”以及“稀缺资源应该被保护”这些有益的想法。选民们喜欢税收制度改革，而且每次总是演变为减税方案，这是因为他们以为多纳税之后，总会有人攫取这些好处。了解税收真正去向的人，一定会赞同波戈的那句名言：“我们的敌人其实就是我们自己。”

结果，杰出的保守主义者们不仅很少支持扩大市场领域的计划，甚至

极力反对。例如，供给学派的领袖人物之一乔治·吉尔德就曾经极力反对电波频率的拍卖计划（即使只是少量的）。更让人不可思议的是，他反而倡导无政府主义的做法：任何人都可以在他自己喜欢的频率上广播。这简直是疯了！由此可见，他打心底就不愿意接受“资源有限”的说法。

所以，当你下次遇到高谈阔论自由市场优越的保守派时，那就问问他关于就高峰时段的行驶权，或西部水资源的使用权建立交易市场的看法。如果他表示反对，说明他根本不是真的相信自由市场，只是相信天下有免费的午餐。而所有严谨的经济学家，无论持什么样的政治立场，都会同意：这种想法简直就是痴人说梦！





第二十四章　鼠辈的民主*

像很多宁愿往好的方面想的人一样，我也曾大量收集关于克林顿的“八卦”细节，以此来了解克林顿竞选连任的经费来源。但是，在谴责克林顿是无耻的机会主义者时，我们不禁要问：这些“无耻的机会主义者”究竟是从哪里来的呢？

乍看之下，这个问题似乎是政治分析家，而不是经济学家该管的事情。不过，倒是有分析政治问题的经济学方法，人们将其称为“鼠辈决策”（Rat Choice，Rat是Rational的前三个字母，并不是针对候选人的评价）。这一研究方法涉及政治学与经济学两个领域的交叉。鼠辈决策的有效假设如下：公众的投票行为或多或少地反映出个人利益的理性追求。这似乎是显而易见且无害，甚至有点过于乐观的想法。但是，如果你认真思考，就会发现它其实

---

* 原文发表于《滚石》杂志，1997 年 5 月 15 日。
“Rat Democracy”直译为“鼠辈的民主”，但作者在文中的真实含义为“理性民主”，有一些贬义和嘲讽之味。——译者注

是相当具有颠覆性的。事实上，如果你认真地对待“理性选择”，就不会再追问：为什么民主制度的运作如此糟糕呢？而是会问：为什么民主制度竟然能运作呢？

问题出在哪里呢？难道理性的选民不是选择那些承诺为其公共利益服务的候选人吗？这样的说法大致没错。民主政治的逻辑使得两党派通常会向中间靠拢。准确地说，倾向于对中间选民有利的政策。不妨考虑一下政府应该保持多大规模这个问题。一般而言，低收入人群更喜欢政府课以重税，以此来提供慷慨的高社会福利；而高收入人群肯定不喜欢政府这样做。民主党通常是“手头较松”，而共和党则是“手头较紧”。但是在实际的政策过程中，两党都不再如此，而是尽量满足中间选民的利益。这些人不喜欢纳税，但也不想为他们老祖母的医疗费用而发愁。

不过，许多议题并不一定涉及这么广的范围。有些仅涉及每年100亿或200亿美元。比如说，谁因为电力行业的管制解除而获益，或政府应该为西部农民的灌溉费用提供多少补贴等。尽管这些议题对所有的选民都很重要，但并不是所有选民都为此而投票。投票的只是个别选民而已。如果个别选民不厌其烦地去追踪公共政策的来龙去脉，对他们自己来说并不划算。毕竟，手中的那一张选票能有多大影响呢？

任何学过初级经济学的读者都会发现，上述内容只不过是老生常谈罢了。一个好公民的义务——比如说，在投票前获得充分的信息，为了投票风雨无阻等——常常会受到搭便车问题的威胁。搭便车问题的产生源于一些有价值的商品或服务不具有排他性，也就是最终的受益者不仅仅局限于付费者。对游船上的所有乘客来说，救生服务所提供的好处是非常明显的。但是，如果别的乘客都愿意支付这项费用，那么个别乘客就一定会能省则省，搭个便车。如果我们按照个别乘客的意见来决定救生服务的提供，那么游船

上的每个人都想搭别人的便车。其最终结果是不难想象的：该项服务的提供将会严重不足，甚至是一团糟。

此时，我们就需要政府。既然救生服务对所有的乘客都有利，那么所有的船主就必须分担相关费用，以支付聘用海岸巡逻队来提供那些非排他性服务的费用，警察保护、公共卫生、国防、传染病防治等均如此。搭便车问题让所有理智的人都不得不承认：我们需要强有力的政府。不管人们喜欢与否，一旦通过政府这一强制力量，人们都必须缴税。

不过，值得注意的是，虽然以民主过程来规范强制力量的使用是我们目前所知的最恰当的方式之一，但这样的过程同样深受搭便车问题之苦。研究理性选择理论的萨缪尔·波普金在他1991年出版的《理性投票者》一书中写道："所有人的事情就是没有人管的事情。如果每个人都多花一点时间来评估候选人，我们就会因全体候选人的充分信息而获益匪浅。如果其他人花时间去评估候选人，而我利用这段时间去研究如何投资理财，最后我不仅可以更富有，而且同样拥有一个更好的政府。"结果是，公众的行为跟你一样"理性"，以至于对政治和政策缺乏认识。如此一来，也就为特殊利益集团（那些在小议题上有大利益的人）敞开了大门，让他们可以利用金钱来使政策为其服务。

例如，很少有人知道或者意识到，美国政府是否运用大量的外交资源来为中美洲的香蕉打开欧洲市场。为什么他们应该关注这件事呢？我之所以提出这个问题，是因为我要更新我的教科书，书中有这样一句话："调和欧洲香蕉市场这一争议的努力，注定是不会有结果的。"但是，卡尔·林德纳——这位拥有金吉达品牌的香蕉业老大——对这一议题却是饶有兴趣。由于他对克林顿50万美元的政治捐款，使得克林顿总统对这一问题也变得关心起来。并不是克林顿相信，仅靠钱就能赢得大选，而是钱真的很管用。而

且，所有精明的政客最终都会了解到：在小问题上背叛公众利益的成本并不算高昂，因为众多的选民根本不会去注意那些芝麻绿豆的小事情。

那应该怎么办呢？一个办法是改变政客们的激励，让特殊利益集团难以通过政治捐款来获取影响力。也许，这一想法很容易招来大家的嘲笑，但通过法律来规范政治捐款，的确具有很大的影响力。我们不妨举一个最极端的例子吧！据我所知，公开贿赂在联邦政策的决策过程中并没有扮演重要的角色，但如果将公开贿赂合法化的话，情况就截然不同了。所以，无论如何，务必尽快推行“竞选经费来源”的制度改革。不过，不要对此抱太高的期望。

另一个办法是努力提高公民意识。有些人相信，只要媒体能适度尊重民众，就可以培养出有责任感的公民，他们会将注意力从名人的性丑闻转移到各种政策性提案上来。或许吧！但有一件事可能没错，那就是美国的政治品质深受其害。因为人们逐渐对各种公共组织失去信任，而这些公共组织以往所扮演的角色，至少在某种程度上，是公共利益的守护神。从前，政客们必须兼顾工会、教会、报纸主编，甚至地方政治领袖的反应。这些人有时间而且非常关心政治，喜欢对任何问题刨根问底。如今的社会是很多分散个体的大组合，电视成为绝大多数消息的主要来源。如果有人能够想出办法，让过去的意见领袖们重新回来的话，那我会举双手赞成。

最后，我们可以尝试减少诱惑，避免那些受政客偏好影响的政策性提案。这也是为什么当罗恩·布朗与一大帮商人要到中国进行商务旅行的时候，我们一起集体反对的主要原因。姑且不论这类商务旅行是否有利，或者是否给人一种印象——外国人也可以影响美国的外交政策，但可以肯定的是，它向我们提出了另外一个问题：究竟谁才能够搭上这架“飞机”，如何搭乘？

总而言之，理性选择的这一结论到目前为止仍然是无法完全颠覆的：要让民治的政府完全转变为民享的政府，几乎是一件不可能完成的事情。

第二十五章　医疗的困境*

20世纪80年代初期，当时因特网还没有问世，而科幻小说家布鲁斯·斯特林就已经开创出后来被称为“网络叛客”（Cyberpunk）的小说类型。网络叛客的主角往往就是逍遥法外的电脑黑客和凶恶的跨国公司。他们为争夺电脑空间（Cyberspace，由另一位科幻小说家威廉·吉布森所造）的控制权而战。但在斯特林1996年的小说《圣火》中又想象出一个完全不同的未来世界：这个世界完全被一个全能的老人政府所统治，为了研制出一种昂贵的、可以延长寿命的技术，这群老人在世界范围内到处搜刮财富。不管你信不信，他们的女英雄竟然就是一位“芳龄”94岁的医疗经济学家。

从这本小说的出版时间来看，斯特林对这一问题显然算不上先知先觉。民众对医疗成本的关注在1993年达到顶峰，然后迅速下降。在这段时间内，克林顿的健康维护计划彻底失败了，长期以来不断上涨的私人医疗费用也趋

* 原文发表于《纽约时报》，1997年3月9日。原文标题为“变老的社会成本有多高”。版权归《纽约时报》所有，重印时已获得其许可。

于平缓。很多企业开始将员工的疾病医疗转移到更具成本意识的健康维护组织。不过，在挽救社会保险体系的争辩屡屡成为媒体焦点的同时（很不幸，常在细节上做文章），却很少有人质疑国会与克林顿政府的预算计划。这些计划预先假定：国家医疗保险制度支出的增加，不会引致太多严重的后遗症。换句话说，我们的危机感很快便会消失，人们普遍认为医疗成本问题迟早会自动解决。

然而，最近却有很多不好的消息传出，医疗成本又开始继续上扬。突然之间，我们对医疗成本这一问题毫不在意或者先前的惊慌失措，都变得毫无道理。实际上，不论是惊慌失措还是毫不在意，都源自于我们对问题本质的误判。

过去几十年来，美国经济已经越来越数字化和全球化，更为重要的是，已经完全医疗化。1970年，我们花在医疗维护方面的费用仅占GDP的7%，而如今这一数字是当时的两倍，而且大概每十个劳动力中便有一个从事医疗服务工作。按照这种趋势发展下去，那么几年之内，在医生办公室和医院工作的员工数量将超过工厂的工人。

这很重要吗？正如哈佛大学卫生经济学家约瑟夫·纽豪斯所言，“一般国民或者经济学家对大多数经济部门，比如个人电脑、传真机或者移动电话产业的快速成长，都不会特别注意”。这些行业的成长往往被认为是一件好事，而医疗行业的成长却通常被认为是一件坏事（不久前，在《大西洋月刊》上刊登的一篇文章甚至建议，在衡量经济增长的时候，应该将医疗支出从GDP中扣除，因为这是成本，而不是收益）。说真的，应该把“膨胀的”这个形容词放在医疗成本之前，使其成为一个固定的修饰语，因为我们都一致认为从医疗支出中没有获得任何收益。

当然，被纽豪斯称为“医疗浪费的鸡尾酒会”也道出了其中的部分真

相：传统的医疗保险方式，并没有给医生提供思考医疗成本的动机。而结果呢？就如医疗改革的倡导者之一艾林·恩索文所言，医疗成本呈现出“水平线”，也就是说，医生会不计成本地探索任何可能的治疗方法（或许，这是因为具有很高的医疗价值）。重新引进某些激励，将有助于降低医疗成本。例如，国民医疗保险制度在1983年的改革之后就已不再支付医院的所有成本，而采用定向定额的方法支付。政策实施之后，人们的平均住院天数大幅度减少，同时对医疗质量也没有产生明显的副作用。

但是，一段时间之后，住院成本又开始攀升。事实上，医疗行业具有明显的规律，每次成本控制之后（比如，对国家医疗保险制度采取定额定付，以及以健康维护组织的方式来取代传统的医疗保险），医疗费用都得到了有效的抑制；但几年之后，又开始增长。

为什么面对医疗成本的不断上升，我们却束手无策呢？答案——关于健康医疗的小秘密——其实也很简单：我们确实用钱买到了某些回报。其实，医疗专家们一致认为，导致医疗成本不断上升的主要原因，既不是贪婪，也不是低效率，更不是老龄化，而是科技的进步。过去的医疗成本不高，不是由于医生廉价，或医院管理有方，而是因为不论人们愿意支付多高的代价，能够供应的药品种类总是非常有限。1940年以后，医疗技术突飞猛进。由于有了新的诊断技术，人类能够辨别以前只能靠猜测的病因；通过新的外科手术，可以治愈以前只能听天由命的疾病。尽管费用高昂，但一旦有了新的治疗方法，确实能够治愈（至少是缓解）过去只能苟延残喘的症状。我们不惜耗费巨资，去挖掘那些有用的新药，因此医疗开支也就越来越庞大，这才是这一问题的关键。

有人常说，花在医疗上的费用占国民收入的比例，今后不能像过去那样持续上升了。但是，为什么不能呢？有一句很古老的话，“拥有健康，就

拥有一切”。斯特林小说中的那个主角（女经济学家），以不可思议的方法——仍然有实际的医疗研究作为基础——想要重获健康。其实，谁不想以世俗的一切财物来换取健康呢？除了受限于医疗技术之外，不难想象，有一天我们可能会将30%的收入花在延长生命和提高医疗品质上面。

由此，一些经济学家主张，我们不必再为医疗成本的上升而忧心忡忡。正确的做法是，努力促使医疗体系更加经济、合理。例如，取消只对工资征税而对医疗收益免税的倾斜政策。如果这样，人们还愿意让医疗支出占收入的比例继续上升，那就随它去吧！

不过，事情并非如此简单。毕竟，医疗和其他商品都不太一样。

最大的差别在于，医疗经费中有一大部分来自于政府开支。在大多数发达国家，政府必须承担大部分的医疗支出。即使是在贯彻自由市场精神最彻底的美国，公共部门也承担了超过40%的医疗支出。这样做本身就会引发一个特殊的问题。要想了解美国经济如何支撑更为庞大的医疗部门，也许并不太困难。难的是，美国政府究竟将如何管理这笔支出。和谐联盟的彼得·皮特森是现代的卡桑德拉[①]，他曾提供了一份引起社会轰动的数据，指出在婴儿潮中出生的那些人将如何对政府的预算造成负担。然而，有证据显示，皮特森所说的未来财政负担，纯粹是人口结构改变的结果（即老龄化），充其量只能作为一部分解释，其余部分则可以从不断增加的医疗支出方面找到答案。即使不考虑人口老龄化这个因素，国会预算办公室也预计：到2030年，社会保险支出将从目前占GDP的5% 上升至7%；而国家医疗保险制度与国家医疗救助制度的GDP比例，则从4%大幅上升至10%。（有些人对这些预测结果表示了质疑，他们认为：医疗费用如果真像国会预算办公室预测的那样大

① 卡桑德拉，是古希腊神话中的女预言家。——译者注

幅度上升，那么等到婴儿潮出生的那些人成为老年人的时候，健康医疗支出占GDP的比例将比目前高出很多。而这些，他们认为完全只是杞人忧天的想法而已。但是，为什么就不会发生呢？）

也许有人会说，答案很明显：我们必须放弃“每个人都有权利接受最好的医疗技术照顾”的想法。（这是某些政客的言外之意，他们坚称：国家医疗保险制度的经费并未减少，他们所做的只是减缓增长速度而已。）不过，真要放弃上述想法，就必须坦然接受某些后果。问题是，我们已经做好相应的心理准备了吗？

“在发达国家，几乎每个人都足以维持基本生活”，现在这一想法已经被我们视为理所当然。一般人虽然吃不起三星级的餐馆，但填饱肚子已不是问题；也许穿不起布鲁诺·马格利牌的鞋子，但也不至于赤脚；也许住不起马里布[①]般的住宅，但总会有遮风挡雨的地方。然而，这些要求一直到最近才成为事实。在过去，精英阶层的健康条件一直要比普通大众好得多，因为只有他们才能摄取到足够的营养。英国在小说家狄更斯的那个时代，就青少年来说，上流社会的子弟们平均身高比工人阶级的子弟们要高出10英寸。真正的人道主义和公平对人类生活所带来的冲击，并不仅仅体现在货币收入的分配上。

目前，就美国普通工人家庭而言，仍然有一项基本的生活需求无法得到满足，那就是医疗照顾。不幸的是，随着医疗产品的日新月异，其成本也不断上升，导致这项基本需求的成本随之增加。因此，历史上曾经出现过的那些不公平现象很可能重现人间，甚至可能更为严重。

如果1965年林登·约翰逊总统否决了国家医疗保险制度，那么今天很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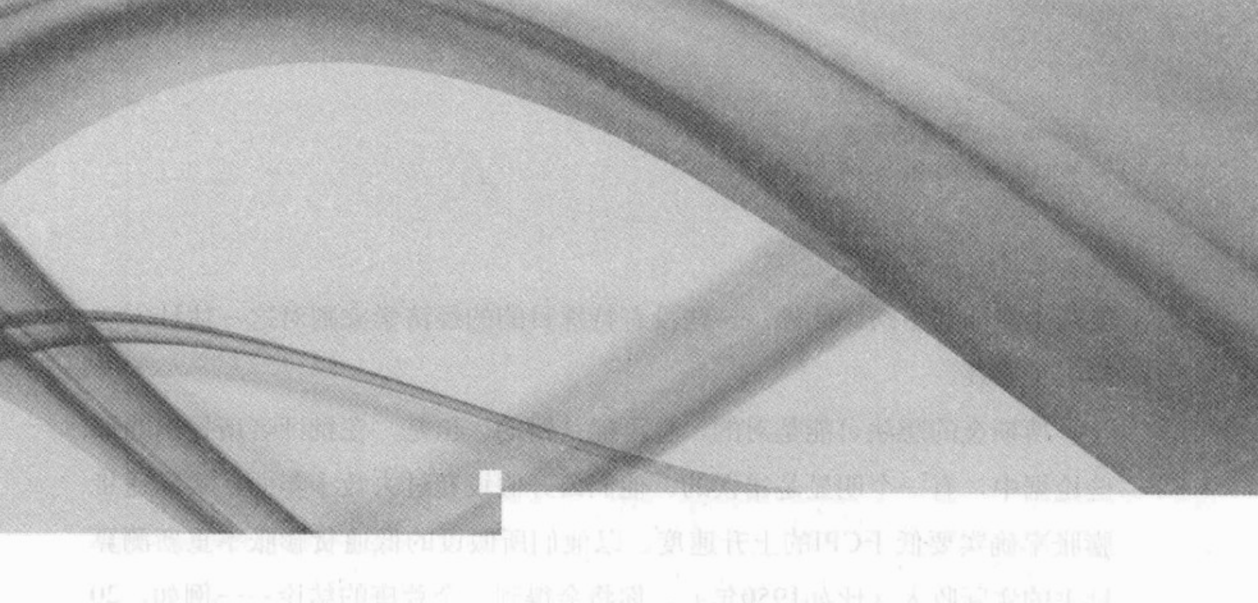
① 马里布是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的一个城市，以海边的高级别墅著称。——译者注

可能出现这样的局面：年纪较大的富人与普通老百姓的生活水平会处于极端的不平等状态。富豪们可以换人工臀或做冠状动脉搭桥手术，而其他人——正如较贫困国家的那些老人——却只能在疾病中奄奄一息，甚至直赴黄泉。

现在流行的一种观点认为，医疗支出所造成的预算负担，只有靠配给来解决；联邦政府所要做的，就是减少对许多昂贵的疾病诊治过程（即使目前的医疗技术能够实现）的支出。问题在于，万一这些治疗方法真的奏效（不无可能）——例如，倘若有一天，有些人的财力足以支付让自己长命百岁（而且，还是如此的生龙活虎）的医疗费，甚至能够让自己返老还童（而且，还是如此的聪明伶俐）——然而，没有支付能力的人，却只能指望活到《圣经》上所说的70周岁，你会接受这样的未来吗？

有人可能会说："我们没有其他选择了呀！"但是，实际上我们是有的。想象这样一个社会，为了让每个人都能享受先进的医疗技术，而对人们课以重税。即使一时办不到，给予的配额标准也不是财富，而是其他标准（按照斯特林的想象，未来的政府体制就是一个超级保姆国家。但是，这个保姆只奖励个人的卫生保健，而不奖励个人拥有财富，即社会照顾那些懂得照顾自己的人）。

这样的结果在当今的政治环境中是不可能实现的，因为目前的环境流行的是低税负以及反政府的意识形态。但是，历史尚未真正终结，而意识形态却有可能发生变化。就我们所知的而言，未来的国家是一个医疗福利的国家，它的口号也许就是"各尽其能，各取所需"。



第二十六章 CPI与恶性竞争*

让我们来谈谈通货膨胀指数与生命的意义。

1996年年底，由斯坦福大学教授迈克尔·博斯金领导的一群经济学家，半官方地宣布了一项大部分专家都已表达过的看法：消费者价格指数（CPI）高估了实际的通货膨胀率。尽管没有确切的数字，但根据博斯金及其研究团队的估计，每年大概高估了1.1个百分点。经过数十年的累积，产生了一项巨大的误差。

这一结果颇具争议。一些人担心，对通货膨胀率的过低估计，将削弱社会保险的支付能力。原因在于，这些社会保险的支付将根据估算的CPI指数进行相应的调整。另一些人却惶恐不安：一旦对价格的历史重新进行诠释，无异于要他们放弃声名所系的世界观，因为这些人都曾经相信，生产率上升而实际工资下降。如果实际通胀率低于先前的估计，那就意味着实际工资可

* 原文发表于《滚石》杂志，1996年12月21日。

能是上涨而非下跌。此外，一些没有特殊目的的经济学家则对这一估计方法提出了质疑。

博斯金的想法可能是对的，也可能是错的。但是，在批评者所提出的那些论据中，有一个明显是错误的。他们公开假设在过去数十年间，实际通货膨胀率确实要低于CPI的上升速度。以他们所假设的低通货膨胀率重新测算过去的实际收入（比如1950年），你将会得到一个荒唐的结论——例如，20世纪50年代初期，即二战后的富裕时代，大部分美国人生活在我们今天所认定的贫困线以下。一些批评者认为，这一结论彻底推翻了博斯金上述报告的结论。

生活在20世纪50年代的美国人大部分都是穷人。这一想法的确有些荒谬，但并不是因为博斯金的数据。毕竟，按照现在的标准，即使你以未调整的CPI为基础，1950年美国中值家庭（收入分配排在第50个百分位数）的生活水平仍然是相当低的。如果以1994年的美元来衡量，那么1950年美国中值家庭的年收入只有18 000美元，这大概只是目前收入分配排在第20个百分位数家庭的年收入。按照当今法律的定义，收入分配排在第20个百分位数的家庭（也就是说，比80%的人贫困）也许并不贫困（只有约12%的家庭处于官方的贫困线之下），但是，他们多半会认为自己处于不利的或者失败的社会地位。所以，即使采用旧的数据，1950年大部分美国家庭所拥有的物质生活水平，并不会优于今天的穷人或准穷人。

如果我们直接去了解人们当时的生活方式，我们会更加确信这一点。1950年，大约35%的住宅没有室内水管装置，许多家庭依然没有电话或汽车。当然，只有极少数人家才有电视机。一个收入分配排在第12个百分位数的现代美国家庭（刚好处于贫困线上）肯定拥有冲水马桶、淋浴装置以及具有长途直拨功能的电话。或许，还有一台彩色电视机，甚至还有一辆汽车。

如果考虑到其他产品的质量改进，我们可以信心十足地说，1996年处于贫困线上的美国家庭，其物质生活水平毫不逊色于1950年的美国中值家庭。

这一说法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如果你可以在上述两种物质生活水平之间进行选择，那么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你将倾向于选择1996年排在第12个百分位数，而不是1950年排在第50个百分位数的生活水平。然而，这是否表示1950年大部分的美国人都是穷人呢？当然不是，因为人们的生活并不仅仅是面包、汽车、电视机或水管等配件。

不妨再想象一下，让一位疯狂的科学家回到1950年。他能够提供神奇的机会，通过时空穿梭将那些中值家庭带到20世纪90年代的奇妙世界，并且将其放在收入分配为第25个百分位数的位置上。与1950年的中值家庭相比，1996年的第25个百分位数家庭在物质生活水平上明显优越很多。然而，他们会接受这样的机会吗？几乎可以肯定，他们并不会接受。因为在1950年他们还是中产阶级，而在1996年尽管物质生活更为舒适，但他们却变成了社会的“穷人”。人们不仅关心绝对的物质水平，同时还关心相对的物质水平。

我认识许多学术界的专业人士，尽管他们拥有漂亮的房子、两辆汽车和令人羡慕的工作环境，但是他们还是会感到失意落寞，因为他们从来没有获得过哈佛大学的聘书，而且也可能拿不到诺贝尔奖。他们的物质生活相当富裕，但是当以参考群体的标准来衡量自己时，也会感到失落。另一方面，正如汤姆·沃尔夫所言，成为富人无非是获得了“看着其他人跳脚”的那些无聊乐趣。特权并不是实现其他目的的手段，而是它们的目的。

与我一起在《滚石》杂志上写专栏文章的作家罗伯特·赖特无疑会说，人们对于地位的关注其实可以从演化的角度找到一个满意的答案。在我们祖先生活的时代，一个男人要是能够挑选到生育能力最强的女人作为配偶，他就有可能拥有更多的后代。而这是否能够成功，往往取决于男人的身份

地位，而不是他的绝对生活水平。因此，勇于追求身份地位的雄性与不追求身份地位的雄性相比，前者会留下更多的后代，最终结果是比尔·盖——盖——不！我的意思是罗纳德·佩雷尔曼。

由于以上言论，我作为经济学家的执照，是否会被吊销呢？经济学家们不是相信“经济人”假设吗？同时，也承认人们对于地位的关注，这不会损毁整个经济学研究方法的大厦吗？我想，并非如此。那些自私自利的经济人，并不是我信仰的主要支柱。尽管在很多情况下，它依然相当有效，但它只不过是一个理论上的工具假设而已。

但是，承认人们的幸福感取决于他们相对的经济地位和绝对的经济资源，却有一些颠覆性的味道。例如，许多保守派人士以博斯金的报告为武器，攻击那些抱怨美国的国民收入持续下降、贫富差距日益扩大的自由派。他们坚持认为，自由派的指控只是统计上的一场骗局而已。当然，你完全可以反驳。20世纪50年代，美国是一个中产阶级社会，而到了20世纪90年代，情况发生了变化。也就是说，当时的收入分配还算比较平均，因此人们对共同的生活方式感受更为强烈。在那个相对平等的岁月，虽然以今天的标准来衡量，人们的生活水平相当贫穷（如果博斯金是对的，那么甚至会更穷），但是人们对生活普遍感到满意。这意味着，即使人们的物质生活水平没有提高，但只要改善收入分配的平等程度，同样能够构建一个快乐和谐的社会。换言之，你可以用生活在50年代的人们并未感到贫穷这一事实作为理由，要求采取更为激进（甚至远比多数左派激进）的平均主义改革措施。

你甚至可以主张，20世纪90年代美国人的成就感虽然很强，但满意度却很低。在收入与地位相对平均的社会，没有人会感到被抛弃。而在等级森严的社会，人们对翻身做主并不抱什么希望，所以也不会因为没有获得升迁的机会而感到挫败（贵族一向不是平民的参考群体）。不幸的是，当代的美国

恰恰就是这样一个不平等的社会。虽然每个人都可能获得巨大的成功，但实际上，只有少数人能够真正做到。结果是，不论过得多么舒适，很多人（甚至是大多数人）都觉得自己不够成功：在任何人都能成为总统的国家，未能真正成为总统的人都是失败者。我的欧洲朋友们，总是对美国人——即使那些已经很有钱的人——工作的努力程度感到吃惊。为什么我们不多花点时间来享受一切呢？答案当然是：我们之所以辛勤地工作，是因为我们下定决心要领先于别人。然而，这注定是一次失败的努力（对整个美国社会而言），因为关于地位的竞争，其实是一场零和博弈，不可能所有人都处于领先位置。无论我们跑得有多快，总有人得落后。

按照以上思路，或许会推导出很多关于经济政策的激进想法，而这些想法与目前的正统观念大相径庭，但我并不打算在这一专栏中对这些想法继续深究。坦白地说，我已经没有时间了，我必须回到自己的研究中去。否则，其他人也许会抢走我的诺贝尔奖。





第二十七章　回首过往*

当我们回首过往时，应该设身处地考虑到别人的难处。责备20世纪末的观察家未能成功预见到本世纪发生的每一件事是不公平的。即使是在今天（2096年），长期的社会预测仍然是一门不精确的科学。1996年，现代非线性社会经济学的创始人还只是一些默默无闻的研究生而已。更何况，那个时候许多人都已经明白：经济变迁的主要动力，一方面是不断进步的数字技术，另一方面则是经济发展扩展至先前相对落后的国家。对此，我们并不感到吃惊。真正令人困惑的是，那个时代的权威人士完全误判了这些变迁的经济后果。

对于这些世纪末的未来学家略带瑕疵的见解，最好的解释是：除了少数人之外，他们对完美的经济时代非常期待，因为它将人们从物质世界的肮脏活动中解放了出来。同时，他们也坚信，未来将以信息经济为主导，主要生

* 原文发表于《纽约时报》杂志，1996年9月29日。原文标题为“白领变蓝领”。版权归《纽约时报》所有，重印时已获得其许可。

产那些无法触摸的服务。最热门的职业将是符号分析师，工作内容是在电脑屏幕上选按符号。知识将成为财富与权力的主要来源，而不再是传统的重要资源，例如石油或土地等。

但是，直至1996年，上述说法仍然显得非常愚蠢。首先，即使在信息经济时代，作为一个经济体，最终还是要满足消费者的需求。事实上，消费者需要的不是信息，而是那些可以触及的商品。尤其是那些拥有数十亿人口的第三世界国家，在20世纪后期逐渐有了一些购买力，他们需要的不是网络上的漂亮图片，而是住上舒适的房子，有车可开，有肉可吃。其次，20世纪末的那场信息技术革命，就像人们认识到的那样，虽然场面蔚为壮观，但也只是局部的成功而已。简单的信息处理变得又快又便宜，远远超出任何人的想象。然而，人们曾经满怀信心的人工智能，在发展过程中却屡屡受挫。该项技术的发明人之一马文·明斯基曾经绝望地表示，“被人们模糊地称为常识的东西，实际上远比大部分专业知识更复杂、更难以处理。”而处理物质世界却又非常需要这些“常识”，这就解释了为什么直到20世纪末管道机器人仍然没有出现。

最重要的是，那些预言信息经济时代即将来临的先知们，似乎忘记了最基本的经济学原理：当某种产品供给非常充裕的时候，它就会变得很便宜。在一个信息泛滥的世界，信息的价值将变得微不足道。一般而言，当经济体非常擅长某种经济活动时，这种活动就会变得更没有价值。20世纪末，美国的粮食生产效率很高，而这正是农民们不愿意从事粮食生产的重要原因。同理可知，21世纪末，美国在日常信息处理上的高效率，正是传统的白领工人逐渐消失的主要原因。

以这些观察为背景，让我们再来回顾一下1996年那些观察家们应当预见但没能预见到的五个主要经济趋势。

一、自然资源价格持续上扬

20世纪90年代初期，原材料的价格低得惊人。更令人费解的是，为什么会有人相信这种状况将持续下去呢？正如少数孤独者坚信的那样，地球是一个资源有限的星球。当20亿亚洲人开始渴望过西方人那样的生活时，人类对有限的矿产资源、石油燃料，甚至粮食的争夺战就会不可避免地爆发。

事实上，早在1996年就出现了警告信号。那年春天，油价曾经一度飙升，主要原因是反常的寒冬以及对中东地区石油供给量的错误估计。虽然这场油价上涨的危机很快得到了平息，但它想必已经提醒人们，如果20世纪90年代中期，全世界的工业国家都像70年代早期那样发展，那么很容易遭受石油供给中断所导致的负面经济冲击。但是，这个警告很快就被人们忽视了。

然而，局势很快变得明朗，自然资源不但没有贬值，反而变得比以前更加重要。19世纪，发财要靠工业；20世纪末，人们靠技术致富；而今天的超级大富翁，主要是拥有大片的土地和采矿权。

二、环境成为所有权

20世纪，人们喜欢说一些奇怪而有趣的话，例如“像空气一样免费”、“花钱如流水”，仿佛空气和水都可以无限量获得似的。但是，当数十亿人拥有足够的钱来购买汽车、旅游度假产品和塑料包装食物的时候，整个地球的环境本身所允许的承载量是有限的。也许，这已经成为提升平均生活水平唯一的重要限制。

很显然，1996年人们克服环境限制的主要方法是通过市场机制，将这些限制转变为新的财产权形式。20世纪90年代早期，人类朝着这一方向迈出

了第一步。当时的美国政府，开始允许电力公司买卖某种污染物的排放权。1995年，美国政府在拍卖电磁波频率的使用权时使用了这一方法。今天，凡是会对环境产生负面影响的活动，都被贴上了昂贵的价格标签。我们很难相信，1995年普通家庭在为温尼贝格房车加满汽油时，只需支付每加仑1美元的价格；而且总共只需支付5美元，便可将车子开到约塞米特国家公园。即使剔除了通货膨胀因素之后，同样的旅行今天需要支付的费用也相当于当时的15倍左右。

当时没有人知道，将环境的限制转变为所有权之后会产生什么样的经济后果。在政府决定对人们所造成的污染和交通拥堵进行收费之后，环境执照的费用已经成为企业的主要经营成本。今天，执照费用总收入已经超过GDP的30%，成为政府主要的收入来源之一。经过几次调整之后，联邦所得税终于在2043年被废除。

三、大城市的重生

20世纪后期，传统意义上的那些居民密集、高楼林立的城市形态，似乎不可避免地开始衰亡。由于现代通信工具的广泛使用，普通员工在一起工作的必要性显著降低。结果是，越来越多的公司将后勤办公室从曼哈顿下城和其他的主要商业区纷纷转移到郊区的办公室园区。我们曾经熟悉的城市景象似乎正在消失，取而代之的是随处可见的低层建筑，偶尔有几栋十层高的办公大楼侧身而立。

然而，事实证明，上述情形只不过是一个过渡阶段而已。首先，在高油价和环境许可制度的约束下，一人一车的交通模式已经变得不可行。今天，在道路上行驶的主要是大量共乘的微型面包车，而控制它们的则是相互连接

的电脑网络。这个准大众的运输系统，虽然超乎20世纪上班族们的想象（拥有400多万名驾驶员，提供门到门的运输服务），但是与上班族或购物者自驾车相比，还是需要花费更多的时间。此外，那些在郊区兴起的工作（主要相对于日常的办公室工作），恰恰是20世纪90年代中期被大量精简掉的工作。一些工作被大量转移至低收入国家，另一些工作则被电脑取代。那些无法转移至海外或者由机器完成的工作，也就是需要人们亲自处理的工作——需要面对面的交流或者需要人们在一起处理原材料，最好还是安排在人口密集的都市区。因为在那里，至今仍然保留着最有效率的大众运输系统，那就是电梯。

当然，上述这些发展是有迹可寻的。20世纪90年代初期，许多人都在猜测究竟哪个地区将成为崛起中的多媒体工业中心。是硅谷，还是洛杉矶呢？而到了1996年，这一答案已经很明显，那就是曼哈顿。曼哈顿密集的人口非常适合那些日益重要的近距离、面对面的互动性工作。当然，今天的曼哈顿完全可以吹嘘它与圣彼得堡、班加罗尔等地拥有几乎同样多的200层高的摩天大楼。

四、高等教育的贬值

20世纪90年代的人们普遍相信，无论是对个人，还是对国家而言，教育都是取得经济成功的关键所在。学士学位，甚至硕士学位，对于那些想要从事“符号分析师”工作的人来说，都是一个不可或缺的台阶。

尽管计算机对混乱的真实世界无能为力，但它非常善于分析符号。而且，人们可以很容易地将符号传送到阿斯马拉或者拉巴斯进行分析，成本比在波士顿处理要低得多。因此，在本世纪，许多需要大学学历的工作逐渐遭

到淘汰，而剩下的工作只要一个聪明人就可以胜任，而不管他是否主修过世界文学。

这种趋势甚至在1996年就已经非常明显了。当时，美国最富有的人比尔·盖茨只是一个大学的辍学者，尽管他没有接受过太多的正式教育，但这一点也不妨碍他创建全世界最大的IT公司。

让我们回到1996年，看看当年在美国造成极度恐慌的企业裁员潮。正像经济学家们所指出的那样，以历史的标准来看，美国人在20世纪90年代失去工作的速度，并不是最高的。但是，为什么当时的裁员会成为媒体的重大新闻事件呢？这是因为那是有史以来的第一次：一方面，对熟练技师和其他蓝领工人的需求很强烈，另一方面，大量的白领和受过高等教育的技术工人遭到解雇。这应该是一个再清楚不过的信号了：对于那些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来说，在工资方面享有绝对优势的时代正在悄然而逝。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当时的人们并没有注意到这些事情。

当然，高学历人群的收入下降，反过来对教育产业本身造成了巨大的冲击。为什么一个学生要花四年时间读大学，接着再花几年时间去读研究生，以获得那些没有任何货币价值的学历证明呢？今天，人们只需要接受6—12个月的职业培训，就可以从事很多工作，如特别护理、木匠、家政服务（这些职业取代了以前通常由配偶承担的家务劳动），然后获得同拥有硕士学位的人差不多的薪水，甚至比那些拥有博士学位的人赚得还要多。因此，大学的新生入学率在世纪之交达到高峰之后，将下降近2/3。许多高等教育机构在这种恶劣的环境中根本无法生存下去。许多著名大学都试图克服这些困难，但它们不得不改变大学的特点，并且重新扮演以前的角色。如今，像哈佛大学这样的地方，就如同19世纪那样，更像是社会机构，而不是学术机构，即成为富家子弟学习优雅的社交礼仪，并与其他同一阶层的人士交往的场所和

地方。

五、名望经济

1996年，曾经有敏锐的观察家注意到了这种趋势，但不知为何，在当时并没有引起人们的充分重视。尽管商业大师一再宣称，创造与发明要比一成不变的制造生产好得多。但实际上，由于信息的传递与复制变得越来越容易，创新的利润空间已经越来越稀薄。今天你推出了一款成功的软件，明天每个人就可以在网络上免费下载。今天你录制了一场绝美的音乐会，下周盗版CD将会在市场上出售。如果你拍摄了一部不错的影片，下个月高清晰的录影带就可以在墨西哥城随处买到。

那么，创造力究竟如何才能赚到钱呢？一个世纪前，答案就已经非常明朗，创造力必须通过推销其他东西的方式来间接地赚钱盈利。例如，汽车制造商通过赞助国际汽车大奖赛来提升自身产品的公众形象，电脑制造商则通过赞助软件编程高手来培养他们对于某些硬件品牌的认同。对个人而言，也是如此。录制唱片对于四大女高音来说赚不了多少钱，但却可以为她们的舞台演出做广告。歌迷们参加这些音乐会，当然不是为了欣赏音乐（在家里听效果可能会更好），而是为了亲眼目睹心中的明星偶像们。还是那位技术预言家艾斯特·戴森说得好，“免费的复制品是你确立名望的好方法。之后，你只需要出门，就能赚到钱。”换句话说，我们不但没有迈向一个知识经济的社会，反而陷入了一个名望经济的世界。

幸运的是，科技虽然无法使知识资本化，但它却为“名望”创造了更多的机会。500个频道的世界拥有许多亚文化，每个频道都有自己的文化英雄。总有人愿意为了见到女高音——也包括记者、诗人、数学家，甚至经济学

家——而付钱。安迪·沃霍尔曾经预言过那个所有人都可以出名15分钟的世界，可惜现在他显然错了。如果确实有很多人曾经出名过，那也不是因为昙花一现，而是因为在如此多样化的社会，有很多可以让人出名的办法。

当然，所谓的名望经济也令某些人穷困潦倒，特别是像我们这样有一定学术志向的人。一个世纪以前，做一个纯粹的学者尚可勉强维持生计：许多像我这样的人可以成为一个薪水不错的大学教授，也可以靠教科书的版税来增加收入。然而今天，教书的工作不仅很难找，而且工资也低得可怜，同时再也没有人会靠卖书赚钱了。如果你打算献身于学术工作，那么你只有三个选择（同样的选择也出现在19世纪，也就是在制度化的学术研究兴起之前）：第一是像达尔文那样生来就很富有，仅靠遗产就可以过上优越的生活；第二是像阿尔弗莱德·华莱士（进化论的另一位奠基人，不过缺点运气）那样，你需要从事其他工作以维持生计，而研究只是作为一种业余爱好；第三是像19世纪的科学家们那样，等到拥有一定的学术声望之后，通过巡回的学术演讲来大笔赚钱。

诚然，与过去相比，名望已经变得更为平常，但也不是那么容易获得。这也是我写这篇文章的主要原因，因为它对我来说，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其实，我并不介意白天在医院的诊所拼命工作，但我更想成为一名全职的经济学家。像这样的文章或许可以让我的这一理想有美梦成真的那一天。

译者后记

这是一本神奇的小册子，它对现实世界的解读一定会让我们感到惊奇。当我在早稻田大学高田早苗纪念图书馆看到这本书的时候，立刻就被它的内容深深吸引了。匆匆翻阅了“4%的那些蠢驴们”、“日本究竟怎么了”等文章后，突然萌生了一种相见恨晚的感觉。当夜挑灯读完此书，早上回到办公室，索性就在Amazon上买了简装本。与早稻田大学的工作协议期满回国之后，才发现这本书在国内并没有中文版，于是自告奋勇推荐给出版社。始料未及的是，克鲁格曼名气虽大，但他的书在中国并不见得畅销，很多出版社并不愿意出高价做这些“有名无利”之事。最后，幸好北京大学出版社林君秀主任和张静波编辑慧眼识珠，才有今日此书的出版。

不可否认的是，我们对克鲁格曼抱有某些不公正的看法。例如，不止一个学生对我坦言，他们非常不喜欢克鲁格曼还有他的文章。他们的理由大致可总结为以下几点：凡是克林顿、奥巴马政府的政策，作为民主党的克鲁格曼都会一律赞成；而对布什政府的政策，不管青红皂白，一概反对。克鲁格曼的文章到处充斥着强烈的主观政治意识，从而丧失了一位职业经济学家该有的独立人格。还有一点，就是克鲁格曼长期在《纽约时报》等主流媒体上撰写专栏文章。尽管此举为他赢得了知名度，但在很多人看来，这显然是不务正业，自废武功，甘愿沦为二流经济学家的自杀性行为。其实，学生们的这些担忧并不是没有理由，作为一名职业的主流经济学家，客观的分析视角和独立的人格是最起码的职业要求。然而，当你读完这本书之后，你就会发现，这其实是一种误读——非左非右，无非是右更偏左一点而已。

但是我想，大家对克鲁格曼之所以有如此深的成见，主要原因是他张扬的个性。看完此书，便能略知一二。好一个票友理论家！分明是将大多数人当成玩票之人，而俨然要把自己当成有别于他人的救世主、职业经济学家。可以想象一下，如此个性张扬的人即便是才华横溢、满腹经纶，会有同事喜欢他吗？现在网络上广为流传的那些轶事，多半都是如此。以下就是关于他的轶事。

大学二年级幸得诺德豪斯的赏识，推荐到麻省理工学院研究生院攻读博士学位。然而，由于个人原因，当时的克鲁格曼情绪非常低落，草草写好博士论文就到普林斯顿大学经济系任教。尽管换了新环境，但是由于他的个性太强，再加上之前的情绪，得罪了不少人，甚至连研究奖学金都丢掉了。直到1978年，他去拜访著名经济学家多恩布什教授。在多恩布什的鼓励下，他终于找回了学术研究的自信。

1982年，克鲁格曼刚从瑞典的一个国际会议回来就接到费尔德斯坦的电话，邀请他去华盛顿任职，担任经济顾问团国际经济学首席经济学家。但是，在华盛顿的这段经历并不愉快。他很快发现，在这个地方，好的分析者并不受重用，马屁精倒是如鱼得水。很快，他就产生了厌倦，再加上张扬的个性得罪了不少重要人物，很快他便退出政治圈，回到学校任教。

1992年，克林顿的总统竞选让克鲁格曼在美国人面前大出风头，他在电视上的经济演说为克林顿的成功竞选打下了坚实基础。然而，克林顿执政之后并没有聘请他为总统经济顾问，而是选择了伯克利大学的女经济学家泰森，原因是克鲁格曼的性格过于刚直，之前在华盛顿和学术界都得罪了不少人。克鲁格曼自己也不得不承认，“从性格上来说，我不适合那种职位。你得会和人打交道，在人们说傻话时打哈哈。”

对于克鲁格曼来说，从来都不缺少诸如此类的轶事，过去很多，现在也很多，将来同样存在。当然，克鲁格曼同时又是非常幸运的。

1988年，积累多年的克鲁格曼终于出版了《期望减少的年代》一书，

该书一出版即在美国引起轰动。随后，他与奥伯斯法尔德合著的《国际经济学》成为各大学和贸易公司的标准教材。各大公司的总裁在看到他所著的书之后纷纷找上门来，请克鲁格曼为他们做商业咨询。尽管克鲁格曼在华盛顿和大学并不那么受欢迎，但在他的读者和学生身上找到了所谓的“理解上的快乐”。

克鲁格曼对东南亚金融危机、石油危机的准确预测令他在业界的地位如日中天。1994年，在亚洲经济被人们广为看好的情况下，克鲁格曼却在《外交》杂志上撰文批评亚洲模式，认为仅靠大投入而不进行技术创新和提高效率的做法，容易形成泡沫经济，在高速发展的繁荣时期，就已潜伏着深刻的危机，迟早要陷入大规模调整。1996年，克鲁格曼在他的《流行国际主义》一书中干脆直接预言亚洲金融危机即将爆发。1997年，危机爆发了。2000年，克鲁格曼又在“能源危机重现”的文章中指出，新一轮国际油价上涨周期已经到来。2001年，在《纽约时报》的专栏文章中，克鲁格曼再次重申了自己的观点。果然，2001年以后，国际油价急剧上涨。2006年8月，克鲁格曼撰文说，由于美国楼市近年来价格暴涨，在很多地区房价开始下降，投机需求出现逆转，导致目前市场上充斥着未出售的房产。而且，由于近三年来楼市是美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发动机，楼市的逆转意味着美国将不可避免地出现严重衰退。目前美国房价已经出现全面下跌的趋势，而且还进一步引发了严重的全球性金融危机。

尽管克鲁格曼才华横溢，多次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提名，但一直都未真正得过奖，原因大家自然心知肚明。直到2008年，还是借着此次全球金融危机的东风才获此殊荣。此等坎坷获奖之路，或许只有克鲁格曼自己才能说清（克鲁格曼本身就是个爱哭诉之人）。

正是如此个性鲜明的克鲁格曼，让我在此书的翻译过程中得到了一次绝佳的学习机会，让我真正见识到一位新生代经济学家的魅力所在！就我的个人体会而言，阅读克鲁格曼的书，最大的障碍不是专业知识，因为克氏出神

入化的语言和简洁明确而又不失风趣的逻辑，能够让每个没有学过经济学的读者都能很快融入到他的讨论中，最大的障碍是克鲁格曼在专栏写作中融入了大量的历史素材和西方文化背景下的特殊语境，让我们无法像阅读中文文献那样畅通无阻。我想，这也是我们在阅读西方作家所写著作时经常遇到的尴尬之处。虽然有很多具有特殊语境的词语已经被我们这些年积累下来的翻译和普及读物“公共知识化”了，但更多的仍停留在未被开发的状态中。对于克鲁格曼这样熟读历史的经济学家来说，他的书阅读起来，难度之大可想而知。尽管我在本书的翻译过程中已经加入不少的注释和技术处理，但读者在阅读此书时仍需特别注意！

本书在翻译过程中得到好友方根溪、陈业玮以及浙江工商大学的几位研究生——钟辉勇、缪仁余、王伟杰、沈燕波、高洁、陈准、姜井勇等的大力支持和帮助，他们为我提供了很多修改建议和意见。在此，一并表示感谢！顺便说一句，最近国内的某些克鲁格曼译著中将“Liberty”翻译为“自由主义”，我们认为翻译为“自由派”可能会更好。同时，也要感谢浙江工商大学管理学院院长郝云宏教授、现代商贸研究中心主任郑勇军教授等人一直以来对我的支持。当然，也要感谢张静波编辑的辛勤付出，没有他的努力，此书不可能如此顺利地出版！

最后要说的是，本书还获得教育部“国际金融危机应对研究”应急课题（2009JYJR020）的部分资助。尽管此书出版已有十年之久，但克鲁格曼对当初东南亚金融危机的批评和独到见解对于我们理解此次全球性金融危机还是大有裨益的。不管你是否喜欢克鲁格曼这个人，你都会被他独到的分析视角和优美的文采所折服。这就是我现在坚持要写此译者后记的原因所在！

陈宇峰

2009年9月于浙江工商大学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书名＝致命的谎言：揭开经济世界的真相
作者＝（美）保罗·克鲁格曼著
页数＝１９４
ＳＳ号＝１２３８４１１８
出版日期＝２００９．１０
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
ＩＳＢＮ号＝９７８－７－３０１－１５８７４－６
原书定价＝２８．００
内容提要＝作者拥有极高的声誉，被誉为主流经济学派的衣钵传人和捍卫者，凯恩斯以后文笔最好的经济学家；作者向来以笔锋犀利著称，本书对某些新闻记者、政府官员及经济学者向大众散布的各种错误观点进行了尖锐的批评，让人直呼过瘾；全书广泛涉及全球化、失业、技术奇迹、通货膨胀、过度投机等内容，通过作者高超的写作技巧和一针见血的深刻解析，令你拍案叫绝；本书带给你的不仅仅是经济学常识，更是看懂世界的智慧。

当有人抱怨新技术的使用正导致大量的工作机会消失时，他却告诉你，美国经济在过去25年里，新增了4500万个工作岗位。

当有人高举道德的旗帜，惺惺作态地谴责无情的跨国公司和贪婪的企业家时，他却告诉你，低工资、坏工作总比没有任何工作好。

当有人为技术创新的空前繁荣而欢呼雀跃时，他却告诉你，技术的奇迹远非人们想象的那么神奇。

当有人视通货膨胀为猛虎，顽固坚持物价稳定的政策时，他却告诉你，通往零通胀的道路上，不仅有产出的损失，还有永久性的高失业率。

……

读他的书，你得到的不仅是知识，还有读懂世界的智慧！

The Accidental Theorist and Other Dispatches from the Dismal Science





上架建议：经济学/世界经济

ISBN 978-7-301-15874-6

9 787301 158746 >

定价：28.00元